

互延兩世之久的政教衝突就此告一段落了。自茲以往，照墨梭里尼的話說，「國民就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是國民」。或如教皇所說，「上帝復歸於意大利，意大利復歸於上帝」。教皇不久就從梵諦岡宮出來爲意大利王室與世界祝福。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下議院將一八七〇年占領羅馬的紀念日從國家假日表上抹去，而代以拉忒藍和約的簽字日。

一九三一年，政府與教會間又有新的困難，這是因爲兩者對於各個的勢力範圍的問題發生齟齬之故。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庇護第十一頒佈了關於勞工的通諭。因爲這封通諭係公佈於教皇利奧第十三（Leo XIII）頒佈勞工通諭（*Rerum Novarum*）之第四十週年，故稱爲四十週年通諭（*Quadragesimo Anno*）。這裏面深以「全部的經濟狀況已成爲非常艱苦，殘酷和無情」爲悲。教皇主張「公平的」工資，力言工人應得若干財產，並以爲工資勞動者在資本家的企業中應「分有若干種所有權，管理權或利潤」。共產主義被稱爲「討厭的東西」，社會主義與天主教是勢不兩立的。庇護極痛心於「可怕的失業之災禍」，並以之一部分歸咎於「過度的自由競爭」。

然而教皇恐怕他這種反對無限制競爭的怨言，被認爲贊成法西斯黨的制度，於是加一句道：「所可懼者，新的企業組合與合體的制度具有過分的官僚性質與政治性質，再者，儘管它有幾種普通的利益，它仍冒着達到特殊的政治目的而非有助於提倡較善的社會制度之險」。庇護又斷言「各種原來互相連接的好制度之破壞，已使社會實際上祇由各個人與國家而成」，而這句話祇能適用於意大利與俄國。

教皇的這種觀念是法西斯黨所不喜的。他們認為教皇對於經濟的與社會的事件，沒有下判斷之權。反之，庇護則以為教會決不能放棄它對於民族的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幸福加影響力的權利。因之政府與教會間的裂痕馬上顯然了，除此種爭論外，還有關於意大利的兒童教育及天主教徒團體的活動的意見衝突。不久，法西斯黨學生開始毀壞教會的財產，踐踏教皇的畫像並攻擊神父。墨梭里尼藉口天主教徒行動社從事政治的活動，乃於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封閉該社所有的一切會館，次日，又解散一切與法西斯黨無直接關係的天主教徒團體。

庇護否認「行動社」干與政治並譴責政府違背拉武藍和約。他在一封公函中指斥法西斯黨的關於兒童教育的主張之不當，以法西斯黨「甚至於強迫幼童幼女舉行的」宣誓為「不法」，並慨嘆「以國家為偶像的真正邪教」之成立。他又訴說意大利的兒童正在被勸誘荒廢禮拜功課以便參加軍事訓練與運動。法西斯黨答覆他道，教皇既為外國的元首，他就沒有權利來干涉純屬內政的事情。墨梭里尼則宣稱「兒童一達學齡，即單獨於國家教會不能分有之」。他又責備天主教徒行動社受業經解散的天主教徒人民黨的黨員的支配，這般人正在秘密準備顛覆法西斯黨。

有一個時期似乎一九二九年的協定會被扯碎了，但墨梭里尼和教皇不久就採取了合理的態度，並實行妥協。互相表示好意以後，到一九三一年九月，耶穌會的神父羅薩（Enrico Rosa）（一個激烈的反法西斯黨者）被免去意大利天主教徒所辦一種主要的評論雜誌的編輯職務，同時首先控告天主教徒行動社反法西斯黨的喬黎埃梯（Giuriatti）少校亦「辭掉」法西斯黨祕書長之職。此外，教皇將一千五百所重開的天主教徒行動社

俱樂部，交與每個主教管區的主教管理，不像從前一樣交與世俗人。法西斯黨答應將來重新排定軍事訓練與運動的時間表，俾不致與星期日的禮拜功課相衝突。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墨氏親自覲見教皇。這樣一來，在拉忒藍和約簽字後的第三週年紀念日，最新的政教妥協又經「正式奉獻」了。

國家主義與人口

我們已經再三指出，法西斯黨人是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他們正在力求恢復古代羅馬的國威，其中許多人並且讚美戰爭為國家的力量與元氣的象徵。法西斯蒂的文學充滿着如下的表現：「為戰爭三呼！」「戰爭萬歲！」「戰爭的本能是屬於人性的」。『戰爭是最有益的神祕表示』。『戰鬥為萬事之源』。一位「倔強的」大政論家卡利 (Cali) 寫道：『尚武的精神是意大利人的基本性質；這不是法西斯黨的發明，也不是戰後的態度。試查歷史，找得出我們沒有打過仗的一刹那時間嗎——無論為誰而戰，為何事而戰，都不關重要』。墨梭里尼本人在意大利百科全書 (Enciclopedia Italiana) 裏面所作關於法西斯主義的論文中，說道：『祇有戰爭將人類的精神帶到最高的水準，並將高貴的印捺在有膽量從事戰爭的人的身上』。

雖然目前意國當局所表現的好戰熱狂比法西斯黨上臺後起初幾年的聲勢不大顯然，可是遊歷意大利的人仍為瀾漫於國家的與地方的活動之各方面的軍事空氣所驚。在一九三二年，意國自誇本國的空軍居於世界的第四位，軍備費則居第五位。這樣一個尊崇戰爭並想如古羅馬帝國一樣擴大疆域的國家自然需要龐大的人

口。

意大利在一九二七年的人口估計爲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弱。據說墨梭里尼在那一年曾經向國會演說道：「如果意大利欲有所爲，而見重於世，則於本世紀下半葉之初它必須以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的人口出現。先生們，如果我們辦不到，我們就不能造成一個帝國，反而會變成一個殖民地。」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寫道：「在鍛鍊過，培厚過和開闢過的意大利，還有一千萬人的插足地。有六千萬意大利人纔會在世界歷史上占重要的地位」。

意大利政府根據「無數量即不能有質量」的學說，乃嚴厲禁止避妊術的傳授，重新限制向外移民，並課獨身者以重稅。在另一方面，各種想得出的宣傳方法都被利用來獎勵結婚與多生兒女，法定的結婚年齡規定爲男子十六歲，女子十四歲，在一九三二年，新婚的夫婦都得減出車費百分之八十乘國營鐵道的火車往羅馬遊覽。到一九三二年，估計的人口已增至四二、二〇〇、〇〇〇人。

在一個天然資源有限的國家，極端的國家主義與不絕增加的人口壓力合攏起來大概會成爲擾亂國際政治的原因。以祇有一二〇、〇〇〇方哩的面積，意大利的人口密度幾乎一方哩已至三五〇人，人口每有增加，生活程度降低及普遍窮困的危險亦必相應增加。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殊不足吸引外來的移民，甚至於如羅馬與那不勒斯之間的傍廷隰原 (Pontine Marshes) 那樣大的開墾地，也祇可望其容納十萬人。儘管政府運用英勇的和聰明的方法來增加國內供給糧食的能力，意大利的民食問題在最近幾年中變成更嚴重了。唯一的解決法

似乎在於土地的擴張——帝國主義。法西斯黨人未嘗不感覺到這一層，這從他們需要更多地方的無數暗示中可以看到。他們的感覺就是說，「意大利的人民必須在意大利的土地上爲意大利的富強而工作」，而「人口統計學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種種理由證明意大利的擴大疆域的志願是正常的」。

在哲理上，法西斯黨人也認帝國主義爲正當。我們再引用墨梭里尼的話來說：「在法西斯蒂的學說中，帝國不僅僅是土地上，軍事上和商業上的表現，並且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表現……法西斯主義認走向帝國的趨勢——即國家的膨脹——爲生機或活力的表現……」這種精神已時時使意大利的外交成爲困難的事情。

法西斯黨的外交

在外交範圍內，法西斯黨政府總算有很大的成功，足以掩蓋該黨柄政前之歷任內閣所表示的「柔弱無能」。墨梭里尼採取一條勇敢的，有時是好戰的外交陣線，並使意大利深信本國爲世界強國之一。同時他又極着重陸海空軍的軍備。

也許意大利的外交關係中最困難而最感威脅的就是對法的關係。墨氏在戰後最初幾年中，很不高興看到成千成萬的意大利人羣集於法國去找職業。當法國鼓勵意國僑民歸化法國的時候，他更加惱怒了。法國也似乎有一個時期特別優待那般因不喜或畏懼法西斯主義而離開意大利的亡命客。再者，意大利人裏面顯然有一個明晰的感想，以爲全在法國的掌握中的科西加（Corsica）、薩伏衣（Savoie）、尼斯（Nice）和突尼斯（Tunis）諸

地應該「歸還」於意大利。法西斯黨人以意大利在和平會議的「正當」要求之被忽視及本國之不能取得任何委任統治地特別歸咎於法國。兩國曾經競爭西部地中海的霸權及海軍軍備的優勢。此外，法、意的國交有好幾次因爲意大利與法國的同盟國（尤其是巨哥斯拉夫）常起爭鬪而受損。在一九三一年，意大利一個高級官吏表明「小協商」(Little Entente)的特色爲「在法國的將領之下的軍事同盟」。雙方在法意邊境上都曾從事於廣大的軍事準備。

土地爲意大利所覬覦的國家不僅是法國一國而已。有一次墨梭里尼直指英屬馬爾太(Malta)島爲「未恢復的意大利」之一部分，而瑞士政府也曾因法西斯黨人頑強地嚷着「歸還」用意大利語言的體基弩那(Ticino)而大感煩惱。在一九二八年之春，英、法、西班牙三國邀請意大利共同管理摩洛哥西岸的坦支爾(Tanzier)自由城。

墨氏有一次說道：「西方有許多已具定形的民族國家，我們除派勞工往那裏去外，不能別有奢望——雖然甚至於派遣勞工一事有一天也會被禁止或限制」，因之他盡了種種力量來鞏固意大利在東歐的勢力。前面已經討論過，在一九二三年，羅馬確定地保有了多得卡尼斯羣島(Dodecanese Islands)。同年，法西斯黨人以極脆弱的口實想從希臘取得科佛(Corfu)島。阜姆則於一九二四年確實地拿到了。與東歐和中歐諸國所締結的友好，中立與商業的條約，亦經陸續簽字。

一九二五年七月，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簽訂了商業協定，依此協定，巨哥斯拉夫的國民在意大利取得若干

商業權利，意大利則可以在巨哥斯拉夫某某幾個地方保有土地，並許在巨國的意國商號得輸入本國的工人。巨國人民對於意大利這種有力的「侵入」，反對的很多，所以這件協定到一九二八年纔得批准。此項反對論調一半由於嚴重的南斯拉夫領土回復運動的發展，這般領土回復主義者的目標即在從意大利取得達爾馬提亞的大部分。此外，隨着又發生好幾件暗殺案和暴行，於是兩國的關係在非常緊張之下挨過去。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的爭鬪，其實就是對於亞德里亞海霸權的爭奪，更因意大利確立其保護權於阿爾巴尼亞而劇烈了。（註）

（註）見下節。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在一九二四年所簽訂的五年友好與中立條約至一九二九年滿期時未經續訂。

在一九三一與一九三二年，意大利鞏固了它在戰後的親交政策之定向。它和法國、波蘭及小協商諸國日益疏遠，漸漸對英、德、奧、匈、土及美國表示友好。（註）墨梭里尼在「向羅馬前進」的第九週年紀念日（一九三一年十月）對十萬民衆演說，主張（一）爲謀以前的中歐同盟國與意大利的利益而修改和約；（二）重新整理賠款及協約國間的戰債；（三）成立多瑙河流域的協調以改良中歐與東歐的經濟狀況；及（四）馬上進行裁軍。六個月後，法西斯黨最高會議頒佈了關於這四點的文告。

（註）意國外交大臣葛蘭第（Grandi）於一九三二年聘問美國，次年，意國參與華盛頓二百年誕辰祝典。同年，意大利貸與土耳其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以資助該國的三年工業計劃。

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外交大臣葛蘭第特別聲明重行分配北非土地之必要。他說，「假使在大戰結束時意大利的同盟國於分配委任統治地的當兒已藐視了它，它現在就必須更加苦幹，來表明它爲文明的利益計在殖民

地所能盡的真正力量。在作此項聲明後的兩個月內，墨梭里尼再度自兼外交大臣之職。他的目的顯然是在使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更加有氣力。

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

一九一二年與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的結果之一，即爲一個新國家的出現：阿爾巴尼亞（Albania）。德國尉德諸侯威廉（William of Wied）被選爲阿爾巴尼亞國王（Mpret）。他沒有多大才幹，不能統治這個多山的國家和它的頑強的人民，所以當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就逃回德國。在戰爭期中，阿爾巴尼亞是正式中立的，但奧人、意人和塞人都利用它爲公共戰場。在巴黎和會，意人想取得阿爾巴尼亞爲委任統治地，可是威爾遜大加反對，並叫土人組織自己的政府。

一九二〇年一月，一個不穩固的臨時政府成立了，它集中它的力量來驅逐外國軍隊。到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意軍撤退，是年十二月，阿爾巴尼亞成爲國際聯合會會員國。一九二一年，大使會議爲阿爾巴尼亞劃定暫時的疆界。後來又經國際調查團加以變改，最後經過一九二六年的幾次國際協定之簽訂，確定爲現在的界線。阿爾巴尼亞的面積約一七、四〇〇方哩，其人口在一九三二年估計爲一百萬以上。

臨時政府的生存常在風雨飄搖之中，但在大局混亂的當兒出現了一個著名的人物，即名阿默德·佐古（Ahmed Zogu）的年輕的回教徒親王。一九二二年，佐古爲阿爾巴尼亞首相，一直做到一九二四年六月，然後被

主教諾利(Noli)趕下臺，並被迫亡命國外。諾利曾肄業於哈佛大學，爲阿爾巴尼亞獨立的希臘教會的首領，他不能維持國內的秩序，凡所設施，祇爲自己的顛覆開先路，所以不到年底就下臺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佐古回國，諾利逃往意大利。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阿爾巴尼亞宣佈成立共和國，間接選出的國民議會選舉佐古爲第一任大總統，任期七年。

佐古就總統職後，着手鞏固自己的權力，但不久他就覺得非向意大利乞求經濟的援助不可。一九二五年，因意大利的倡議，成立了阿爾巴尼亞國家銀行。此後不久，意大利貸與新共和國約一千萬元之款，以阿爾巴尼亞之關稅收入爲擔保。接着又有其他的交易，意大利馬上居於支配阿爾巴尼亞的優越地位，並因之而控制着俄特蘭陀海峽。巨哥斯拉夫自然極力反對此種凡足以危及其出入地中海之自由的計劃。我們當記得，構成舊塞爾維亞人對於奧匈聯合帝國之不平的，正是這個要因。

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時期內，阿爾巴尼亞以意國的借款並在意人所組織的團體稱爲 *Spaa* 者的監督之下實行了許多內部改良，同時阿爾巴尼亞的陸軍亦由意國的軍官改編。佐古在一九二六年又遇到一次嚴重的革命，乃再度向意國求援。這一層，墨梭里尼預備答應——但須有代價。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兩國簽訂了提蘭那條約 (Treaty of Tirana) 依據其中條款，「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認爲凡謀危害阿爾巴尼亞之政治的、法律的與土地的現狀之亂事皆有反兩國相互的政治利益」爲保障此項利益起見，兩締約國「承諾彼此援助與合作」。兩國「又承諾不與其他國家締結凡足損害他方之利益的政治協定或軍事協定」。條約後

面所附一函復給與意大利遇阿爾巴尼亞請求時干涉該國之外交與內政的權利。

巨哥斯拉夫大爲此種事變所驚，乃乘邊境上發生事故作某種軍事準備。一九二七年六月，當巨哥斯拉夫派駐杜拉佐（Durazzo）使館內的一個職員因犯偵探嫌疑被逮時，巨國和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係就告斷絕了。意大利卻偏袒阿爾巴尼亞，戰事似乎迫在眉睫了。後經幾個中立國家出面調停，這件事總算未訴諸武力，但巨哥斯拉夫此刻切切於向法國訂立同盟了。此舉完成於十一月十一日。翌日，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也簽訂了二十年的軍事防守同盟。

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佐古自立爲阿爾巴尼亞國王，號佐古一世（Zog I）。次年，一個意大利公司從新王取得了重要的煤油開採權，一九三〇年，兩國又訂立一個協定，據此協定，意國銀行得監督阿國的幣制。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滿期的提蘭那條約，也續訂了。

那個小王國依然是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兩國間的糾葛的隱伏原因，特別因爲佐古有好幾次暗示過謀殺本人的陰謀正在巨哥斯拉夫境內進行着。一九三一年二月，佐古方在維也納就醫，有一天幾乎被他的兩個政敵狙擊而死。一九三二年九月，有三十五個阿爾巴尼亞人，大多數爲知識份子，被判犯有謀害國王及企圖建立共和國之罪。儘管巨京柏爾格雷德（Belgrade）屢次否認，佐古仍諷言，此種不幸的事件係巨國所鼓動。然而，因有意——阿的同盟條約，意國在亞得利亞海兩岸的優勢終究得到擔保。

第十四章 西班牙

歷史的要因

地圖表明着西班牙自格拉那達(Granada)失陷時(一四九二年)起就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那時許多本地的基督教君王已克復回教民族摩爾人(Moors)於七一一年與七一八年間所占領的土地了。然而實際上，西班牙人很少或簡直沒有統一的語言，思想或習慣，完全不是一個純粹同一的民族。一四六九年亞拉岡的斐迭南(Ferdinand of Aragon)與卡斯提爾的伊莎伯拉(Isabella of Castile)的結婚(此舉預兆西班牙兩個大王國的合併)大為當時的幾個政治家所反對，因為這兩個民族間有很大的差異。非常阻塞的地理狀況及因對抗摩爾人所致的幾百年孤立的邊境形勢，產出了一種高傲的地方觀念的結果。在各時代，外國的侵略，有如十九世紀之初拿破崙的入犯，曾經帶進一種好戰的初期國家主義，但通常「地方的稗官野史仍舊是一般人的精神生活的中心與來源」。愛國心，在西班牙似乎還是「一種反映着該國地理上之區分的地方事件」。

構成早期的現代西班牙之人口的兩種最實際的成分，是猶太人和摩里斯柯人(Moriscos)。(註)前者常為國王的收稅吏，在商業界頗為活躍，並且知道如何將其資本投於最生利的企業。摩里斯柯人具有他們的祖先寄

居北非洲時所得的經驗，很熟練於灌溉與開墾的技術，並盡過很多力量來改良畜產物並增廣棉花的種植。這兩種民族被武力驅逐後——猶太人被逐於一四九二年，摩爾人於一六〇九年——（大半爲了宗教上的緣故），所留下的人民完全不同了，他們的領袖酷好冒險和炫耀，頗有輕視勞動爲不名譽和不莊重的事情之傾向。

（註）格拉那達失陷後留在西班牙的摩爾人稱爲摩利斯阿人。

那般在其他國家成爲中等階級的民族構成分子，在西班牙就常常以爲勞力祇適於異教徒和猶太人。至於有些不顧流俗的憎惡而從事於商業的人則爲經濟上和社會上的無能力所累。因爲寺院與貴族通常都被豁免賦稅，又因爲多數的土地藉國王的賞賜或購買漸漸歸於這些享有特權的階級，所以對於殘存的商業和工業所課的稅必然是苛重非常。雖然他國的統治者很巴給中等階級，大多數西班牙的君主都阻礙其發達。非常保守的軍隊與教會倒被認爲王國的柱石。一直到查理士三世（Charles III）朝代（一七五九——一七八八年），中等階級纔稍稍擡頭，但也祇是一個短時期的事。

同樣的短視在殖民地方面亦很顯然。祇求開發殖民地的礦物而不注意於其農產的慾望，使美洲的西班牙人和國內的同胞一樣大受影響。他們在新世界中所最關心的是貴金屬而非穀類；是山嶺而非肥沃的流域；是寺院而非貿易場；少數寧擇耕種與畜牧爲職業的殖民地人民，都被許多重商主義的法規所阻撓和限制了。

就是在它的黃金時代，它本身也包藏着衰微的原因。西班牙在十六世紀的榮華大都得力於少數有爲之君的宵旰勤勞和不勞而獲的金銀之從美洲流入，但這種光輝在以後數世紀中就不能維持下去了，因爲政府當局

不能使其經濟狀況適應變遷的世界經濟情形。他們又不將所流入的貴金屬變為有永久利益的媒介物，或作商業與工業的投資，而之以浪費於奢侈的賽會及花費很大的外交政策與宗教政策。

關於西班牙自一五〇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發展所受的腐蝕的影響，列舉起來是一張很長的目錄。軍事上重大的損失，大批殖民地冒險者的向外移居少年男女麇集於遍地皆是僧院與尼菴討生活的熱誠，流俗對於外國僑民的敵意（甚至於在查理士三世朝代因政府的鼓勵而來西班牙者亦受同樣的嫉視），礦產的比較貧乏，及文盲的百分數之過高，這一切都足使西班牙王國在經濟上和社會上變弱。從經濟的立足點看來，天主教教會的勢力特別有礙進步，因為它堅定地維持政治與社會的現狀。

在這幾百年中，政府又袒護牧羊業而特別歧視農業。一個很有勢力的畜牧公司（The Mesta）係開辦於中古時代，到十九世紀中葉仍存在。西班牙人不注重土壤開墾的責任，大部分當由該公司負之。政府又特許該公司使用廣大的「王家牧羊場」，人民不得耕種或圍圈其一寸之地。因之，「自四月起，大羣的羊每年蹂躪卡斯提爾，到九月纔回到所從而來的地方」。

所以，西班牙的經濟生活，在發現美洲與美西戰爭之間的大部分時期內，是以机陞不安，物價昂貴，腐化，財政失其均衡，賦稅制度之大不平等，政府之干涉商業，流行的地域主義及衰敝的貴族傳統等現象為特徵的。一八九八年之敗績（指美西戰爭）祇是不健全的過去所生的不幸的和當然的結果。

我們記住以上所述西班牙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種種困難的大略情形，就不難明白該國在二十世

紀初年的悲慘的光景。自一八九八年的戰爭結束至世界大戰開始的十五年中，國內幾乎不斷地呈現着騷亂的現象，如暴衆之攻擊教堂，寺院與警察隊；大罷工；戒嚴法；殖民地之叛亂；政治暗殺；憲法保障之停止；及無數的軍事陰謀。一直到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此種不穩的徵候纔暫得中止——於是又發生在大戰中究取何種途徑的問題，這個問題重新激起了全國人民的不安和紛爭。

西班牙與世界大戰

雖然在一九一四年，國王阿爾方朔十三世（Alfonso XIII）（他的母親爲奧人，妻子爲英人）很難決定同情於那一方面，西班牙人民卻馬上分爲兩個相對的黨派。許多知識分子及一般具有自由主義趨向及反君主與反教士的思想的人，贊成擁護協約國的主張。全體的保守分子則大概表同情於德人，其中有些人並且反對法人在摩洛哥的勢力，及法國對於教會在國家的地位的態度。那般愛國家也是親德的，他們一想到英國之霸據直布羅陀（Gibraltar）是戰爭的結果而非由於自動的割讓，就很痛心。

在種種情形之下，最安全的決定辦法就是保守中立，一九一四年十月，西班牙國會（Cortes）就這樣議決了。這個政策的聰明，在交戰國兩方都開始向西班牙訂購大批軍用品的時候，便顯然可見。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西班牙的輸出之額溢出輸入之額甚多，它在一九一三年的貿易差額是不利的，入超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到一九一八年就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出超了。然而在一九一九年之後，情形又反轉過來，變爲入超。

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激增的工業與運輸業，當能使西班牙比較繁榮和安定，其實全不是那回事。在大戰時期，就換了七個內閣，此後五年內，旋起旋仆者又有十來個。無論自由黨的，保守黨的，或聯合的政府，都不能措國家於盤石之安，或使有進步。此種不安的現象可追溯到四種主要的發展：(一)勞動階級的不滿和漸起的過激主義；(二)強有力的地方主義者與分離派的運動之存在，尤其是在加達魯尼亞 (Catalonia)；(三)軍人議會 (military juntas) 之干政；及(四)鎮壓西屬摩洛哥的叛亂的軍事之繼續不利。現在必須將這四個要因加以詳細的討論。

國內的不安和殖民地的戰敗（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

雖然勞工的不安是全國的普遍現象（特別是在一九一六年後），在加達魯尼亞卻最為顯著，那裏經濟的困難和地方主義者的不滿合攏來使反政府運動格外嚴重。（註）在一九一七年，加達魯尼亞（特別是以工業著名的巴塞羅那省 Barcelona）發生代價很大的罷工。七月十七日，國會中加達魯尼亞的議員申斥政府，並在巴塞羅那省舉行特別會議，要求關於統治和待遇本區域的種種改革。他們訴說，巴省的工業不勝苛捐雜稅之重負，而出自此種重稅的國課，非被浪費於國都馬德里 (Madrid)，即為種種公共改良而消耗於他省。

（註）加達魯尼亞位於西班牙的東北部，由四省而成，包括巴塞羅那的工業中心。土人都用加達魯尼亞方言。

加地議員舉行會議後，接着就發生巴省的大罷工，結果當局不得不使用機關鎗來恢復秩序。此外，政府又允

許擴大地方分權制度，普選參議員，及廢止政府停止憲法之保障與解散國會的獨斷權力，以圖和緩人心。然而這種讓步來得太晚了。大戰一告終，西班牙的混亂日益增加，激盪於歐陸的民主政治之波浪鼓勵着人民提出許多改革的要求。危急的事件很迅速地連續發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加地的國會代表團發佈了一篇宣言，要求建立「自治的加達魯尼亞政府」，設有自己的議會，負責的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加地的語言當成爲「唯一的國語」，該區域應聯合「其他西班牙民族成立一個聯邦國家，專管外交、陸海軍、幣制度、量衡、貿易、關稅、交通等事」。這般地方主義者希望將這篇宣言書呈遞於在巴黎和會的威爾遜總統，但他們恐怕政府的武力和王國其餘區域的輿論反對，因之此舉未能實現。反之，一部分分離派人卻強硬地宣佈非博得絕對的獨立不止的決心。

這篇宣言所引起的騷動還沒有平息，另外一個總罷工（一半爲社會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的宣傳所挑起）又在巴塞羅那爆發了。於是一切憲法上的保障皆因之被停止，使事情更糟者，文職機關與軍事當局又因爭執終止罷工的方法，大起衝突。街市戰於罷工者，破壞罷工者，警察與兵士之間，發生了大流血，其他地方也有同樣的慘劇。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西班牙雇主聯合會揚言欲發起全國的同盟休業運動，除非政府運用中和的手段來待遇雇主與工人。一九二〇年顯然爲真正恐怖的一年，到一九二一年三月，首相正從事於調和國會中幾派人的工作，時，忽然爲人暗殺。

內閣的存在既常爲勞工的事變與地方主義者的搗亂所危，更因許多軍人議會的活動而愈不穩固了。這些

軍官所組織的議會批評政府的政策，企圖干涉民政，並從事妨礙政府關於摩洛哥局面的策略。他們的惡作劇非常使人難堪，首相摩拉（Maura）不能復忍，乃於一九二二年一月設法解散他們。可是國王反對此舉，因之內閣又倒了一個。（註）

（註）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軍人議會終被解散。

在這幾年中，西班牙軍隊在摩洛哥征勦叛黨里夫人（Rifi）的戰事又告失敗。軍隊打敗仗的次數愈多，所課於國內人民的捐稅愈重，而兵役、檢查制度和對於個人的限制的壓力也愈大。這個危局終於一九二二年達到極點，那時前任摩洛哥高等委員貝倫伽（Berenguer）將軍發表了攻擊政府的驚人文字，並要求審判他自己的行為，作為徹底調查殖民地軍事大失敗的一方面。他責備內閣犯有瀆職，無先見之明，及怠忽之罪。

貝倫伽的控告，加上人民的感覺——以為摩洛哥戰爭已損折若干萬生命和幾百萬佩斯大（Peaeta）西班牙銀幣名），把全國的忿怒激到白熱的程度。此外，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安努爾（Annual）地方所發生的辱國事件（在此役中，阿布的·克利姆（Abd-el-Krim）所統率的幾千里夫人把一枝西班牙的精銳軍隊打得大敗，殺死二二、〇〇〇人，生擒一〇〇〇〇人，西軍司令西爾維斯德（Silvestre）將軍自戕），促成了一個新危機。於是國會指定了一個二十一人之委員會，在畢伽梭（Picasso）將軍主席之下，從事調查政府的行為。

當十萬兵士仍在摩洛哥慢慢地和叛軍抗戰的時候，畢伽梭委員會舉行了幾次會議並審查在西班牙和摩洛哥所得的證據。到一九二二年夏天，該委員會草成報告書，並以之提交內閣會議。報告書的內容關係很重要，所

以馬上就被禁止公佈。

雖然報告書所列舉的罪狀和意見未經披露，不過大家相信其中大概牽涉到很多最高官吏，甚至國王本人亦在內。報告書中似乎建議對於在摩洛哥的若干將領及在國內的幾個大臣應處死刑。國王則被指摘犯有直接傳送攻擊令於西爾維斯德將軍，而不以之由陸軍部及摩洛哥最高司令部轉達的過失。當時謠傳該項報告書主張改變國體。其餘的告發條款有關於西爾維斯德將軍的酗酒，幾個軍官之擅離北非職守而赴本國馬拉加（Malaga）地方之宴會，某將軍之私設商店於得土安（Tetuan）以便出售盜得之軍火，及兵士時時被迫以重利向軍官借錢以購買他們自己的食物等等的。

當人民曉得那篇報告書不但被祕而不宣，其中的條陳大概會為政府所忽視的時候，全國紛紛舉行抗議的會議。再者，國會與報界此刻亦要求馬上公佈告發條款的全文。政府恐怕發生政變，乃急行解散國會，並下令開始選舉。然而新選出的國會的脾氣，與舊國會初無異致。

使當局更感困難者，即國內又連續發生工人的罷工及過激派的暴動。單在巴塞羅那一地，截至一九二二年九月止的那一年中，街市戰與復仇行動雇主與工人的傷亡之數共為七七一人，其中死者三三七人，傷者四三四人。地方主義者的運動亦有增加，法西斯黨在意大利奪得政權的消息更使人心奮激。所以，當巴塞羅那省總督里維拉（Rivera）將軍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起而推倒政府，停止憲法之施行，並自立為西班牙的軍事獨裁的時候，一般人毫不驚異。里維拉為鞏固其獨裁權力起見，於本人外另委八個陸軍上將和一個海軍上將組織執政

內閣。雖然當日推翻政局的策略，顯然爲針對西班牙的古舊政制而發，而非有不利於國王，但那時誰也不曉得他的計劃實際上是爲國王阿爾方朔所知並且得他同意的。國王曾經小心地藉故訪問法國，待政府顛覆之後就立回首都馬德里，然後要求里維拉自立於軍人政府之上並提出必要的改革。

獨裁政治（一九二三—一九三〇年）

厄斯得拉侯爵（Marquess de Estella）里維拉以一八七〇年生於加的斯（Cádiz）。當美西戰爭之際，他從軍於古巴和菲列賓作戰，自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則在摩洛哥作戰。在一九一五——一九二三年的時期內，他歷任加的斯馬德里和巴塞羅那的總督。他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和仁慈的人，所以有好幾次和高級長官發生衝突，爲了反對不必要的屠殺摩洛哥的兵士。事實上，他有一次曾經主張退出北非洲——大概以作直布羅陀之交換品。

自奪得獨裁的政權後，里維拉立刻下令解散新近召集的國會，攫取大部分關於摩洛哥辱國之役的重要文件，嚴格檢查新聞與言論，廢止陪審制，掃除地方自治的殘跡，發行國庫券以舉借內債七千萬元，並採用「國家、君政、宗教」的標語。他對於宗教的眷顧，馬博得了強有力的天主教教會的好感。

他不久發現要建立一個強固的，同時又能使人民滿意的政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民衆對於獨裁制與君主政體的敵視因種種不幸的事件，如省議會之被解散，摩洛哥的危難之無止境，人民犯小過者之被科重罰，及幾個

共和黨人（尤以著名哲學家烏那孟諾（Unamuno）爲著）之被放逐等等日漸增加。再者，極端的檢查制度觸怒了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其中有許多人開始口誅筆伐來抨擊政府。例如在一九二五年之初，有幾千萬分著名小說家伊本納士（Ibáñez）所寫的反君政的小冊子，從飛機上散發於西班牙各城市。

然而，自一九二五年開始，里維拉將軍就採用了博取輿論對於獨裁制的贊助的政策。自政變以來施行的戒嚴法令於一九二五年廢止了。三個月後，政府慨然以巨額的年金資助海運業與造船業。十二月三日，軍人執政被裁撤，代以文人內閣，閣員皆爲「愛國同盟」（Unión Patriótica）的分子，這個同盟是由里維拉贊助而創立的新國民黨。此外，政府又用種種方法求得實業界的好意，如設置（一九二七年）全國工業生產統制委員會，祇有該機關可以核准新工業的創辦或舊工業的擴展或改變；訓令（一九二七年）西班牙煤炭消費者應從國內供給額中取得其需要額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通過扶助商業航空的法案；及設立全國經濟部。

除上述者外，政府又盡了很多力以仲裁解決勞工的紛爭，分裂若干大地產，並推廣國民教育。爲討好加達魯尼亞人起見，保護的關稅稅率也提高了。自從全國勞工聯合會的幾個領袖被任命爲公務員以後，得到了一部分勞工階級的擁護。國民參政會亦經召集（一九二七年九月），以代業經解散了四年的國會，作爲對於立憲主義者的讓步。參政會的議員四百人皆由政府直接或間接任命之，其本身祇有諮議的權力，但到一九二八年，它奉命起草新憲法，以代替雖經停止施行但仍爲有效的一八七六年的舊憲法。

爲求得國家主義者的擁護計，政府實行強硬的外交政策。一九二六年八月，西班牙與意大利簽訂了友好條

約，其中規定任何一方遇他方受第三國（假定上爲法國）攻擊時應保守善意的中立。一個月後，西班牙送達通知於國際聯合會，述明退出國聯的意思，因爲國聯拒絕了它的任國聯行政院常任理事的要求。（註）最後，摩洛哥的局勢轉好，政府已能操縱一切，雖然這個結果大半由於阿布的·克利姆一方面戰略上的失算。

（註）見下章。在一九二八年，正在規定的退盟通知兩年之期屆滿前，西班牙復通知國聯，願仍爲會員國。

阿布的·克利姆因欲遂行其對於摩洛哥國王一稱號的要求，並附帶報復法人干涉其軍糧運輸之仇，乃鑄成同時攻擊法軍與西軍的大錯。法軍因在裝備、編制、指揮和資力上都占優勢，並有西班牙的援軍加入，所以不難將殖民地的戰事很順利地加以結束。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阿布的·克利姆投降了，在次年內，里維拉遂能宣佈摩洛哥業經完全「肅清」。那時西班牙已耗去了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軍費，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十年之期內，每年損失的生命平均爲一萬三千人。

儘管政府有以上的成就，一般不安的徵兆仍非毫無。在一九二六年，礮兵團中因爲憤於將士的升級非由資格與功績，而由奧援，發生兵變。同年，建立獨立的加達魯尼亞的陰謀幸爲法國警察所撓，幾個越過邊境的分離派領袖遭法警逮捕。在一九二八年，另有一個陰謀——顛覆里維拉的陰謀在巴塞羅那敗露，而一九二九年一月間又發生提烏達·累阿爾(Ciudad Real)的礮兵團的叛亂。變兵反對不公平的擢升方法並要求廢除獨裁政治。政府爲懲罰叛亂計，將該團臨時解散，且將礮兵學校停辦。六星期後，幾萬大學學生因反對嚴厲的檢查制度及馬德里工科學生之受虐待，實行大罷課。事情因大學之被封閉及若干教授之遭罷黜祇有弄得更糟，不久，政府認爲

必須暫時關閉馬德里薩拉曼加 (Salamanca)、法拉多利 (Valladolid) 和其他城市的一切高等學校的大門了。再者，在這幾年中，謀刺國王奧迪克推多的案子，層出不窮。經過這些表現，共和主義的潛流漸漸得勢。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八日，經過六年多的危難之後，里維拉突然辭職，和他突然上臺一樣。他辭職的原因很多，身體的孱弱，本人與國王的齟齬，常有的混亂，幾千大學生因政府對於天主教學校的徇私而重起的學潮，及十七個新近任命的司令官之不肯表示對於本人的信任，在在使他灰心，非下臺不可。他在告別書內臚陳他的功勳，如肅清摩洛哥，掃除恐怖主義與分離主義，恢復國家的繁榮與威信，及召集國民議會等是。然而他的政敵以為他功不掩過，他們着重他的忽視立憲的主張，不能終止政界的腐化，挽救財政與經濟的恐慌，和洗刷西班牙在世界的眼光中的污名。(註)

(註) 里維拉將軍於辭職後還不到一個月就在巴黎逝世。他的遺體被迎回西班牙，並受國葬的榮典。

里維拉退休後，繼任首相者為貝倫伽將軍。這位將軍就是在一九二二年要求調查摩洛哥事件的人。他對於國王很忠心，但缺乏領袖的才能，所以被注定失敗。雖然他就任後就放鬆新聞與言論的檢查，並對於學生的要求取妥協的態度，可是當着世界的不景氣，他不能夠使國家趨於繁榮，為一切勞動者找到職業，及以麵包施於饑饉的人。在他的計劃還沒有擬定的時候，巴塞羅那、馬德里、薩干塔 (Sagunto) 和其他的城市又發生學生的騷擾和風潮，對於幾個市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活動與無能的控告如雪片飛至。復次，一部分加達魯尼亞人因不耐隨現政府而至的困苦艱難，猛烈地進行「加達魯尼亞主義、自由主義、民主政體和共和主義」的運動。

國王和他的內閣在一九三〇年拚命設法恢復人民的信任。國民參政會雖被解散，但政府許於一九三一年舉行新國會的選舉。政府爲扶助農人起見，下令停止小麥之輸入。對於製造品所徵收的稅率也提高了。阿爾方朔誓言將來軍隊中的陞遷當以資望與功績爲定。里維拉政府「非法」所科的幾種罰金則經發還。政府對於人民言論與集會的自由亦作若干讓步，並禁止警察沒有證狀搜查住所。

但以上一切都是徒然的。增加的言論自由適足以表明共和主義的思想已成爲燎原之勢。人民不再希圖王室的恩典了；他們祇是要求國王遜位。一九三〇年九月，馬得里的鬪牛場有兩萬民衆舉行大會，狂呼建立共和國。一個月後，巴塞羅那大學的學生公然大喊「打倒國王」的口號。十二月間，軍隊中又起叛亂，這一次是航空隊的兵變，接着一個南方窮地主之子，柴謨拉（Zamora）所領導的，尙未成熟的共和革命爆發了。到是年之終，有一萬反對君政的人被捕下獄。（註）

（註）阿爾方朔對於「大學城」建築計畫的資助，更使共和黨人，反教會派人和社會主義者憤怒，他們認爲這一個天主教徒的新的偉大學術機關之建築，實爲一般「開明的知識份子」所已建立的文化中心之打擊。

至此，我們也許應該略一言及阿爾方朔第十三的性格。這個布邦（Bourbons）與海布斯堡兩王室的後裔是位頂傲慢專橫的人，同時也很勇敢，於遊戲競技無所不精，並有巧答之才。他喜歡攬權獨斷。「國會的無生氣和政客卑劣」在他的眼睛裏是輕蔑的對象。第一，他自稱爲西班牙的愛國者，有一次他曾經暗示一切重要的問題是關於西班牙的，而非關於王國或共和國的。他在位多年的環境非常人能堪，假使換一個柔弱的人來處他

的地位，也許早已退讓或逃走了。

到一九三〇年，王國的繼續存在顯然有賴於三種力不足特的因素：大部分軍隊的忠心（軍隊中每三百人有一將領），殷富的地主與教會的擁護，及反對派的內訌（當時已有二十三個共和黨的組織）。反對延長舊政體之生命的人大概有以下幾派，一為地方主義者和分離派，他們不贊成將政權集中於首都馬德里；一為社會主義者和「新工業主義者」，他們渴望改變社會與經濟的制度，使適應二十世紀的需要；一為知識分子，他們到處鼓吹反對教會的勢力及中古狀態的精神生活；一為共和黨人，他們深恨軍人的權力和保王黨人違背憲法的行為。一九三一年早被注定為思想不同的各黨派間決鬪的一年。

西班牙共和國

一九三一年二月，首相貝倫伽恢復其前任者於一九二三年所停止施行的憲法，並下令舉行國會選舉。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人民對於這個消息卻報以憤怒。差不多一切反政府的黨派都聲明他們除投票召集國民議會外，拒絕從事任何選舉。他們又無意於參與復活一八七六年的憲法的運動。貝倫伽因之辭職，柄政了剛好一年，由海軍上將阿士那（Aznar），另外一個忠於王室的人繼任。他上臺後，就頒發命令，預備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先舉行各市各省的選舉，然後全國選舉新國會，以便草定一個新憲法，雖然是君主政體的。

不幸四月十二日的市區選舉造成共和黨的勝利。這使當局大為狼狽。阿士那也因之辭首相之職（四月十

三日，於是柴謨拉代表共和黨的議會聲言，除非國王遜位，將有武裝的革命。十四日，阿爾方朔在喀他基那（Cartagena）買棹離國，逃往法國。他並未正式遜位，祇是「停止王權之行使」，讓本國人民自由決定到底是保存王國或另建共和政體。可是柴謨拉馬上宣布成立共和國，被推為臨時大總統，並以行政權委託於以前選定的温和派共和黨人與社會黨人的聯合內閣。（註）

（註）柴謨拉總統在早年是一個君政主義者，曾經三次為王國內閣的大臣。然而，當里維拉獨裁之際，他就改奉共和主義了，到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他領導那一次沒有成熟的共和黨的革命，這在上面已經提到。

新政府規定六月二十八日為選舉國會的日期，並擔保進行土地與教會的改革，保障個人的自由，及允許地方自治。雖然大多數政黨決定等待選舉的結果發表後再採取重要的步驟，臨時政府在本身成立後最初十個星期內卻忙於鎮壓反共和運動和共產黨的騷擾，籲求加達魯尼亞的分離派不要損害國家的統一，及通過緊急的預備法律。許多從前王室的官吏皆遭監禁，貴族的權利亦被廢止，共和國國旗則改為紅黃紫三色。（註）

（註）在廢止的四千二百種貴族權利中，約有三百五十種是屬於大公（Grandees，西班牙的最高一級貴族）的，這般大公享有當國王前不脫帽的特權。

其他兩種嚴重的發展，使新政府於選舉前不得加以注意。第一，有些教會職員籲求天主教徒祇投願意保護天主教者之票時，反教會的亂事就促成了。全國的教堂、寺院和尼菴都被焚燬和搶劫，值幾千百萬「佩斯大」的財產大遭破壞，各教派（特別是耶穌會）的會員的生命亦在堪虞。柴謨拉政府對於此種直接行動的計劃不

大表同情，到後來終究宣布了戒嚴令，企圖儘速恢復秩序。

第二，一部分加達魯尼亞人，大半爲過激的工人（他們恐怕將來的國民議會是保守的或充其量是溫和的，他們又認任何馬得里政府爲可憎的），宣布成立自治的加達魯尼亞軍政府，選舉馬西亞（*Macia*）爲總統，並草定自治法（*Statute of Autonomy*），作實際獨立的準備。所以，自始就顯然，西班牙的「愛爾蘭問題」會起而擾亂共和國國內的和平，有如它在王國一樣。再者，加達魯尼亞的運動鼓勵着其他區域（特別是巴斯克州 *Basque* 與加里西亞 *Galicja*）也向中央政府要求多量的地方自治權。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各處人民羣集於投票的地方，從事於一九二三年後第一次的全國選舉。議員候補者代表着二十五個黨派，其政見各各不同，自極右的君政主義至極左的共產主義。投票的結果又證明了君政派的大敗及共和派的勝利。社會黨獲得一百十七個席次，成爲新國會中最大的一黨。主張鞏固共和國並完成許多改革的急進黨則居第二位，有九十三個議員，四百七十個席次的其餘之數則爲其他十二個黨所分。雖然此次選舉祇准男子參加，選出來的議員中也有兩名是女子。議員中大多數爲青年人，僅有十四人從前曾當過議員。國會開會後，先議決維持柴謨拉所派定的臨時內閣的政權，然後進行討論共和國的憲法。當憲法草案正在一條一條的被接合攏來的時候，內閣則致力於解決更直接的問題。它盡了很大的力量來穩定貨幣，遂行行政上的緊縮政策，並增加政府的辦事效能。有一半文職官吏被罷免，其餘留下來的的人的薪俸則增加了五分之一。柴謨拉總統費了很多的口舌，纔說動加達魯尼亞州的議員留在國會，並答應先成立關於中央政府的權力的協定，然

後商議關於地方的，蓋當時加達魯尼亞州民衆投票的結果大半贊成前述的自治法。即令如此委曲求全，政府終不得不於九月間派遣一萬兵到巴塞羅那去討平過激派與地方主義者聯合的作亂。

此外，政府又得與羅馬教廷進行關於革命初起時教會財產所受的損害及共和國的將來政策的談判。因為西班牙全部非天主教的人民還不到三萬，所以政府與教皇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當國會於十月間採取廢除國教，驅逐耶穌會會員，沒收其財產，並禁止各教派中人傳教或經營商業等決議案的時候，大總統柴謨拉就辭職了（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他的行動乃表示對於他所認為不當如此嚴酷的條件的抗議。

行政元首之職於是落到阿紮那（Azana）的身上，他是急進黨的黨魁，並做過柴謨拉政府裏的陸軍總長。他做陸軍總長的時候，因能使軍隊民主化並使之從政治的爪牙變為國家的干城而博得盛名。國會對於他的能力與忠直既很信任，所以賦與他鎮壓叛亂與暴動的非常權力。

十二月九日，國會最後公布了新憲法。它雖是以德國、俄國和墨西哥的藍本所草成的，卻是現代最合乎民主政體的根本大法之一。西班牙被稱為『各階級勞動者之民主共和國』。政府包括一院的國會，國會議員由年齡滿二十三歲，不分性別之一切國民，以平等、直接、祕密的投票權選舉之，任期四年。共和國的總統由全體國會議員所組織的選舉團與同數（四七〇）的民選選舉人共同選舉之，任期為六年。總統職不得連任，凡現役或預備軍官、教士或任何國家之王族中人均不得為總統候選人。總統的權力是很大的，但其行為非經內閣閣員一人副署，不發生效力。總理與內閣閣員有廣大的權力，直接對國會負責。再者，國會於每年中祇可被停會兩次，於每一總統

任期中祇可被解散兩次。

新憲法中關於社會與文化的事件，打破傳統法式的地方很多。國家教會沒有了；完全的信教自由業經規定了；婚姻得以雙方之同意或因任何一方具有正當理由之請求解除之；教育脫離宗教而還俗了；人民的各種自由，除在國家緊急之時外，得到保障了；本國所有一切藝術的和歷史的寶物皆置於政府保護之下，政府得禁止其輸出或要求收用之。戰爭『被否認爲國家政策之工具』，大總統雖具有宣戰的權力，但『除遵照國際聯合會盟約中所規定之條件外』，及除在用盡其他一切非戰爭的防禦方法而歸失敗之後，不得行使此權。

爲使西班牙成爲人民享有社會上之公平與均等機會的國家起見，憲法中規定本國的一切財富皆屬於國家經濟的利益。國家得『參與發展並調整各種工業與企業』，使一切公共事業供國家之用。國家可以以適當的賠償，收用各種的財產，不問其原來的所有權屬於何人。工作成爲社會的義務，國家負有保護工人農民與漁人的責任。

關於地方自治，憲法祇承認自治的區域與國家之完整性相合這一點，這使一般主張地方完全自治的人大失所望。凡欲自治的區域必須將地方的憲章提出於國會，請求批准，國會得以施行某種國家法律的權力委託於地方機關。

依據憲法後面所附特別規定的『暫時處置』，國會有權選舉第一任憲法所定的大總統。此項暫行規定於十二月十日實行，國會的選擇落於柴謨拉身上，他以前辭去過臨時大總統之職。到這個時候，國會本應解散並頒

佈選舉新國會的命令，但國會不這樣做，反決定繼續行使其職務。原來一般議員恐怕總選舉會表現人民對於它本身的政策的反感，並且覺得草定憲法的國會也應該延長其任期，以便開始使憲法的原則見諸實行的立法程序。

國會的最動人聽聞的行爲之一，即宣布廢王阿爾方朔第十三犯有叛國的大罪。他所有在西班牙的一切財產都被沒收，其本人如再踏入西班牙的國土，即受「永遠監禁」之刑。王家的苑囿公開開放，有幾處宮殿被改爲官署或公共建築物。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耶穌會被解散了，其含有財產，價值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者，由國家收有。次年九月，政府頒佈一件法律，命將此項財產分配，以爲社會公益事業之用。此外的耶穌會所有物，估價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者，則未能充公，因爲這些財產都是以私人的名義而保有的。自然，各個耶穌會會員不久就離開本國了。國會特於一九三二年的聖金曜日（耶穌受苦日）舉行了一次會議，其意似乎在再加着重正流行於共和國的新精神。

政府企圖扶助國內的工業，把關稅更加提高，雖然西班牙的關稅壁壘在歐洲已經算是最高的了，但同時西班牙又和許多國家商訂了特別的商業條約。那個「橫斷大西洋公司」(Compañía Transatlántica)因爲老是不敷出，終被解散了，西班牙的橫渡大洋的航業亦告停頓。駐外的軍隊業經裁撤，發展西屬摩洛哥的政治與經濟的計劃已在開始。儘管經費不足和教員的人才缺乏，在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二年中，開辦了七千五百所的新學校。然而這一方面的工作有待完成的還是很多，因爲西班牙的文盲依一九三一年的統計仍在百分之四

十五以上。土地的改革進行得很慢，但在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國會通過了一件法案，規定以五二、〇〇〇、〇〇〇英畝的土地（從前爲大地主所有者）分配於公共農場。到一九三二年之終，西班牙之民尙未見經濟的繁榮，因此有很多人批評，在這個窮困的時候，大總統的每年薪俸和應酬費竟達一八〇、〇〇〇元，是不應該的。

我們當然不能期望那般自治派團體會滿意於憲法中所給與的地方自治之讓步。在一九三二年四月，有十萬加達魯尼亞人集會要求馬得利政府馬上承認該州領袖所草定的自治法。和愛爾蘭的新芬黨（Sinn Feiners）一樣，加達魯尼亞人也組織了一個黨，叫做「我們自己」（Nosotros Sols）並常常作示威運動，其紛亂無時或息。從六月到九月，國會反復辯論地方自治法案，終於九月八日承認加達魯尼亞的自治法。此項法律由總理阿紫那公佈於巴塞羅那（九月二十五日），成千成萬的加州人歡聲雷動。

自治法給與加達魯尼亞以下各項：得使用其本地的語言，國歌與旗幟的權利；得設立邦政府（亦有總統與國會）；得以加州文字與西班牙其餘各州正式通函的權利；及徵收稅項，創立學校制度，與施行國家法律於該州的特權。巴斯克州、加里西亞及其他非屬於卡斯提爾的區域此刻更堅持要求同樣的自治權了。由許多西班牙人看來，似乎這個共和國最好能改變成爲一個聯邦制的國家。

一九三三年就在眼前了，當斯之際，西班牙共和國很可以回顧它的許多成功的事業而引以自豪。但同時它必須向遼遠的前面注視，前面有亟待解決的內部建設，地方主義者的紛爭，及各經濟黨派和文化團體間相衝突的利益。

第十五章 德意志

從帝制到共和政體

一九一四年的秋季，德意志帝國政府向帝國議會提出大戰信任案，那時候所有的政黨，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一致投贊成票。但是，當着國家的生死關頭，這一種齊心的擁護決非對於政府平時的一般政策的贊同表示。帝國的許多政制頗遭反對：總理大臣是對德皇負責，而不是對下議院負責的。上議院的議員係受幾個聯邦的統治者委任而對他們負責，並非受人民委任而對人民負責。德皇居於普魯士王的地位，事實上支配着上議院，上議院則比帝國議會具有較大的權力。普魯士邦內的不合民治精神的投票制度，早已受到批評的襲擊，在普魯士，較富的公民比較貧的公民具有較大的投票權。最後，社會立法和勞工改革不能完全與二十世紀的需要並進。當時雖有這些不平，然而大多數德意志人民仍在一九一四年準備羣策羣力來衛護祖國而反抗他們所認為無法無天的仇敵。

大戰既繼續進行不停，由數週延長而為數月，由數月延長而為數年，人數激增的社會黨黨員漸認這種戰爭為帝國主義者與資本主義者的投機，而不是一種自衛的需要。社會民主黨內分明發生裂痕，在一九一五年春季

就更顯然了。以孚利德里區·亞伯特 (Friedrich Ebert) 和腓力普·晒得曼 (Philip Scheidemann) 爲首領的大多數黨員，深信應繼續支持大戰；哈斯 (Hugo Haase) 所領導的少數黨員反對再予政府以戰時信任。哈斯於一九一六年之初在國會中宣言，他和他的黨徒絕對反對戰爭因任何原因而延長，一年之後，這般人組織了一個獨立社會民主黨，主張馬上實現不割地的和平。

有些激烈分子甚至認哈斯的一派爲過於保守。這些同情於共產主義的人們在李普克尼希 (Liebknecht) 和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領導之下，抨擊大戰，主張建設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制。一九一六年一月，李普克尼希開始印行反對大戰的信札而署名爲「斯巴達卡斯」 (Spartacus)，因此他的黨徒漸以斯巴達卡斯黨著名。該黨首領之終被監禁，並未減少他們的騷動程度，特別因爲軍隊未能早日博得勝利的和平，這種失敗漸漸把社會黨大多數黨員和厄爾士柏格爾 (Mathias Erzberger) 所領導的天主教徒中央黨的好感也失去了。

一九一七年七月，總理大臣柏特曼·和爾味 (他自一九〇九年卽任此職) 辭職了。他的繼任者米哈亞力斯博士 (Dr. George Michaelis) 在報告戰爭勝利或改善不佳的收穫方面，並不比柏特曼更有能力。因此，三個月之後，米哈亞力斯讓位於巴威 (Bavaria) 邦的總理，一位學問淵博的教授，赫特林 (Hertling) 伯爵。赫特林拒絕實行民治精神的改革，甚至在戰敗的保加利亞退出戰爭之後，也是如此，這種態度使他在一九一八年不得不退休。最後，開明的巴登邦諸侯瑪克斯 (Prince Max of Baden) 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二日組織了一個中和的聯合政府。社會黨多數派的兩位領袖，晒得曼和寶厄 (Bauer) 也加入內閣。瑪克斯決定施行廣大的改革，希望挽救

搖搖欲墮的霍亨索倫 (Hohenzollern) 氏的皇座，但是在他得到任命的時候，一般不滿的空氣已成爲不吉的預兆了。

其時協約軍的封鎖正在破壞德人的糧食供給。收穫的不佳使情形更壞，特別是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間的「萊蕪冬季」時期內。民衆饑寒交迫，僅僅富人能够暖衣飽食。同時藉戰爭獲取不正當利益的事情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再者，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替可憐的德國人樹立了一種令人鼓舞的榜樣，而俄國の間牒正忙於從事破壞的宣傳工作。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兵工廠已發生罷工。這次的罷工雖經當局嚴厲制止，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繼續有第二次罷工，而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又發生帶有政治目的的第三次罷工。在柏林和厄森 (Essen) 地方有五十萬人民在最後一次罷工的時候會脫離工作達一星期之久。罷工者不會有暴亂舉動，但政府決心嚴厲處置爲首滋事者，有許多曾因在主要工業中占有職業的關係而被免除軍役者現在都被遣往前線，作爲懲罰。這些人在前線竟成爲向兵士散播反叛思想的危險分子。

德國的海軍也不安靜了。他們被圈在軍港中已有數月，水兵們除閱讀革命主義的書籍並窮究其哲理外，簡直無事可做，他們對於酌酒的軍官又發生惡感。軍官們則因久不活動而憤慨，其中有許多人雖曾呈請德皇委派他們到陸軍中去服務，可是徒然。其時，一般有思想的德人已明白，英國人民決不致受潛水艇戰役的影響而成餓殍，而海軍大將提庇磁 (Tripitz) 最近組織的那個愛國的祖國黨所預許的許多擴張領土之諾言非但可笑，且永不能達到。並且，美國的參戰畢竟擔任了協約國方面巨大部分的工作。

當盧登道夫在一九一八年的大進攻完全失敗的時候，就已預示霍亨索倫皇朝的崩潰。餉糈缺乏，軍備不足，而感於激烈宣傳的德國軍隊已準備脫離戰爭，回到家鄉。他們絲毫不想再爲了皇帝或爲了資本家作更大的犧牲了。此時瑪克斯充滿着勇氣，施行了許多改革，把德意志變爲君主立憲國。於是皇帝成爲有名無實的元首，僅僅是統一的象徵罷了。內閣採用責任制，國會具有決定宣戰與媾和的權力。人民得到言論，出版與集會的自由，政治犯則經宣告大赦。在普魯士邦復預許了選舉制的改革。最後，瑪克斯與威爾遜開始休戰的談判。他小心地指出，新德意志政府是一種「人民的政府，人民在憲法上和實際上握有決定國事的權力」。

將近一九一八年十月之終，國內時常聽到皇帝應即遜位的聲浪。因爲威爾遜堅持，只要帝國政府當權一日，他祇能討論德國的降服而不能談判和平，所以許多德國人漸認威廉爲和平的障礙。十月二十三日，哈斯在國會要求德皇遜位。翌日，社會黨大多數派諾司刻（Noske）提出同樣的請求。各報紙迅即響應這種呼聲，在二十九日晚，社會黨大多數派首領施曼要求瑪克斯設法使威廉遜位。是夜，德皇僅向總理大臣遞送最後一分鐘的通書後，即從柏林逃往軍隊大本營所在的斯巴（Spaa）地方——避免流行性感冒（指革命）的危險！

其時，海軍根據地的基爾（Kiel）發生了（十月二十八日）一件不幸的事情。當各方謠傳休戰談判的結果大概會強迫德國將艦隊交與協約國的時候，德國的軍官決定先發制人。他們寧願向英國艦隊施一突然的——也許是勝利的——攻擊，而在此攻擊中求一英武而榮譽之死。但是，被預定參加這次戰鬥的八萬水兵，卻無意於成爲捐軀的英雄。他們表示願意守護德國各海岸，抵抗英國的攻擊；但在休戰談判進行之時，他們拒絕參加這種

整個自殺的險舉。結果就發生兵變，繼之以逮捕、槍殺和紅旗高舉。不久，叛亂的精神延及基爾的工人，在那裏有各種革命會議組織成立，要求霍亨索倫氏遜位，特赦以前兵變中的首領，及平等的選舉權。其他城市都學基爾的樣，到十一月七日，沿德國北海岸一帶，要求設立共和國的呼聲是很普遍的。

政府希望將這些局面的發展隱瞞德國的其餘部分，但是徒然。十一月七日，慕尼黑地方舉行了大隊示威運動，一位屬於獨立社會黨的主筆埃斯納（Kurt Eisner），即乘此機會要求以武力推翻巴威王朝，維忒斯巴赫（Wittelsbach）王和他的家族匆忙逃走，人民就組織了農工兵的會議。八日，巴威邦成立了一個以埃斯納為總統的「民主的和社會的共和國」。在柏林和德國各主要實業中心，同樣的會議也紛紛建立，共和的宣言也到處公布了。的確，這種運動所蔓延的地方很廣，故秩序並未發生大衝突。社會黨多數派的首領深懼許多黨徒的歸附於更激烈的獨立黨，乃警告瑪克斯，除非德皇在十一月九日之晨遜位，他們就要辭去政府職務，要求廢去威廉，並宣佈實行總罷工了。

在斯巴的威廉，不肯聽從總理的央求。他堅決盼望陸軍幫助他保留皇位，甚至不惜違反德國人民的願望。但是，參謀本部終說服了他，要軍隊爲了他和德國人民交戰，是不可靠的。在著名的斯巴會議（十一月九日舉行）席上，就是與登堡也認爲遜位似乎是最聰明的步驟。正在亞伯特和晒特曼造訪總理官邸，宣告社會黨的最後通牒限期已滿的時候，瑪克斯從斯巴得到德皇正在考慮遜位方式的消息。所以，當亞伯特允許維持秩序並召集國民會議的時候，瑪克斯就覺得把政府交與亞伯特是很妥當的。

十一月十日的早晨，德皇威廉逃往荷蘭，皇太子不久也去了。然而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霍亨索倫先生（指威廉）纔以他自己的和全族的名義送出完全遜位的詔書。到那個時候，所有各邦的諸侯都已逃亡，帝國遂一變而為聯邦共和國，暫時歸六個人民委員的會議統治。這個人民委員會是由三個社會黨多數派領袖和三個獨立社會黨領袖，在亞伯特與哈斯共同主席之下組成的。以前在帝國政府服務的許多下級職員為愛國心所激動，仍繼續在新政府內供職，但斯巴達黨人復在已出獄的李普克尼希與盧森堡領導之下，拒絕與現政府合作。人民委員以演講和傳單懇求人民維持秩序，視人類生命為神聖不可侵犯，並保護私人財產。

斯巴達黨之反對設立中產階級的或社會主義者的共和國，同他們以前反對帝國一樣熱烈。他們利用他們的機關報「紅旗」和他們的恐怖行為，奮力阻止國民會議的召集，他們希望至少使國民會議延遲到他們的策略能威嚇大多數人民，迫之接受共產黨專政的觀念之時舉行。

社會黨多數派和獨立社會黨從前為了終止大戰的問題而分裂，現在遇到這樣一個政敵，它們似乎應該可以重新聯合一致了。但在兩派疏遠期內，獨立黨變成更激烈的了，此刻他們又贊成將工業迅速社會化並收歸國有，且主張國民議會選舉延期舉行，直到社會主義者的統治權已趨鞏固，絕無被傾覆之可能的時候。社會黨多數派以為工業國有政策須緩緩進行，竭力主張對於財產所有者應予補償並欲用投票的方法早日表示一般人民的意見。

選舉日期的問題最後由各會議的全國大會解決了。地方會議都模仿着柏林和慕尼黑兩地的兵士工人所

組織的會議，在德國全國出現了。牠們又往往僭取政府的權力。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這些會議的全國大會舉行了。在舉行時，社會黨多數派大喜過望，因為大會議竟把共產黨徒摒除在外，並決定早日舉行國民議會選舉（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惱怒的共產黨徒希望在這些行動中看到反革命的萌芽出現，乃煽動柏林的水兵與海軍陸戰隊叛變。在當局用武力制服反叛分子的時候，獨立社會黨黨員一致辭去政府的或各邦的職務。這種情形使社會黨多數派能够以忠實的擁護者充任空出的職位——甚至填補六人委員會中的缺額。

在等候選舉日期到臨的當兒，人民委員會必須完成回來的軍隊的復員事宜，不願聯軍的繼續封鎖而設法避免饑餓，制定數種立即實施的經濟與社會的改革方案，並遏制極右派與極左派的活動。許多德國人之渴望法律與秩序，他們的愛國心和願意接受任何適當的政府（只要它能安穩地行使職權）的傾向，在在使內部統治的問題此所預期的較為容易解決。但是，爲預防斯巴達卡斯黨方面作難起見，人民委員會準備了一枝裝備齊全的軍隊約三千人，以帝國時代的軍官爲指揮。

其時，斯巴達卡斯黨也組織了武裝隊，徜徉於大城市的街上，準備隨時暴動。這些極端派的「發言者」就是「斯巴達卡斯」李普克尼希他自己。他對於凡是缺乏徹底的共產主義的事情都不滿意。這個運動的「智囊」是一個殘廢的波蘭籍猶太女人 盧森堡，她由於婚姻關係而成爲德國公民。共產黨徒選定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至十二日這一週爲奮力推翻政府的日期。

爭奪政權的衝突在正月六日星期一達到了高峯，當時有一羣二十萬同情於斯巴達卡斯黨和獨立社會黨

的武裝工人在柏林的中心集合。假如這些人有剛毅的領袖領導他們，政府或竟毫無抵抗而顛覆。因為那幾個人，民委員，自己是出身於工人階級的，深懼遣派軍隊攻打他們的同類。他們彼此推諉不肯負起應付危局的責任，到後來終由諾司刻（Justav Noske）接受了這個任務，他說：「好！總須有一個人做獵狗，我不規避這種責任。」諾司刻是一個富有經驗的罷工組織者，不怕對付工人的，但他在當時只有幾千人可用以對抗龐大的武裝暴衆。這真是政府的幸運了，在決勝負的千鈞一髮之際，過激的領袖竟使人民大失所望。一位屬於共產黨的記者譏諷地描寫那危急的一天的事件道：

自清晨到九點鐘，民衆矗立在冷風與迷霧裏。首領們在此處或彼處坐着從容討論。迷霧消散了，民衆卻繼續站立着。但是首領們依然在討論。正午到了，飢寒也隨着來了。而首領們仍討論着。民衆憤火中燒；他們要求做一件事或說一句話以和緩他們的焦急。但沒有人知道應做什麼事或說什麼話，因為首領在討論着。迷霧又起了，黃昏也隨着到了。民衆沮喪地回到家裏；他們原期望幹許多大事，結果他們沒有幹什麼。因為首領們討論……他們討論着，討論着，老是討論着。

共產黨隊伍與警察或軍人之間的巷戰天天繼續進行，直到一月十五日纔止，在那一天，李普克尼希和盧森堡都被逮捕——在送往監獄的途中就被槍決了。「斯巴達卡斯週」的目標未能成功，而斯巴達卡斯黨運動遂瓦解了。一月十九日，國民議會的選舉在比較寧靜的空氣中舉行了。

在三千五百萬合格的，年齡在十九歲以上的男女公民之中有三千餘萬人依照規定的代表比額投票。到選舉的時候，許多舊政黨都經改組，有幾個且已另立名稱。以前的保守黨依據保皇黨的黨綱而改組，稱爲德國國家主義黨。以前的國家自由黨的右派，大多數是重要的商人，則在史德理斯曼領導之下改組爲德國人民黨。此黨雖然贊成帝制，卻爲了顧到內部的和平與國家的統一而準備擁護共和政體。

在厄爾士柏格爾領導之下的中央黨，暫時變更他們的黨名爲基督徒民主黨，但不久仍恢復原有的名稱。他們贊成設立民主共和國，制定保障人民權利的法案，和進行多量的社會立法。以前的國家自由黨左派與進步黨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新的民主黨，以銀行家施顯特(Hjalmar Schacht)爲首領。民主黨贊成設立中產階級的共和國，反對軍人的官僚政治重臨，預許爲工人謀法律上的保障，並主張檢舉利用戰爭牟利的人。社會黨多數派重新採取社會民主黨的名稱，繼續主張財產和工業的逐漸社會化，而獨立社會黨卻力主財產和實業應迅速收爲國有。已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改稱德國共產黨的斯巴達卡斯黨拒絕參加議會的選舉。

當計算選舉結果的報告時，社會民主黨爲議會中最大的一黨，因爲它在四二一席中佔有一六三席。中央黨得八八席，民主黨得七五席，國家主義黨得四二席，獨立社會黨得二二席，而人民黨得二一席。其餘十席歸於四個少數黨。有三十六個女子當選。爲保護大會以防任何可能的羣衆暴動起見，亞伯特乃於二月六日在安靜的韋瑪(Weimar)城召集國民議會。

國民議會在指定的一天集會，立刻採取以前所草定的臨時憲法，以爲統治的基礎。於是六人委員會交出它

的政權，社會民主黨，中央黨，和民主黨所組的「韋瑪聯合內閣」就成爲正式的政府。二月十一日，國民議會選舉亞伯特爲共和國（Reich）的大總統。亞伯特以前是海德爾堡（Heidelberg）的馬鞍匠，自與晒特曼爲溫和的社會黨的共同首領後，纔漸露頭角。他在就職的誓詞中，自稱爲「工人階級的兒子，在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中長大的」。他說，他既爲總統，當自認爲「全體德國人民的法定代表，而不是一個政黨的首領」。晒特曼被任爲國務總理，而藍遭（Brockdorf-Rantzau）伯爵（他未加入任何政黨）爲外交部長。

國民議會當前的有三重任務：打消國內的反對，與協約國媾和，並爲共和國制定永久的憲法。諾司刻居於國防部部長的地位，處理第一項的任務。其時德國有許多礦區與鐵路工人的罷工，並且到處發生衝突。在一個國家主義黨黨員暗殺埃斯納（Kurt Eisner）之後，慕尼黑地方成立了共產政府。諾司刻決定斬釘截鐵地「和那般瘋子總算帳」，他藉了幾個卸職的軍官的幫助，猛力進行撲滅全國的激烈運動，結果到一九一九年的夏季，有一萬五千工人悉遭殺戮。此後，就不怕有來自這一方面的糾紛發生了。

進行講和顯然是更難的任務。議會中各黨派耗去寶貴的光陰於彼此以戰爭的失敗互訐，而沒有一黨準備接受協約國在五月七日所提出的條約的確，晒特曼寧願辭去國務總理之職，而不願承認這種條約。但因協約軍揚言如德國議會拒絕這些條款將有嚴酷的懲罰，故除接受外，無選擇的餘地。因此，在六月二十三日，恰在限期將滿之前，韋瑪議會的代表終接受了這個條約。

國民議會的最後一種任務，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以二六二票對七五票通過採取憲法而完成的。

此項憲法的條文是依據普墨斯 (Perleb) 教授所擬的草案制定的，他是一個民主黨黨員而為反對各邦權利者。在最後的投票中，社會民主黨、中央黨和民主黨贊成此項憲法，而獨立社會黨、人民黨和國家主義黨則加以反對。亞伯特於八月十一日簽署了這個牠包括一八一條條文的憲章。

憲法將最高的權力歸諸人民，並闡明「Reich」為各共和邦（稱為 Lander）的聯合政府，（註一）聯邦政府對於外交、殖民、外來之移民、國防、鑄幣、關稅、郵電等事宜，具有通常的中央權力。此外，它又有制定關於下列各項之法律的最高權：即鐵道和水上交通；救濟貧民；保護產母、寡婦和孤兒；保護動植物；利用天然富源；保險；教育；保護工人；和審查電影。中央政府又得對數邦指示施行國家法律的最善方法。（註二）憲法中訂有保障人民權利的習慣條文，並規定二十歲以上的男子與婦女都有依據代表比額的選舉權，婦女與男子在公民資格上處於絕對平等的地位。

（註一）在一九二〇年，德國有十八個這樣的共和邦。一九二九年後，普魯士邦與瓦爾德克 (Waldeck) 邦合併，所以只有十七邦了。

（註二）減少各邦的權利到最低限度的趨勢不久引起了衝突，尤其是在中央政府與巴威邦之間，後來前者稍有讓步，再者，若干巴威人因爭執各邦權利的問題脫離了中央黨，另組一個新的巴威人民黨。

憲法中有一條規定，大總統應由人民普選，任期為七年。凡年齡在三十歲以上的德人都有被選充此職的資格，可以連選連任。總統得因下議院三分之二票數的彈劾，由人民複決罷免之。如總統在民衆複決中失敗，他必須去職，永不能再當選為總統；如人民仍擁護他，他的任期就從投票之日起繼續七年。德共和國不設副總統。

國民議會之厭惡獨裁政治，在它對於行政首領的實權所加的限制上可以看出，蓋在理論上，這種實權是很廣的。總統得代表國家，委派並接見大使，簽訂條約，任命並罷免政府的一切官吏（關於官吏之遴選，法律中並未另行規定），他又為海陸軍大元帥，得用武力使各邦履行憲法所加於它們的義務，並有大赦之權。他可以解散國會，但此項行動的藉口只能使用一次，而新的選舉必須在六十日之內舉行（第二十五條）。在國家緊急時期，總統有權停止憲法中某種保證之施行（第四十八條），但必須以此種非常處置立即通知國會，經國會要求後，該項保證應廢止之。然而，因為他的命令非經國務總理或主管部部長的副署是無效的，所以總統在實際上僅能依照內閣的意志運用他的職權，而內閣本身是對於下議院負責的。

國務總理有權決定政府的一切政策並遴選內閣的閣員，他是由總統任命和罷免的。各部部长不必為國會的議員，但他們直接對國會負責。內閣之辭職必經國會投不信任票後始可實行。內閣之決議案應由大多數表決通過，國務總理在贊成與反對之票數相等時有權投票決定。設在勒不士格地方的最高法院祇有有限制的最初裁判權，牠的主要職務在為上訴的裁判所，以擔保法律的統一解釋。普通的司法問題歸各邦自行決定。

最高立法機關是國會（Reichstag），議員由人民選舉，任期四年。一九二〇年後，國會選舉是根據了巴登的代表比額制舉行的，依照此制，每個政黨有六〇、〇〇〇票就可獲得一席代表。因為選舉者的人數時有變動，代表人數也隨了每次選舉而變動。雖然這個計劃能保障少數的權利，但牠有幾個重要的缺點。所有代表是依照政黨所開名單上的名次當選的，名列前茅的人自然有獲勝的最好機會。候選人與選舉人之間絕無接觸，而選舉人

祇能就政黨名單投票而不能爲個人投票。這種手續，很容易使政黨機關能夠爲他們所愛的人員獲取職位。

國會必須在選舉後三十日之內集會。在國會休會期間，所有外交事宜和內閣的設施分別由兩個常置委員會監督辦理。國會得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上議院所否決的法律，但遇此項情形時，總統得於三個月內請求國民複決之。凡有十分之一的合格選舉人簽署請願書，要求制定某種法律時，國會必須立刻予以通過，或者交付國民表決之。

上議院是代表各邦的，稱爲聯邦議會（Reichsrath）。牠可以維持國會所通過的一般法律，但不能否決之。然而涉及各邦的任何法案之通過，需要牠的同意。每邦得選舉代表至少一人於上議院，較大的各邦在其人口每七〇〇、〇〇〇人中可以有一個代表。可是，因恐普魯士邦佔壓倒一切的勢力，所以規定任何一邦不得有超過全數五分之二之代表。上議院的代表同時是各邦內閣的閣員，受各邦政府的俸給。上議院與國會不同者，它永不被解散的，雖則它的組織常有更改。在每一次戶口調查之後，上議院的議員人數就變動了。在一九三二年，上議院有六十八位議員。

德國沒有國家資助的教會，保障宗教的自由。教育歸各邦監督辦理，教員被認爲公務人員。國民應受強迫教育，直到十八歲爲止。私立學校祇在少數例外情形中容許設立，並且是爲了顧及宗教課程的緣故。憲法規定學校應授關於藝術，最新的科學發明，與國際和平等科目。自然，在此種方案能夠全完實施之前，在立法和籌款方面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憲法中的經濟條文可以顯出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的影響。一切私人財產必須用以「謀取公益」。『爲滿足建築住宅的需要，促進移民和開墾事業，或改良農業起見』，地產的公用徵收在法律上是許可的。適於社會主義化的私人企業，得於給予相當補償後轉移爲公有。憲法中又定有防備疾病、年老、失業和災害的國家保險制度。

憲法第一六五條是關於一種曾在德國及他處盛行一時的有趣現象——工會運動的：

工人與僱員之法定代表團體應爲保護他們的社會與經濟的利益而設立，此種團體即地方工會，依照工業區域的劃分而組織之區工會及全國工會。

區工會與全國工會應與僱員代表及工界其他有關部分之代表聯合，從事組織各區經濟委員會與全國經濟委員會，以完成一般之經濟任務，並協助行政機關施行特殊之社會主義化法律。

關於社會與經濟政策之法案，應於提出於國會之前由內閣送交全國經濟委員會徵求意見。全國經濟委員會本身亦有提出此種法案之權。政府如不贊同此種法案，仍須提交國會討論，並附政府觀點之說明。全國經濟委員會得派遣會中委員一人爲代表列席於國會，擁護所提之法案。

全國經濟委員會大半因爲本身組織不健全的關係——牠有勞方、資方、消費者和政府的代表——未能盡其職能。在實際上，牠對於國會已變成關於經濟問題的顧問委員會了。牠難得舉行全體會議，但是牠的三個分部，分別掌管財政、社會事業和政治事件者，卻常常舉行常會。

憲法既經通過，國民議會所因召集的工作，就告完成了。但是，那個團體非但不解散，反而移到柏林的國會大

廈（一九一九年九月三十日），自行宣佈爲共和國的正式立法機關。總統亞伯特的任期被延長了，在一九二二年，又經國會通過連任，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爲止。

共和政體的維護

在採取憲法後若干時期，德國的共和政體是不很穩固的。當政府集中牠的力量於撲滅共產黨徒的時候，從前的軍官，普魯士的貴族黨（Junkers）舊保守黨與其他不畏死之徒，竟趁此機會設立了幾個強有力的保皇團體，如『正誼社』（League of the Upright）和『鋼盔團』。保皇黨擬就了對於共和黨人和國民議會聲討的長篇罪狀。據說，畏葸的共和黨人在大戰的最後數月中陰損帝國的兵力，使德國得到不可避免的戰敗。攻擊國民議會的接受凡爾賽條約，並容許協約國的各種委員會來蹂躪本國。有些人深怕政府當局或許將所謂『大戰的罪犯』引渡於協約國審判。最後，德國有很多人感覺，國民議會會拒絕舉行正式的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以防與登堡當選爲國家的最高首領而爲保皇黨開復辟的先路。

一九二〇年三月，在卡普（Wolfgang Kapp）博士所計劃的政變陰謀（Putsch or Coup）中，反動派的活動達到了頂點。卡普博士出世爲新約刻人，是東普魯士農業信託銀行的創辦者，在大戰期內曾以猛烈攻擊柏特曼的懦怯政策並幫助海軍大將提庇磁（Tirpitz）組織祖國黨而著名。他在革命時期沒沒無聞，但自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他常和廢皇的心腹如盧登道夫和提庇磁輩通消息。柏林提督兼陸軍中高級將官的呂特微茲

(Littwitz) 將軍和陸軍少校佩勃斯特 (Pabst) 都醉心於卡普的有力的復辟計劃。這三個人自己統率了八千兵士，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清晨從陸軍營房向柏林前進，走了十二哩路。諾司刻僅有二千人可用以抵抗陰謀者，結果亞伯特政府逃往德勒斯登 (Dresden) 接着再逃到司徒嘉德 (Stuttgart) 以求安全。

卡普未能盡量利用他的機會。他非但不能自居於強者的地位，反而與他的敵人力求講和。在應取迅速行動和大膽冒險之處，他一味手足慌亂，猶豫不定。但他的一星期的統治趨於顛覆的主要原因，實爲工人的態度。自亞伯特發出鼓動人心的宣言後，全國的工人就舉行總罷工。水電、煤氣和電車等公用事業都停止了，甚至鐵道的交通只在必要的地方纔得照常進行，俾人民不止受到不當的困苦。卡普自己的信徒現在向他嘲笑了，他乘了飛機從柏林逃到瑞典，留下一篇自誇功勳的冠冕宣言。然而他不久就回來了，並向當局投降了，結果未及受審即死在獄中。呂特微茲則逃往匈牙利，佩勃斯特則在奧地利求庇護。顛覆政府的威嚇就這樣過去了。

雖然政府暫時戰勝了反動派，它不久又遇到左派的攻擊。獨立社會黨慫恿工人繼續總罷工，直到可恨的諾司刻（他前曾組織軍隊槍殺工人）辭職，直到政府軍隊解散，並直到正式的國會選舉舉行之時方止。政府在這種壓力之下接受了諾司刻的辭呈，並定一九二〇年六月六日爲舉行國會選舉的日期。

在這次選舉之中，組成韋瑪聯盟的三個穩健的共和政黨大爲失勢，從三二六席落到二二五席，社會民主黨單獨失去了五十席。反之，國家主義黨、人民黨和獨立社會黨比在前次選舉中多得一二四席，共產黨也選出了兩個代表。在這第一次正式選舉的共和國會之中，就有代表人民黨、中央黨和民主黨的聯合政府組織成立。一位著

名的中央黨黨員非朗拜喜 (Konstantin Fehrenbach) 成爲國務總理，他曾任韋瑪議會的議長。

卡普事件並未終止反動派對於「出賣」祖國者復仇的企圖。他們對參與和平條約之簽署的人們，幫助或通消息於駐在德國的各種協約國委員會的人們，及被認出爲社會主義者的人們，開始作恐怖行動。猶太人與天主教徒也在受攻擊之列，危害亞伯特和晒特曼的生命的陰謀亦在進行。中央黨首領厄爾士柏格爾曾在一九一七年極力主張不割地的和平，後來又以財政部長的地位施行激烈的財政方案，在一九二一年八月被暗殺了。接着在一九二二年六月，那位聲名顯赫的猶太人刺忒諾 (Valer Rathenau) (他是一個成功的實業家和具有慧眼的政治哲學家) 也被狙擊了。他人很年青，幹練，有魄力，並且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在做軍需署署長和建設部部長的時候，已表現出有非常的辦事能力，他的早死對於共和國是一種不可挽回的損失。政府鑒於局勢的嚴重，乃停止憲法上各項保障條文的施行，並通過保衛共和國的特別法律來對付這些暴行，但是騷動仍繼續着。

一九二三年，另一推翻現政府的陰謀即盧登道夫——希特勒的政變運動在巴威醞釀了。盧登道夫將軍——「政界的不可可能者」(impossibilist in politics) 和希特勒——一位奧地利人(他希望摹倣墨梭里尼的向羅馬前進而向柏林前進) 想出一個奪取政權的計劃，但不久就與考斯道夫豐·卡爾 (Gustav von Kahr) 所領導的巴威叛黨發生衝突。結果，整個事件變成爲最不名譽的「酒館混戰」，牠的唯一結果就是使受窘的當局增加煩惱。實在，當局除對付反動派外，尚有其他有待解決的問題。現在只一提其中較紛亂的，即有賠款法，比侵入魯爾，馬克價值猛跌，失業人數激增，工廠倒閉，飢民和可能的「赤禍」問題。

幸賴經濟的關係和人民的愛國心合成堅強的黏力，共和國的生命纔得苟全，否則德國或竟成爲齋粉了。同時在政治形勢上亦有一線希望，即社會民主黨與獨立社會黨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重行結合，而爲聯合社會民主黨，保證維護共和政體，反抗共產主義與反動，並保護工人的幸福。

財政的面面觀

以前德意志帝國政府對於大戰深信可以早日博得勝利的結束，以致毫不注意爲付償鉅額戰費而增加的捐稅。當局反而寧願依賴人民的愛國心和信任心，使他們購買大戰公債，並依賴印刷機。國家銀行（Reichsbank）在事實上有權接受國庫券和證券以爲添增的紙幣之保證物。自然，結果稅率是提高了，而那種非常時期收入的來源如「大戰利益稅」和「買賣總額稅」也產生了；但是德國在實際上祇能以直接徵收的稅項供給它的戰費百分之五左右，舉例言之，英國卻能以此種稅供給它的非常經費百分之二十以上。當大戰終了的時候，市面上的馬克五倍於一九一三年所有的。然而，因爲外界不明瞭確切的事實，並因爲曾有一個時期大家很信任德國有迅速恢復原狀的能力，故在一九一八年之終馬克仍有牠的票面價值的一半——即每個馬克以前值二三·八二分，現在值十二分。

可惜這種情形不能維持長久。大戰期內限制貨物最高價格的非常法律現在是撤銷了，物價漸漸飛漲，和市面上通貨的充斥成了正比例。有許多金子已被送往中立國家，交換軍需品，現在真正感到它的缺乏了，這種實情

等到發現德國在戰時的貿易入超達一百二十億元美金時更爲顯然。國內原料的儲量降到低點，而國家的全部經濟組織已趨凌亂，因爲在大戰期內各種工業和工廠曾被改組以應軍事緊急的需要。德人當着這種薄弱的通融力，不利的貿易差額和巨數的賠款，要得到僅能維持最低生活的食品與原料，唯有依靠紙幣而已。

就是在這個危急的局面之下政府對於一般因大戰牟利者和大資家仍猶豫逡巡不敢課以重稅；又爲了某種原因，不動產與所得稅稅額之估定，仍以膨脹而起伏不定的紙馬克爲根據，而不根據現金。這樣一來，捐稅的繳納額在到期應付時往往比在估定時所預料的真價低得多。現金的短缺與紙幣的膨脹循環增加不已，一月一月地過去，其爲害也愈甚。在一九二一年六月間，國家銀行開始付出現金貼水，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圓美金（通常僅值四·二馬克）可以買得七〇〇馬克了。

在法比軍隊占領魯爾期內，危機更增高了。法人之握有數十億的德國國家銀行鈔票，及德政府的企圖藉紙幣的印行以補助被占區域內賦閒的愛國工人，完全毀壞了德幣的價值。只有奇蹟纔能阻止馬克如雪車的下滑，其如無奇蹟發生何。當局限制國人購買外國幣的嘗試，爲時已晚，不能得到任何顯著的結果。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初旬，一六〇、〇〇〇馬克可換美金一元，到了月底，就須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纔換得一元了。紙幣印刷所馬上覺得很難供應紙幣的需求，特別因爲一九二三年夏季政府的稅收百分之九十多是拿紙張當錢取得的。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政府所欠國家銀行的債約計有一萬九千萬兆（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當紙幣熱昇到頂點的時候，國家銀行雇了二千人，專門任爲紙廠、印刷所、和運輸局的監督人員，同時有三十所紙廠，一三三所印刷事務局，和一七八三個印刷所忙到最高速度，以供應增加的鈔票之需要。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的中旬，在柏林美金一元值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在科倫 (Cologne) 值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夸爾 (四分之一加侖) 牛乳的售價爲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甚至還不易買到。即私家公司和個人也自動印行『非常時期兌換券』——總值好幾萬萬兆馬克。最後，要標明鈔票的最高價值，以償紙張成本和印刷費都變成很困難了，尤其因爲印鈔票時必須加以細緻的美術裝飾。

這種經濟崩潰的結果是非常不幸的。商借款項和訂立契約幾乎已爲不可能之事。中產階級受苦最烈，因爲他們的債務人乘此機會收回債券，贖回抵押品，並償還鈔票。前此從投資和儲蓄中可穩得的收入變成分文不值，許多希望依賴這種收入而生活的人現在不得不向已極擁擠的勞工市場中尋求職業。職工協會沒有能力盡牠們的通常職責，因爲牠們的基金也是分文不值了。反之，一般資本家卻因工價低與原料成本賤的關係，大獲利益，他們並將所得的盈餘投資於比較安穩的外國證券。大批『夜來滿天飛』 (Hy-by-night) 的小本經營就依賴賤幣的供給成立起來，但牠們剛剛成立就倒閉了。人民都貯藏貨物，而每人都力求以他所有的馬克交換具有較穩價值的貨物，這樣一來，『馬克如潮水似地變成貨物了』 (Flucht aus der Mark in die Ware)。

在一九二三年秋季，德國人民實際上廢棄了馬克，而當時的情形比大戰期內任何時間更爲惡劣。農夫拒絕把他們的農產物運向城市；商人關閉他們的商店；工資是毫無標準的，工資的增加當然比物價的飛漲落後；成千

成萬因戰爭而殘廢者和以前依賴一定的收入生活的都面有菜色，饑餓者的騷動成爲普通的景象，外國軍隊在魯爾的活動，分離派人在萊茵地與巴威的運動及共產黨徒在薩克森 (Sachsen) 與其他地方的得勢使紛亂更甚。德國的內閣旋起旋仆，國家似乎已瀕於瓦解的境地。最後，在一九二三年九月，政府宣布全國戒嚴。

當局深懼德國陷於完全崩潰，乃決定（一九二三年十月）施行最後一個拚命的計畫，俾人民可藉此自拔而出於污泥。依照這個計劃，應設立一種新幣制和一個新銀行，預算當使之平衡，工業當使之恢復一部分，奉命施行這些奇蹟的人，爲財政部長路得博士 (Dr. Hans Luther) 與一個銀行行長，現兼新幣制總裁的社顯特博士。這兩個人既具有非常的權力的確，穩定了馬克的價值——雖然對許多德國人和外國投機商人，又是一種不幸的財政上的犧牲。

不值錢的紙幣之印行停止了，而一個特殊的仁登銀行 (Renten bank) 也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開幕了。這個銀行發行一種新的臨時通貨，稱爲仁登馬克 (Renten mark) 指定的票面價格等於大戰前的金馬克，以德國全部農業和工業的財富爲抵押的擔保品。這種馬克發行了三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此數稍稍超過大戰前德國市面上流通的馬克總額之半。仁登馬克與紙馬克相輔而行，其比率爲一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這樣，「無中生有地……產生了一種錢幣，它的價值因人民的信仰心而趨於穩定」。

預算的平衡全靠無情的但顯然爲必要的辦法。戰爭賠償的要求被拒絕了，成千成萬的公務員（其中有許多人曾受終身的委任）略得酬報或絕無酬報而被辭退了。（註）薪金皆經減少，公家一切借款暫告停付。政府並

提高稅率，開始以現金爲根據計算稅捐的繳納，並制定較優的徵收制度。最後，除通常的不動產稅之外，又對出租的房屋，工廠和農業建築物附加新的『房租稅』。

(註)聯邦政府將各種公務機關的人員約三三〇、〇〇〇人解了職，包括鐵路與郵政人員在內；各邦和各市又辭退了四〇〇、〇〇〇餘人。

這些法令中有許多後來必須都經廢止或修改了，但那是達到了它們的直接的目的——直到預算平衡和通貨膨脹停止以後的事。當(一)道威斯計劃發生效力(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德國獲得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的外國借款；及(三)魯爾撤兵的時候，一般的情形也比較樂觀些了。接着取仁登銀行而代之的新國家銀行創立了，而新鑄的國家馬克(Reichs mark)也替代了仁登馬克。到一九二五年七月五日爲止，紙馬克可
以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對一的比例兌換國家馬克。

自然，人民的痛苦尙未解除。對紙馬克釐定很低的兌換價格一事，毀滅了許多小資產的人家。流動資本的一時缺乏，使利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因爲有許多公司破產並因人民不再需要貨物拿來貯藏。故失業情形更爲惡劣，但局面的安定和人民的信任心到底恢復了若干，在經濟復興的路上，也減少了很多荆棘。

失望與希望

在緊接大戰的數年中，悲觀的巨浪激蕩了德國的人民。他們在戰敗之中，覺得世界正在崩潰，文化已到末日。

大家都很憂鬱，許多有思想的人只能在形而上學的思考和神祕學說之中，得到慰藉和庇護。好像爲運命注定一樣，這般切望追求精神愉快的人們在德國恰巧得到許多適切而深奧的哲學論文。

這些著作中之一種爲歧舍爾林 (Keyserling) 伯爵所著的兩卷一個哲學家的旅行日記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 雖則第一卷在一九一四年就在印刷人之手，而第二卷僅在大戰期內經過修改，但最後完全之本直到一九一九年方始出版。歧舍爾林對於歐洲不能再保持一種富有生氣的興趣，因爲它畢竟「祇代表人類精神的一小平面」，而切望「爲新的勢力所影響」，他就開始閒暇的旅行，環遊世界。他在旅程中的觀察，證實了他對於心靈的至高至上與精神圓滿的德性的優越之信心。「明心見性的捷徑是航海環遊世界」。一如我所預料的，他的日記讚揚亞洲好靜深思，不慌不忙的生活，而公然指摘紛紜擾攘的西方，鄙棄西方的「不承認有不變動的事物」而「以可以量計的名詞表示事物的價值」。

但是，這位哲學家十足是西方人，故仍以爲個人主義是有益的，而他所願意目擊興起的「新人物」，應爲唯心的個人主義者，也就是一種「具有亞洲的內心而滲以基督教的歐洲之生氣」的人。歧舍爾林以爲要使西方文化得救，不需要知識而需要智慧。一般人對於這些觀念的響應是浩大的，至少有一個時期是如此，所以他的兩卷日記竟銷行幾百萬餘冊，接着德穆斯達 (Darmstadt) 地方創辦了一個「智慧學校」(School of Wisdom) 以教養哲人。在許多德國人看來，東方的神祕學說和智慧追求，實爲無希望的世界中唯一的安慰。

此外，斯本格雷 (Oswald Spengler) 的巨著西方的衰落 (Decline of the West) 對將來抱悲觀的人們

的影響，甚至較哲學家旅行日記尤爲重要。雖然這部書也是在大戰爆發之前胚胎的，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當德國軍隊依然勝利的時候寫完的，它卻很投一九一九年和以後的失望而懊喪的德國人之好。著者以其對於哲學、文學、史學、數學和術藝的淵博的知識，說明歷史過程的循環性。他把歷史認爲是許多個文化周而復始的一種運動，每一個周而復始的文化都在春季萌芽滋長，到冬季枯萎消逝。每個周期的末端和它的開端一樣冷面無情，不易感動。自古以來已有三個這樣的時代降生而消逝了：印度時代（開始於基督降生前約一八〇〇年），希臘或羅馬時代（從基督降生前約九〇〇年起），和阿剌伯時代（引進基督教時期和回教時期）。西方時代（約從基督降生後九〇〇年開始）現在走進了它的冬季，而已經註定在未來更多世紀度過之前，就要死亡了，那時「將不再有西方文化，不再有德人、英人或法人」。

雖則著者堅以爲他這部書的本旨並非一種悲觀的預測，但各界人士漸認西方的衰落爲說明西方霸權之衰亡的一種很有根據的預言。因爲這樣，它很有聲價，並得到很廣的銷路。在此書中一般憂鬱的人們證實了他們的恐懼，而覺醒迷夢的人們也由此得到世事無謂的證據。

戰後德國所通行的書不獨是悲觀主義和宿命論的著作。關於戰爭的原因，阻止戰爭的方法，或戰勝的策略之書籍，銷售以千萬卷計。當時又風行傳記與言行錄，著作者多爲覺得對於本人過去的行動有解釋或辯護之必要的官吏，及以前曾與皇室多少發生關係的人們。最可異者，雖然威爾遜爲德國通國所常常討論到的人物，反沒有他的詳細的德文傳記，直到和平條約簽字後十多年方有。

記載與描寫戰事和前線生活的書籍更是汗牛充棟，其中有許多種並銷行了很多版。雷馬克 (Remarque) 所著的西線無戰事 (Im Westen nichts Neues) (一九二九年) 和他後來所著的，更成熟而更有思想的歸路 (The Road Back) (一九三一年) 兩書風魔了全國人民。關於各種神經病和精神病的心理分析研究和心理學的小說為銷路最好的書籍之冠；戲劇的著作，如欲為成功的作品，也須具有悲劇的與恐怖的性質。在藝術方面，這種精神也反映出來，「表現主義」或「藝術中的直接動作」之推行於德國，亦比在其他地方為徹底。關於機械、死亡、命運、精神錯亂之沈鬱性的，幾何的和奇異的種種表現都很時髦。

那時確是德國國民心理變化史上一個憂鬱的時期。刺忒諾說：「昏夜降臨了歐洲」，他說了這句話不久，就在柏林的街上被刺了。

這種失望的態度成為德國老年人或中年人的特質——他們所抱的愉快與前途穩定的好夢給戰神炸得粉碎。但這種態度在青年人中並不普遍。因為他們的計劃未遭顛覆，他們的計算也未受破壞。他們不過從戰爭時期的飢饉、貧困、專制的束縛與限制上得到反省，他們認和平是樂觀的一種原因。這一羣青年人斷言，大戰所以發生，實由於他們的年長者之盲目的愚蠢，宿命論的暗中摸索，以及無知、因襲、思想陳腐的結果。但青年人自己卻是另一種材料造成的。他們相信自己決不會盲從人家沿着毀滅之路前進。他們會利用以前的犧牲者的經驗，懂得在將來的危機中怎樣處理自己。(註)

(註)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好的討論見 G. P. Gooch 所著 Germany (1927) 一書。

青年人的抗議並非單向年老一輩的人提出，並且也向整個工業化的文化提出，這種文化很容易把個人埋葬在機械與集團組織之下。少年德國所尋求的模範是『在生活比較簡單之時，並在國民的創造衝動尚未被國家的偶像崇拜所掩蓋之前的舊德國』。雖然這種運動力求『同過去時代發生新的接觸，但他並不是反動，因他只對從前時代的精神表敬意，並非對從前時代的形式表敬意』。

有如普魯士在一八〇六年戰敗後受拿破侖的凌辱一樣，德國青年現在覺得國家的復興須依賴國民的較高的精神與體格之發展。古時德人的自由簡單生活，認為就是療治國民的失望與麻木的良方。體操、森林空氣、日光、歌曲，這些都是恢復信仰與希望的必要物。因此，一個有組織的 *Jugendbewegung* 或青年運動——它在一九一四年之前早有相當的進展——引起了新的興趣，並吸引了幾百萬的新來者。斐雪 (Karl Fischer) 在一九〇四年所創辦的「候鳥會」(Wandervogel) 現在成爲一個偉大的國民團體，而德國的森林地與深山報以歡呼的回聲。習俗與限制被拋在一邊了，自由統治了一切。異性伴侶間的不自然的界限除去了，父母的監督權減少到最低限度。(註) 這種運動促進了德國青年的健康與理想的普遍發展，並對整個國家供給了一種亟需的樂觀主義。

(註) 有些皈依新自由的人提倡了裸體運動並創辦裸體會社，但其中祇有少數能够永久存在，其餘都是曇花一現的。

正如德國人的祖先愛好體力和敏捷的競賽一樣，德國的現代青年人也擇取競技爲發洩好動的精力的嗜好。在每個運動場中，德國人力求博取超過其他國家運動員的記錄，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三二年的世界運動會都

引起了迥異尋常的興趣。西米林 (Max Schmeling) 爲獲得全世界重量拳賽錦標的第一個德國人，他被敬爲新的力量的象徵。奧舍姆 (Trautlein Cillie Aussem) 是一九三一年威木布爾敦 (Wimbledon) 網球錦標的獲得者，因此她成了全國崇敬的女英雄。

這種運動也有牠的弱點。有時候，自由與放縱相混同了。當時一部分青年中有一種趨勢，好嘲弄行政當局並輕視老年人或白髮人。許多青年的組織同政治團體，宗教團體，或重視階級的團體混爲一體，友愛應該盛行的地方反而時常發生痛苦與爭鬪。惡劣的經濟情形與一九二九年後國際間所顯露的日有增加的惡感，逐漸使正在發育的青年男女更加疑惑，究竟他們的樂觀是否正當，他們的肌肉與理想是否具有充分的力量足以重建文明。結果，許多青年人對於年長者所犯的愚蠢的批評，比從前和緩得多了。

政黨與政治（一九二四年——一九三二年）

一九二〇年當選的國會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解散了。在牠的會期之內，四位國務總理——衛司 (Wirth) 博士、庫拿 (Cuno) 博士、史德理斯曼 博士和瑪克斯 博士——都曾努力恢復秩序並鞏固共和國。但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四日的選舉中，這幾個人所隸屬的中和政黨在票數方面損失甚重，而左右兩極端派卻大有所獲。總理 瑪克斯 (中央黨) 因此辭職，總統 亞伯特 乃商請國家主義黨的領袖組織新的聯合政府。國家主義黨的反動性癖——此黨的若干黨員建議以提庇磁 爲國務總理——不久激使亞伯特 重召瑪克斯 組閣，結果他組成

了另一個中和的聯合政府。

這個內閣在國會中所能操縱的人數並不甚多。因此，當它必須得到全數三分之二的大多數以求通過道威斯計畫所規定的某種鐵路法律時，政府就要求國家主義黨予以擁護，而許以幾個閣員位置，作為酬報。國家主義黨雖公然反對道威斯計畫，竟應諾政府的要求，准許牠的黨員對於尚未決定的那種法律自行斟酌投票。於是有很多國家主義黨黨員投贊成票，使所盼望的法律得以制定。然而，當政府企圖履行關於邀請國家主義黨黨員加入政府的諾言的時候，其他政黨激烈反對，以致國會終被解散，政府明令規定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七月舉行新選舉。

在這次選舉中，中和的政黨因保皇黨與共產黨失利而獲到許多席，但國家主義黨也選出足額的代表，使組織政府之事成為困難的問題。在十二月十一日，瑪克斯因不肯容納國家主義黨黨員加入他的內閣而辭職了，直到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中央黨——人民黨——國家主義黨的聯合政府纔在路德博士領導之下組織成功。雖有國家主義黨加入內閣，但當外交部長一職落於史德理斯曼博士之手中的時候，政府仍然施行協調的外交政策。史德理斯曼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起就在每一個政府之下不斷地掌管外交部事務，直到他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中逝世為止。

在路德內閣組成後數星期，總統逝世了（二月二十八日）。亞伯特曾努力於保衛國家，引導牠度過六個困難的年頭。他在艱苦情形之下宵旰勤勞，忠於工作，並很盡心為他的國家和工人階級謀利益，雖受很多私人的辱

罵，仍鼓着勇氣忍耐。他沒有受過任何高等教育，而能在這個非常尊重學校訓練的國家陞至最高的地位，設非有超凡的本領，何克臻此。成千成萬的工人認他爲良友與保護者，他們的成爲共和國的忠實擁護者，實由於他是一個忠誠的共和黨員所致。因爲憲法中沒有副總統的規定，所以現在必須舉行德國首次的總統普選了。

依照德國選舉法，總統的選舉必須全國投票，候選人如得到全國所投之票的大多數，即爲勝利者。倘使在選舉中沒有一個候選人得到這樣一個大多數，必須舉行第二次選舉。雖然任何政黨可以推舉新的標準「持票者」（即候選人），但沒有淘汰候選人的事。第二次選舉的結果歸於獲得多數票的被推舉者，不論他是否得到大多數。一九二五年的選舉就必須藉助於這種複選制，因爲在第一次投票（三月二十九）中，沒有一個候選人是勝利的。第一次投票的票數分配如下：

查爾斯 (Jarres) (國家主義黨和人民黨) 一〇、四一六、六五八票。

柏藍 (Braun) (社會民主黨) 七、八〇二、四九七票。

瑪克斯 (中央黨) 三、八八七、七三四票。

塔爾曼 (Thalmann) (共產黨) 一、八七一、八一五票。

赫爾帕喜 (Hellpach) (民主黨) 一、五六八、三九八票。

赫爾特 (Held) (巴威人民黨) 一、〇〇七、四五〇票。

盧登道夫 (極端國家主義黨) 二八五、七九三票。

共計

二六、八四〇、三四五票。

在第二次選舉舉行之前，兩個政黨的聯合成功了。中央黨、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他們在第一次選舉中所得之票幾乎達到全數百分之五十——現在聯合推舉中央黨的首領瑪克斯。幾個右派政黨，曾得全數約百分之四十三票，現在也聯合起來，但他們並不重推以前的候選人中的一位，而遴選年高望重的興登堡元帥。共產黨拒絕與其他任何黨派聯合，他們單獨重推塔爾曼。

結果，一種生氣蓬勃的選舉開始了，每一個政黨努力於吸引幾百萬合格的投票者——他們在三月的競選中放棄了他們的選舉權——到投票處去。這次投票於四月二十六日舉行。此次比第一次幾乎多三百五十萬票，而這個數目的大多數都為興登堡所得。最後的結果報告有一四、六五五、六四一票歸於這位七十七歲的老將瑪克斯得到一三、七五一、六〇六票，塔爾曼得一、九三一、一五一票。共產黨之拒絕參加中和黨的聯盟，在某一個意義上實使右派候選人的當選成為可能，因為瑪克斯與塔爾曼兩人所得的票如果合計起來，就比右派所得票數為多。

興登堡的當選在許多地方被認為對於共和政體的打擊。外國報紙，尤其是法、美兩國的，多大聲疾呼，作此項評論，並毫無顧忌地預言這位元帥一定會迎回威廉第二，恢復黷武主義，而使世界重陷於戰爭。幾個挑撥是非的壞蛋甚至主張用武力阻止那位當選的總統就職。然而，興登堡在就職時就宣誓無條件擁護共和國的憲法，他的中庸和平的政策不久不獨博得了德人的信任，並得到了全世界的信任。他也許願目睹帝國的恢復，但他無意違

反他對於共和國的誓言。他既寧肯採取德國的政策而不用一黨的政策，所以能够調和德國國內的許多派別，而把一羣以前的仇敵融合起來。全世界迅速地忘卻大戰期內大家對於他所說的壞話，他的八十歲生辰（一九二七年十月二日），成爲全世界向他表示尊敬之意的時節。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路德內閣總辭職了。它因批准洛迦諾條約，而突遭國家主義黨厭惡，並因內閣問題失去了他黨的擁護，在路德重又組織另一內閣之前，共經過六個星期，且發生總統獨裁制的威脅。不久，這個政府爲了國旗的小問題，也傾覆了（一九二六年五月）。

繼起的瑪克斯內閣在沒收前皇族的財產以供國家之用的問題上經歷了一番可怕的奮鬥。法庭對於這個問題早發表了各種不同的意見，皇族的要求大都被維持了。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此案被交付國民複決。贊成沒收的超過一千四百萬票，只有五十萬票反對沒收。然而，因爲國民複決須得有整個合格的投票團體的大多數表示贊同始能成立，結果表決沒收所需還差五百萬票。

瑪克斯總理覺得他的內閣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有改組的必要，且須容納幾個國家主義黨黨員加入內閣。但是，在中央黨贊成此舉之前，國家主義黨還得答應擁護共和國，贊成史德理斯曼的和平政策，並承諾與國聯合作。這種接洽結果並不順利，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國會就遭解散了。

在五月二十日的選舉之中，國家主義黨在票數方面損失甚巨，而社會民主黨卻增加了他們在國會中的議員達一五二席。瑪克斯的中央派與右派分子的聯合政府因此辭職。六月二十八日，社會民主黨黨員赫爾曼·米

勒(Hermann Müller) (他曾在九年前簽署凡爾賽條約)組織了一個臨時的「人才內閣」。他是一九二〇年以來，第一個以社會黨黨員資格出任國務總理的人。臨時內閣祇在較永久的內閣組成之前盡其職能，當時大家希望這個永久內閣最好由社會民主黨、民主黨、中央黨、人民黨、巴威人民黨的「大聯盟」組成。各黨間的爭鬧拖延得很久，以致最後的聯盟到一九二九年四月方始結合成功。其時，米勒仍任國務總理，上述五個政黨中的每一個在新內閣中所佔的閣員席同它在下議院中的勢力相準。

米勒的統治並不安樂，預算方面有莫大的困難，政府之接受楊格計畫頗引起國家主義者的反對。其時政府中對於一種特稅和修正的所得稅，發生激烈的辯論。失業情形變為異常嚴重，閣員對於應如何構成一種可實行的失業保險計畫一問題，意見很為紛歧。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七日，米勒內閣辭職了。三天之後，中央黨首領布魯寧博士組織了一個新的溫和的聯合內閣。(註)

(註)一九三〇年七月，民主黨與人民黨之中有幾個年青的黨員組織國家黨。十一月，民主黨解散了，國家黨成為它公認的繼承者。在同此數月中，國家主義黨因胡根堡博士所領導的幾個反動派的退出而分裂，這般反動派贊成恢復皇國而反對國聯。這個團體組成保守人民黨。

新內閣願意繼續施行前任內閣的各種溫和政策，這就是履行一切國際的任務，在實施最嚴格節約政策時準備救濟農業，依照史德里斯曼的原則應付外交問題。自從史德里斯曼逝世之後，外交部長之職於一九二九年十月歸他的好友之一庫圖斯(Julius Curtius)擔任。政府在任期中時時發生搖動，內閣之數次免於傾覆，僅僅

因爲反對黨自身分裂，或因與登堡以解散國會爲恫嚇，並揚言欲依照憲法第四十八條於爭論不止時自居於狄克推多地位統治德國所致。一九三〇年七月，在國會斷然拒絕政府的預算案之後，總統就實行他的恐嚇了。立法機關解散了，經明令規定在九月十四日舉行新選舉。其時，政府在遏止國家收入的日益減少的企圖中，施行了幾個非常預算的法令。

一九三〇年九月的選舉中，有二十七個政黨推舉候選人，其顯著的特色即爲兩個極端派，共產黨與國家社會黨的得勢。在所投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票之中，共產黨得四、五八七、〇〇〇票，幾乎比在一九二八年所得的多百分之四十。同時，牠在國會中的議員名額，從五十四席增到七十六席。最驚人的是國家社會黨的收穫，牠在國會中的代表從十二席增至一〇七席，而所得的普選票數從八〇九、〇〇〇票（一九二八年）增加到六、四〇〇、〇〇〇票以上。他們此刻在下議院成爲第二位的最大團體，僅次於有一四三席的社會民主黨。在分析國家社會黨（他們也被稱爲法西斯黨，希特勒黨或國社黨）這次勝利的原因之前，必須先述及該黨的早年歷史和它的首領希特勒的種種活動。

希特勒主義

這個國家社會黨的未來領袖，以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生於上奧地利，爲一個沒沒無名的關吏之子。希特勒的父親要他入政界做文官，但他不依從父親的志願，儘發揮他繪畫的才能，後來跑到維也納去研究建築學，成

爲建築師。但是，他在投考繪畫學院時未能及格，僅設法做了一個裝飾師和圖案設計匠以維持生活。

他時常和同行工人辯論，尤其是關於政治和經濟問題，他執意不肯參加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他說他既不明瞭它的宗旨，又不贊成它的方法。結果，他以本人不能得到和保持一種職業之咎歸於社會主義者的奸謀——或者因爲這個關係，他後來痛恨馬克思主義。並且，因爲他平常把過激主義與猶太教併爲一談，認社會主義者的運動爲國際猶太民族要支配工人的一種企圖，所以他又變成堅決的反塞姆族者。

在一九一二年，希特勒到慕尼黑度日，當大戰爆發時，他得到巴威邦當局的允許加入巴威軍隊，赴前線作戰。他顯然不願參加奧——匈的隊伍，因爲他非難奧——匈聯合帝國是幾國民族所組成的國家而不是一個民族的國家。他在西線上很能盡職，受了槍傷，中了毒氣，得過鐵十字獎章。

一九一八年的德國革命事件使這位軍人充滿了怨恨，他在那個時候依然不甚著名。直到一九二三年，始爲人所知，那時他同了盧登道夫和其他的人參加（十一月九日）推翻政府的企圖，但失敗了。希特勒以共犯謀叛的罪名，被判處五年徒刑，但在獄中住了幾個月就被釋放了。他由於列入巴威軍隊的兵籍失去了奧地利的國民資格，並因謀叛和判刑之故在德國也好久不能得到國民資格。於是這位世界上最愛國的團體之一的領袖，竟有好多年（直到一九三二年）是一個無國可歸的人。

希特勒從監獄內出來後，即將新生命注入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這個政治組織是他在一九一九年所協助設立的，並在他被迫不得活動的時期內漸就衰微。希特勒的六個老同事之一，後來充國社黨經濟顧問的工

程家斐得 (Gottfried Feder) 曾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爲這個團體起草了一個大膽的而不切實際的黨綱「二十五點」。後來辛經希特勒於一九三〇年在他所著的自傳我的奮鬥 (Mein Kampf) 中將這個黨綱加以擴充。

依照這個黨綱的宣言，希特勒黨的最後目標爲建立「第三國家」(註一) 也就是一個大德意志，在這個國家中，所有「日耳曼族血統的人民，不論其信仰如何」都應聯合爲一個國族，這些人民包括奧地利、荷蘭、波蘭、捷克斯拉夫和亞爾薩斯地方的德意志人。然而猶太人卻被認爲外國血種。(註二) 這個「百世大計」注視到下列各項：廢除凡爾賽條約與聖澤曼條約；反駁協約國所加於德國的戰罪；再將賠款數目加以激烈的修改；再取殖民地以爲自給自足之助；排斥非德意志血種的人民及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後遷入德國的僑民；對於國民的職業和適當的生活狀況予以政府的擔保；廢止不勞而獲的收入和高利率；沒收因大戰所得之利益；將托辣斯和大百貨公司收爲國有；改革農村與取締地價投機；國家對於老年人和國民的身心發展加以妥善的保護；凡不危害國家安寧與道德的宗教信仰完全自由；與其他大國軍備平等。德國在大陸的霸權當以與英意聯盟並在將來與法(德國的主要仇敵)俄(德國將來開拓殖民地的最近出路)開戰這兩種國策來實現。復興運動的口號爲諾狄族主義(或北族主義 *Nordicism*) 和反塞姆族主義 (*anti-Semitism*)。

(註一) 第一國家爲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第二國家就是共和國。

(註二) 希特勒自己是一個天主教徒。

國社黨有縝密的組織，而以卐字形爲黨徽。同意大利的法西斯黨一樣，他們有繁縟的儀式和軍禮。普通黨員

——在一九三二年達七〇〇、〇〇〇人——按月付小數目的黨費，在開會時務須到場，通常並須擔負入場費。在一般黨員之上有衝鋒隊（Sturmabteilungen），大部分為德奧大學的學生和畢業生，他們被指定擔任特殊職務。例如保護國社黨會議和搗毀過激派的集會。一九三二年四月，政府因為這些衝鋒隊時常憑藉暴動為手段，把他們解散了，但終於允許他們重行組織。普通黨員和衝鋒隊都穿褐色襯衫，佩紅白色臂帶，繫黑卍字章。黨中復有一小羣警察（the Schutzstaffeln），他們充國社黨首領的衛隊，並執行特別困難的使命。他們穿黑色襯衫，上面飾有白色頭蓋。

為便利黨的宣傳運動起見，他們把全國分為二十六大區，每一大區再分為若干小區，每個小區由六個以上的受過訓練的演講員主持之。希特勒他自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演說家，能夠感動聽眾，但這種電感結果的產生是由於他演說的態度，並非由於演說的內容。同墨梭里尼一樣，希特勒能利用一種顰眉蹙額的表示和磁性的人格，得到收穫。他在德國的婦女界和國家主義的青年中很得人心，這般青年組成了希特勒青年團。

希特勒主義的主要柱石之一，是中產階級中戴白領的一部分。以收入與生活標準而論，屬於這一類的三、五〇〇、〇〇〇人之中有許多實在無殊於無產階級。但是，他們與工人不同，並不向社會主義者要求經濟的救濟。階級的自尊心使他們向別處求助，而希特勒主義似乎供給他們一種可能的幫助。同他們一樣境況不佳，一樣不願承認與無產階級有共同利害關係，並一樣準備試驗國社黨的救國策者，復有數千從前的軍官，陣亡兵士的寡妻，和退休的商人。

此外，並有其他許多熱心贊助國社黨的人士。希特勒黨的反塞姆族的立場得到許多職業界中人的同情，他們深切感覺猶太人在法律、醫藥、銀行和工藝各業中的競爭。零售商店的店主們——他們的生計為大信託公司與百貨商店的活動所危害——贊成國家社會黨所主張的政府保護小商人的計劃。缺望的農民，尤其是在德國南部的，對於國社黨也加擁護。在一九三一年六月，農民的全部債額估計為三十億元美金，並因為這些農民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對私人財產的態度不表同情，所以他們齊集於國社黨的旗幟之下。

大學學生與畢業生又為國社黨的力量的一來源。在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三〇年間，全國中大學生的數目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千萬失業的知識分子漸覺得他們在現行制度之下的命運毫無改進之希望。在他們看來，凡是破壞舊制的計畫，似乎都不無光明的前途，他們大都贊成停止賠款的付償，再度獲得殖民地，擴大國家的軍隊。最後，一般深懼共產主義之進展甚於恐懼國家社會黨之溫和的反資本主義的實業家也擁護希特勒主義。斐得在某一次會細心指出國社黨所建議的托辣斯之社會化，並不以「我們的重工業的真正創造者——如克虜伯 (Krupp)、啓道夫 (Kirdorf)、泰森 (Thyssen)、曼尼斯曼 (Mannesmann) 和西門子 (Siemens) 等人的公司」為目標。

勞工區域和幾個較強的天主教區域對於希特勒很少擁護。在一九三二年，他的黨徒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是來自勞工階級的，甚至在這一羣中仍有大部分無疑地是爲了借重國社黨的勢力有得到職位的希望所引動而來，並非因為政治上的信仰而加入。

將近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的選舉的時候，國社黨儘力利用政府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德國猛醒」和「工作與麵包」被採用爲選舉運動的標語；在投票前兩星期之內先後舉行超過三〇、〇〇〇出席人數的集會。國社黨演講員時常向他們的聽衆提醒德國被奴役和政府詔事協約國的情形。「戰罪的謊言」被他們猛烈攻擊，而賠款一節也遭駁斥。演說者所講的內容通常很空泛，在所預許的諾言方面也不一致，對於言語的矛盾一點也絕不認爲邪惡。希特勒的選舉宣言慫恿投票者「把那些陷他們的將來於悲苦的人送給魔鬼」。

投票者在抗議當時的不良情狀並抗議當局之顯無能力補救那種情狀之中，把前所未有的票數投在極右派和極左派方面。可是布魯寧總理仍能在國會中集合充分的中和派的擁護力量，維持其職位到一九三二年五月。

在一九三二年前半年，布魯寧向許多政黨的首領建議，由國會延長興登堡總統的任期，這樣一來國家可節省選舉的經費並避免麻煩。希特勒反對這種建議，於是定三月十三日爲選舉日期。興登堡和希特勒都是候選人，後者因受任爲布藍士外喜（Brunswick）邦駐柏林使館的隨員而成爲德國國民（二月）。塔爾曼又爲共產黨的候選人，極端國家主義黨則推舉鵬厄斯忒堡（Theodore Duesterberg）爲候選人。

這個選舉運動是生氣蓬勃的，並引起外國的深切注意。興登堡獲得一八、六五〇、七三〇票，距當選所需的大多數僅少百分之一的一半，而較與他票數最相近的希特勒多得七、二五〇、〇〇〇票。塔爾曼居第三位，得四、九八三、〇〇〇票。於是在四月十日，舉行複選，人民重又投票。這次興登堡總統以在約計三六、五〇〇、〇〇〇

○的總票數中幾有六、〇〇〇、〇〇〇票的多數，重又當選連任。甚至巴黎也歡呼與登堡爲所有候選人中「最穩妥」的一個，他就在八十五歲那一年開始他的第二個七年任期。

在總統競選後兩星期，希特勒黨在許多邦的選舉中大有所獲，尤其是在普魯士邦。這些進展一部分由於布魯寧的社會黨——中央黨所採取的反國社黨的手段。衝鋒隊被解散了，褐衫制服被禁穿了。反之，許多德國人民漸漸感覺總理以緊急命令爲治的制度很少成就。失業的數字繼續增高，國家預算的短少竟達美金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並且布魯寧的和平外交政策實際上對於德國毫無補救。德國的種種請求未經各國注意，法、英、美三國和國際聯合會並無願和柏林政府合作解決歐洲的種種困難的表示。國家主義黨因此大聲疾呼，要求採取更有效的舉動，於是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布魯寧內閣就總辭職了。

總統遴選（五月三十一日）巴本（Franz von Papen）上校爲新內閣總理，這個人就是在美國中立時期內，在該國被控有不法活動的人。巴本選擇了一羣保守的人爲他的同事。新政府顯然不能在國會（一九三〇年九月所選舉）中統馭大多數，後者遂立被解散。政府規定於七月三十一日召行新選舉。其時國社黨又獲准許穿上他們的褐色衫並恢復他們的軍隊組織，而國防部長施萊徹（Kurt von Schleicher）和政府中其他領袖也在開始公然主張德國在軍備與安全保障上應與他國受同等待遇了。

國會選舉的結果，使希特勒黨得到二三〇席，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增加了一二三席。再者，他們所得的普選票數倍於前次國會選舉中所得的。社會民主黨獲得一三三席，中央黨得九七席。國會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召

集了，希特勒的副手之一被選為議長。在經過數次組織的事情之後，國會就休會至九月十二日。當它重新集會的時候，國務總理立即把它解散，規定在十一月間舉行另一選舉。巴本深懼這個國會將對政府在九月五日所着手的經濟復興計劃投票否決（此項計劃擬從國庫中撥款借與實業界，俾商業可以振興，失業可以減少）。在這一情形中，總理已得到興登堡總統的充分協助。反之，他被法西斯黨與共產黨斥為獨裁者和不合憲法的總理。

一如所預料的一樣，十一月六日的選舉不能使任何一黨或任何政黨集團具有支配國會的勢力。但是，國社黨的總票數竟失去約二、〇〇〇、〇〇〇票，而共產黨反多得了七〇〇、〇〇〇票。所以，內閣似乎可以繼續它不受國會限制的統治，因為總統堅持國會的議員必須是一種能在他辭退內閣之前擔保施行一定的政策的人。我們在此處可以注意，總統和總理如能和諧合作，就可以創立這一種「合乎憲法的獨裁制」，對於這種獨裁制，國會很少干涉的權力。

經濟的復興與衰落

大戰前的德意志帝國是一個富有效能而組織嚴密的經濟機構，它有肥沃的土地，豐富的基本原料，智力甚高的工業領袖，熟練而耐勞的工人階級，很發達而很調整的鐵路網與水道網，海外的財產，繁盛的運輸事業，獲利的國外投資，很多的市場，和絕好的國際信用地位——這一切都是它的富強之資。然而，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間的大戰使這錯綜複雜的經濟機構完全凌亂了，而致國家有全盤的整理與修補之必要。

不僅大戰使德國蒙受巨大的物質損害及千百萬國民的死亡或殘廢並且和平條約也剝奪了德國十分之一的人口和八分之一的疆土。這個戰敗國又損失五分之一的煤，三分之二的鐵礦儲量，十分之七的鋅，十分之一的製造廠，七分之一的農產，全部的殖民地 and 國外投資，大部分的商船，和幾乎全部的國外商業契約。此外，這個年青的共和國又須對付嚴酷而敵視的歐洲（它對於德國的復興阻礙多而幫助少），並忍受主要工業區域魯爾之暫被占領。殘破的德國祇在一方面是幸運的：它毋需重建戰毀的區域，因為大部分實際的戰事是在外國的疆土上開火的。

德國在緊接大戰的數年內，經濟情形日益降低，直到隨一九二三年的崩潰而達到最低點之時方有起色。然而，正在國家瀕於土崩瓦解的時候，政府與人民團結一致，來努力挽救祖國的光榮並重建它的經濟組織。此後不久就有上進的趨勢，這種趨勢平穩地繼續了六年，直到一九二九年。在那一年，工業產額的總量竟達到超過一九一三年所有的之一點。在工業的發展，生活的標準和潛伏的偉大各方面，德國似乎是僅次於美國。

這個戰敗國的「工業的開花」，是許多原因的結果。德國貨幣和鈔票在外國的巨額銷售，通貨膨脹政策的採用及紙幣的整批拒絕付償，增加了國家的真實財富約二十億元。它從外國資本的大宗流入上也得到益處，尤其在道威斯計畫實行之後。德國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這個時期之內所欠的外債——國家的、地方的和私人的——總數達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其中約有百分之七十是從美國來的。這種借款雖大部分馬上又被輸出，以付償賠款，但其餘部分都利用於工業的復興與擴充。

有助於經濟復興的另一因素爲「合理化運動」之流行於德國工業界和商業界的各方面。德國人把美國工業的非常發達歸功於合理化的觀念與大規模的生產，他們深信只有同時採用這兩種政策方能導向經濟的更生。泰羅 (Taylor) 與 福特 (Ford) (一爲工業效能的，一爲大規模生產的「鼻祖」) 在德國人眼中都成爲英雄了，他們於是推舉專家到美國去研究美國的方法與制度。

早在一九二一年，德國設有「全國效能改進局」(National Efficiency Board)，牠的任務爲研究、分析、並力求解決德國工業界所遇到的許多工商業問題。其他從事研究提高農業、管理和建設的工作效能的公私機關也紛紛設立。明細言之，合理化運動的目的在於使生產產品與原料標準化，採用科學方法的管理與設計，傳佈職業的指導與訓練，獎勵托辣斯與聯合公司的設立以防止重複與同歸於盡的競爭，並調整全國的生產程序。

合理化的結果使人民有可驚的儲蓄。在各種工業之中，每一個人的平均產額在一九三〇年比在一九一三年高出百分之二十。以煤業而論，一九二五年中五六二、〇〇〇人可生產一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噸煤，而在一九二八年，經過很可觀的合理化之後，五五六、〇〇〇人可生產一五一、〇〇〇、〇〇〇噸。汽車業的雇員數目從八七、〇〇〇(一九二五年)減到八三、〇〇〇(一九二七年)，但是出品的價值在同一時期從七七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到九〇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家大銀行在一九一四年雇用三三四人經營九〇八〇戶帳目，而在一九二七年，只需二八四人辦理一八、九一六戶帳目了。在農業和其他工業界也有相似的結果。

合理化也有它的缺點，這是沒有人能够否認的。這種運動之推行有時趨於極端，而德國人自己也漸漸談到

有「將合理化運動加以合理化」之必要了。並且，某某數種方法在美國產生滿意的結果，事實上不能擔保這些方法在歐洲情狀之下也一定同樣有用。德國人將無限的希望放在合理化的價值上，使他們毫無限制地肆行借債和投資，以致到後來證明不易償還。當供過於求的時候，對於較小規模生產就難加以調整了。反對這種制度的最強理由，或者就是失業人數因之大為增多。縱然有這些弱點，要之合理化運動在德國的經濟復興過程中，仍為主要的因素。

此外，德國工業的勃興當歸功於煤，化學家與同業同盟，亦即一位有經驗的觀察者所謂「*Coal, Chemists, Cartel*」。德共和國縱然損失多量的煤藏，卻毋需慮及動力的供給，對於鋼鐵工業的需要也能供應裕如。鑛山的廣行整理與機械化，連同開鑛技術的增高使生產率提高到可比大戰前的程度。德國目前的疆界以內的煤鑛區在一九一三年產出了一四〇、八〇〇、〇〇〇噸的煤，但在一九二七年就產出一五三、六〇〇、〇〇〇噸。此外，為補償黑煤儲量的損失起見，價值較低而容易得到的棕色煤或褐炭的生產大為激增。那種煤的產額從一九一三年的八七、〇〇〇、〇〇〇噸增至一九二七年的一五一、〇〇〇、〇〇〇噸。因為褐炭的價值僅等於煤的五分之一，所以許多褐炭都變成電的來源，然後輸送為廉價的、有效的和直接的動力。

德國的化學家素以精熟和巧妙著聞於世，這種名望在大戰期內和大戰之後仍得保持，而德國不久成爲世界最大的化學品輸出國。在染料藥品、(註)肥料和照相材料的發展方面亦有很大的進步，而在化學合成物範圍內更得到非常的成功。市面上早有合成的金雞納霜替代品，合成的樟腦、靛青、木酒精、硝酸鹽、橡皮、汽油、人造絲、

樹脂和皮革。合成的硝酸鹽的生產，包括液體的空氣的應用，是化學工業中最大的一枝。國內硝酸鹽的產額從一、〇〇〇噸（一九一三年）增到八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二八年）。智利硝酸鹽入口額的減少也有同樣的比例。這樣一來，德國在工業原料方面依靠外國的程度，迅速地減到最低點。

（註）所發明的藥品中最有價值的一種為拜耳「二〇五」（Bayer 205），它是治療非洲睡病的特效藥粉。此藥的發明者「曾拒絕將其製法公開，但若德國得回一塊非洲殖民地，他們願開出一個公用的藥方」。

德人既明瞭聯合托辣斯的價值在於提高生產效能，故寧取「垂直線」的托辣斯制度，就是「把工業程序的各階段與各部分，如煤鑛、鐵鑛、鋼廠和船塢聯合起來」。這種工業的組織之在德國，比在其他國家更為發達，政府對於聯合的程序，加以贊助而不反對。最大的托辣斯創辦者或者要推魯俄·斯丁尼斯（Hugo Stinnes）（一八七〇——一九二四年），那個巨大的「西門子—萊因—易北—叔刻爾脫聯合會」（Siemens-Rhein-Elbe-Schuckert-Union）之組織成立，他實負其責。在斯丁尼斯死的時候，據說他曾於一三八八種企業中有利益關係，並曾操縱德國的生產總額幾五分之一。他擁有土地、森林、旅館、紙廠、避暑地、油田、報館、電氣公司、銀行、煤鐵鑛、銅鐵鑛、鉛廠和其他幾十種財產。在商界中地位僅次於斯丁尼斯者有克虜伯、西門子、刺忒諾、啟耳道夫和泰森。

在德國盛行的聯合組織，不單是托辣斯一種。早在一八七三年，就有一種稱為同業同盟的組織，廣泛地說來，

「它是各種獨立的企業的聯合會，其設立之目的在為共同利益調節價格、生產市場或規定買賣的條件，或單為以上之兩種或數種目的」。這是一種自願的「經濟設計」，為蘇俄五年計劃中所包含的強迫經濟設計的前驅。

在大戰之前夕，德國有幾百這樣的同業同盟，但它們在大戰期內用處比較不大，因為巨額的戰時需要品實際上已消除了商業競爭。在大戰後，尤其是在通貨膨脹的全盛時代，同業同盟如雨後春筍一般發達起來。在一九二三年，共有一五〇〇同業同盟。這些同盟組織濫用牠們統制買賣和價格的能力，最後政府通過了（一九二三年十月）同業同盟法（Cartel Law），規定他們的活動應該公開並須受政府的監督與指導。從此以後，同業同盟對於國內經濟制度的影響力就衰落了。但在國際同業同盟的組成中得到補償的進展，尤其是在鋼、鐵軌、與炭酸鉀工業方面。統制生產與價格的最大國際機關為大陸鋼業同業同盟，它代表德、法、比、薩爾、盧森堡、捷克斯拉夫、奧地利與匈牙利。但是國際同業組織能否永久存在，似乎是很可疑的，因為它很難使會員國遵守受限制的產額，而要使他們在過度生產時繳納罰款，那是更難了。

除以上所提及的使德國經濟復興的原因與成就之外，必須再提到其他幾個項目。政府所給予的助力（金錢的其他種的）並不限於工業。造船業和其他主要企業也得到政府的幫助。凡爾賽條約將德國商船的噸數減到五〇〇、〇〇〇噸以下，而其中大半為沿海岸的船隻。因此重造商船一事急不容緩了，而人民也加緊從事。政府以低微的利息墊付造船商人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資鼓勵，並貸與船塢補助之款，使它們能以低廉的代價和迅速的效率造船。

在一九一三年，德國商船的等級僅次於英國。到了一九二〇年，它在全世界商船中占第十二位，在西班牙與丹麥之後。至一九三〇年它又昇到第三位，次於英、美所有的噸數約在四百萬以上。這個數目雖僅等於大戰前德

國商船噸數的五分之四，然而現有的船隻都是很新的，其建築也是最新式的。在一九二九年，德國下水的船隻的噸數超過其他任何國家，而在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〇年之間，北德魯意輪船公司的兩隻新船，「布勒門」(Brumen)與「歐羅巴」(Europa)號打破所有橫渡大西洋的船隻的速率紀錄。

在輕氣船事業方面，德國同樣昇到優越的地位。「大徐泊林」(Graf Zeppelin)飛船在一九二九年八月環航全球，僅以少於十二天的日期飛畢航程。並且，德國因被禁止製造軍用飛機，就發展商用飛機，這些飛機在安穩與速率方面，達到引人妬羨的紀錄。在德國科學界的最大成就之中，可以提及的就算柏林的德國博物院，它或者竟是世界上最優良的工藝學的博物院了，在那裏參觀者可以看到新舊式機器的最簡單和最複雜的作用。

最後應提及的一項，即德國從許多美國公司駐德分店所受的好處，例如大摩托公司(General Motors)福特汽車公司(Ford)、基利斯雷公司(Chrysler)、科達克照相公司(Kodak)、奧替斯電梯公司(Otis Elevator)、麥根塔勒鑄字機公司(Mergenthaler Linotype)和美國金錢收入自記器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皆大有助於德國。這些企業不獨將巨量的美國資本輸入德國，並雇用德國的工人，利用德國的原料。德國人遵守並摹倣那些公司的方法，又欣然採取美國的有些好想頭，如連環店，「五分與一角」物品商店。現成衣服，和咀嚼橡皮糖的嗜好。柏林在事實上以它的「洛克散」(Roxxy)式的戲院、汽車、機器和摩天的屋宇，通常使美國遊歷家詫為歐洲中最美國化的一個城市。

但是德國的經濟復興沒有持久的命運。即使在繁榮與樂觀達到高度的時候，預示衰落將近的因素已呈現

了。這些不利的發展包括以下各項：大戰期內所耗盡的供給物補置甚緩；商借外債日益困難；賠款問題不斷爭執；對於以前的俄國大市場和其他戰前的重要主顧，無力完全取回；政府方面對於海陸軍軍用品，缺乏需要；德國鄰近的新興小國和美、英、法等國方面，對於德國時存猜忌的態度並定有很高的關稅壁壘；德國人有減少裸麥與番薯的消費而喜食小麥與菜蔬之趨勢，因之使許多農夫陷於收成過剩而致負債的命運；以及由於合理化的進步，減少了對於人力的需要。

此外，失業的大學畢業生與工人（包括穿寬袴與帶白領的兩類人）的人數逐漸增加。在一九三〇年後世界不景氣的數年中，這種情勢更形劇烈，到一九三二年，在德國的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弱人口之中，計有六、五〇〇、〇〇〇失業的人數。失業保險制度與慈善的佈施似乎完全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這樣即供給了過激的共產黨和反動的希特勒黨宣傳運動的絕妙資料。

國務總理布魯寧的政府（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二年）因有總統與登堡的幫助，很英武地奮力應付這個危機，但是國際的情勢阻礙了解決國內困難的任何辦法。政府雖有很重的賠款負擔，但仍在較寬裕的時期內把大宗金錢用於種種可讚美而非必要的福國利民計劃，同時仍能使每個國民的賦稅負擔低於英國或法國人民所負的。政府認這種辦法是正當的，以為它是消弭革命與獲得全國人民忠實擁護的唯一方法，但姑不論其動機如何，這種政策使國家不得不對於外債有不當的依靠，總是很危險的。未來的崩潰已被注定難免了，它祇待外部情形使再借外債之舉不能實行時就實現了。

當德國政府與奧國政府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宣布訂立一種經濟條約的計畫（這種計畫有使兩國趨於合併的氣味）時，法國就集中所有的財政和外交的力量來阻撓這種行動。法國將以前在應用德語的國家中所投的資本，一律收回，並規定新借款須以政治條款（這是對方所不能接受的）為交換條件。法國又從英國銀行支取巨額的準備金，以防止英國的幫助借債國。因此，英國覺得要繼續貸與德國短期借款是不可能的。德國乃從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得到些微幫助，但德國的財政已近於破產，非有國際的一致行動，就無法救濟。

我們當記得，在一九三一年六月，美國胡佛總統對於各協約國的戰債，建議國際延期付償一年，並提出可展期付償的賠款項目。這樣一種辦法確實施行了，其有效期間從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起，到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為止。然而在一九三二年，德國總理布魯寧以明確的措辭宣稱，即在延期付款期限屆滿之時，德國也沒有力量重行付償賠款。賠款之按年輸出，須賴有利的貿易差額，可是德國在目前關稅與商業處處受限制的情形之下，決不能積儲這種有利的差額。

在一九三二年六月至七月間所舉行的洛桑賠款會議，絲毫不能解決這種進退維谷的困難情形，德國總理巴本不久又反復申述布魯寧的宣言。德國在經濟停滯的時候，決不能再付賠款。

外交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德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使本國重得加入國際團體，仍為具有良好地位

的一分子。這個目標所以緊要，不獨因它是保護被解除武裝的弱國的手段，並且也是德國經濟復興所依賴的商業復興所急需的。然而，德國一般政治家在國家的新方向究應向東抑仍向西（向蘇俄抑向協約國）的問題上，分爲兩派。寧願向東的一羣，主張與布爾塞維黨聯盟，反抗壓迫的條約限制。傾向於西的一羣則贊成履行條約上的義務並與以前的仇敵修好。

最初，似乎親俄派的見解可以獲得勝利了。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德國與俄國派赴熱那亞會議的代表在刺帕羅（Rapallo）地方訂定了承認蘇俄的協定和通商條約。四年之後，刺帕羅協定的原則重又在柏林所訂的友好與中立條約中加以確認。但是那時德國外交政策的東向趨勢，因受一羣主張「履行條約與修好政策」的外交家的影響而暫時陷於停頓。他們以史德理斯曼博士爲領袖，他時常被認爲俾士麥之後最偉大的現代德國政治家。

史德理斯曼是一個啤酒商之子，以一八七八年五月十日生於柏林，長大後在柏林和勒不士格地方讀書，專研究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他是有組織手腕的人，年方二十三歲的時候，就充薩克森（Saxony）朱古力糖製造廠協會的祕書。二年之後，他爲創辦薩克森製造廠聯合會的主動者之一，這個團體組織的目的在於改組本地的衰微工業。在一九〇七年，史德理斯曼以國家自由黨黨員資格被選舉爲國會議員，十年之後，他就成爲此黨的首領——這黨是大商業家的黨。在大戰期內，他主張戰事應積極進行，在革命之後他把他的黨徒改組爲德國人民黨，這黨贊成帝制，但爲顧到和平統一與商業復興起見，願意擁護共和政府。他在一九一九年，居於韋瑪議會的議員

地位，投票反對接受凡爾賽條約。

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史德理斯曼被任爲國務總理，但國內的騷動（尤其在德國南部）和外國軍隊之占據魯爾迫使他在數月之內就下台了。他的繼任者衛司總理委他爲外交部長，他在以後十個內閣之中繼續任此職位，直至一九二九年十月他死的時候爲止。史德理斯曼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點（那時和平條約業已簽字）就是與法國修好和德國重新加入國際團體，爲一個平等、自由，而受人尊敬的夥伴。他是一個富有天才，誠實而機警的演說家，不久得到一般人民的信任與尊敬，雖則在國內外都有許多仇敵。一九二六年，他同白里安、張伯倫三人在洛迦諾會議對於世界和平有所貢獻，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金。他一生患病，當他漸入老境時，愈感公務的繁重困難。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他以一篇理直氣壯，但語弱聲疲的演說挽救了米勒政府，使之得免因失業保險問題而傾覆。翌日，他就逝世了。

他居於外交部長的地位，負責停止魯爾區內的消極抵抗政策。他曾以十分流暢的演辭，極力主張採取道威斯計畫，這樣即爲魯爾撤兵，恢復德國的誠實信譽，及商訂許多有利益的商業條約開一先路。他的最大的事業是與洛迦諾條約（一九二五年）的商訂與德國的加入國聯（一九二六年）這兩件事有關係的。

洛迦諾的故事，在前面已經說過的，（註）當追溯到緊接大戰的數年。卽在那時，在老練觀察者看來，法德如仍繼續猜疑彼此的行動，法國如仍時常怕懼德國的復興與復仇，而德國如仍怕法國對於萊因地帶和對於它的經濟力量有所陰謀，很明顯歐洲就難有永久的和平。史德理斯曼曾屢次向法國建議簽訂一個保證的條約，在一九

二五年他的建議得到法國的贊同。結果就有洛迦諾協定。

(註)見第八章「日內瓦—洛迦諾—巴黎」一節。

史德理斯曼在發起洛迦諾條約之後，就進行向國會取得對於他行動的核准。這件事終於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完成了，戰勝了國家主義黨的激烈反對，後者對於亞爾薩斯——洛林的喪失尚耿耿於懷。與登堡社會民主黨和一羣大實業家皆為他的後盾，這些實業家覺得與法國發生更和睦的外交關係或可改善商業關係。在十二月一日，條約正式在倫敦簽字，同日，協約國為表示對於德國信任起見，開始撤退科倫區域的駐兵。因為洛迦諾公約 (Locarno Pact) 須在德國加入國聯時始生效力，所以德共和國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就向國聯請求為會員國。國會則定於三月召集特別會議。(註)

(註)附在德國的請求書之後的為各國在洛迦諾所同意商訂的說帖，大意謂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祇「在與會員國的軍事情形相合並顧及其地理上的地位之範圍內」始對於該會員國有拘束力。這一層是德國所堅持的，因為被解除武裝的共和國不願於國聯對一個大陸上的國家採取行動時成為戰場，或於波蘭與俄國戰爭時讓法國軍隊越境通過。

德國自然要向國聯請求在行政院得一常任理事的位置作為它加入國聯的一種條件。然而使它驚訝的，在它進行這種手續之後，西班牙、巴西、波蘭、中國、捷克斯拉夫和波斯也提出同樣的要求。因之立即引起一個複雜的局面。史德理斯曼堅持德國之加入國聯應不受任何國際的磋商之拘束。但是因為西班牙與巴西恰巧在行政院中占有非常任理事的位置，要給德國以常任理事的位置，非得到它們的同意票不可。使事情更糟者不久大家都

明白張伯倫正在擁護西班牙的主張，而白里安正在幫助波蘭。史德理斯曼最後宣稱，假如他早知道這種陰謀顯然與洛迦諾條約之商訂有關係，他就決不會簽訂那些條約了。行政院中的瑞典代表安登博士隨着也宣稱：他願對波蘭請求常任理事一提案投贊成票，因為所有的糾紛情形都是違反國際盟約的精神的。瑞典堅持着這個立場，雖然有一個國家以取消以前向它所提出的大批電話機的定貨單，而另一個國家又以宣佈廢棄已與它訂立的商業條約爲恐嚇，也不爲所動。

國聯大會和行政院都不能調解這種種意見，於是國聯就宣告休會，到九月再召集，對於德國的請求並無決議。接着國聯指定一個委員會，從事探討妥協的解決法，各國的代表也紛紛散去，有的很憤怒，有的很失望。德國人民對於他們所認爲不公平的待遇有很大的反感，以至東向政策似乎又引動了他們。就在這個時候，上面已提到的德俄柏林條約簽訂了。

當國聯在一九二六年九月重開會議的時候，各國代表一致投票通過承認德國爲會員國，並推舉她爲行政院中唯一增加的一席常任理事。另一個決議則將非常任理事的額數從六席增到九席，並規定任期爲三年。當時大家預期西班牙、巴西與波蘭將當選爲添增的三席非常任理事，但西班牙與巴西立即通知國聯，它們有意退出國聯。

德國在加入國聯之後，就有令人鼓舞的更進一層之發展。在一九二七年，協約國派駐德國的最後一個委員會被撤回了。同一年中，德人卡斯特爾 (Ludwig Kaas) 被任爲國聯常置委任統治地委員會的委員。一九二八

年，德國又以史德理斯曼的努力，簽字於反對以戰爭爲國家政策之手段的開洛格公約。在一九二八年的國聯大會中，重開賠款談判的一條路也開出了，最後的結果就是採用楊格計畫（一九二九年）和完全撤退萊因地的軍隊（一九三〇年）。

在史德理斯曼逝世之後，有一個時期他的繼任者和他的好友庫圖斯博士繼續施行他的外交政策，但後者在一九三一年，因爲與奧地利訂立經濟同盟的企圖未能成功，辭了外交部長的職位。此後，外交上的勝利就不常有了。希特勒黨和其他國家主義者的活動結果，與法國在外交上堅持不變的強硬政策，使兩國間的外交關係益增困難。在一九三二年，巴本內閣，尤其是國防部部长施萊赫，對於軍備平等與解除賠款重負的問題，採取更堅決的立場，但歐洲似乎尚無給予讓步的準備。

雖然激怒德人的戰後種種不平之事已在一九三二年之終消除了，但仍有許多足爲煩惱因素的問題存在着。如德國東部邊界的問題，（註）與奧地利合併的問題，重取殖民地的問題，否認德國獨負戰罪的問題，與列強軍備平等的問題，及重行修改賠款項目的問題。這些問題似乎必須在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實行之前加以解決。

（註）關於但澤與波蘭迴廊的討論，見第十七章「波蘭」一節。

第十六章 海布斯堡皇朝的兩個繼承者

奧地利共和國

(甲)崩潰(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年邁的奧皇兼國王約瑟逝世了。他臨御奧——匈帝國六十八年，到此告一段落，和他登基的時候一樣，這個當兒宇內正在倏擾不寧，干戈遍地。繼其位者就是他的姪孫，這個人的尊號爲查理士一世 (Charles the First)，渾名卻叫「查理士末世」 (Charles the Last)。

查理士爲人和藹溫厚，且有英雄氣概，但不諳治國之術，復無能力應付當時危急的局面。雖然他往往用心很好，他的決斷卻往往遲鈍，行動也很笨拙。他在海布斯堡皇朝的歷史上最危急的時代忽然成爲皇帝和最高的戰主，是非常不幸的。

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的事件毀損了奧——匈帝國人民的民氣。俄國革命的消息，美國之參加大戰，協約國在後方的巧妙宣傳，在在足以傷害該國人民對於他們的政府的信仰，特別是因爲奧政府遵循一種軍事專制的政策。使事情更糟者，捷克人正在陰謀危害帝國，斯拉夫人與匈牙利人的軍隊中和亞得里亞海艦隊的水兵中

羣起叛變，許多城市裏面的百姓遭遇空前的飢荒。海布斯堡皇朝所碰到的最後一次打擊即發生於維也納街道上的暴衆騷動的時候，他們大聲叫道：「一切權力歸於兵士與工人的會議」，同時維也納國會中的德人代表議決宣布成立一個德人的奧國。

查理士於拚命掙扎，企圖保持他的土崩瓦解的領土之中，頒佈了一篇宣言（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聲稱要組織一個新的奧地利聯邦國，其中各民族當成立一個自治的政治團體。但爲時太遲了。十一月十一日，即與意大利簽訂停戰協定後九日，查理士卒行退位。（註）爲了要不使他本身成爲他所摯愛的人民的自由發展之障礙，查理士毅然答應，不再參與國家的行政。他在遜位之後立刻離開維也納，退居厄喀曹（Eckartsau）地方的城堡中，四個月後，他和他的家屬又亡命於瑞士。

（註）兩日後，他又辭去匈牙利國王之位。

即在查理士離開維也納之前，社會民主黨黨員，基督教社會黨黨員和奧籍德人，已在德人的奧地利以幾乎不流血的革命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十一月十二日，臨時政府頒佈了試行的憲法，宣布奧地利爲共和國，並爲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國的整個一部分。皇帝的黑金兩色旗被改爲紅白紅三色旗，昔爲皇城的維也納則成爲共和國的首都。其時聯合帝國的非德人所屬的部分已成爲捷克斯拉夫與匈牙利兩個新興國，或變爲意大利、羅馬尼亞、巨哥斯拉夫與波蘭的疆土。帝國之崩潰大都未經暴力，大部分的原因，由於查理士的行動，他已解除了他的官吏在他登位時對他所立的忠順之誓。

在奧地利宣布爲共和國與選舉國民議會（一九一九年二月）之際，臨時政府監護着國家的福利。政府的主席由握權的政黨領袖輪流擔任，這些人差不多都是社會民主黨黨員和基督教社會黨黨員，他們無意於讓奧地利成爲一個共產國，因之迅速地鎮壓了許多赤黨的暴動。這般政治家中最傑出的就是鮑爾（Barner）、阿德勒（Adler）、芮涅（Renner）、宰滋（Seitz）、宰泊爾（Seipel）諸氏，他們都願提早確立法律與秩序。由奧人在戰後所遇到的困苦艱難觀之，這自然是一種有幸的情形。

在軍事的敵對行動結束的時候，成千成萬的捷克人、波蘭人與匈牙利人軍隊從前線各處經過奧地利開拔回家。超過一百萬的俄國與意國俘虜也於被釋放後各回本國，雖然他們大多數急於離開奧國，他們往往徘徊道旁，企圖一逞，來補償他的在囚營中所受的痛苦。在維也納，就有許多從前線歸來的飢餓戰士揚言欲起暴動，除非政府給與他們食物和住所。

德人的奧地利是聯合帝國的一分子，亦曾爲比較能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之中心。它從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取得原料和食料，從加里西亞和匈牙利取得穀類，它在亞得里亞海邊有過兩個最好的港口，以製造品出售於帝國各地方及外國。這一切竟因接着軍事失敗而發生的崩潰完全變了。鋼、鐵、汽車、鐵路、電氣、織物、造紙等大工業及銀行業全歸毀滅了，因爲所有的原料現在都在外國地方，因爲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各鄰邦都建有很高的關稅壁壘來抵制奧國的出產品，並因爲奧國祇能種植它的人口所需要的糧食十分之一。

失業的問題馬上成爲令人膽寒的景象。奧國的各重要組織都因領土喪失的結果人浮於事。奧國的官僚政

治本以冗員太多爲世所詬病，此刻成千成萬的災官都斷了生計。一般郵務員、鐵路人員、銀行辦事員和新聞記者亦然。醫生、教授和商人皆面有菜色，奄奄待斃，那一大羣的陸海軍軍官及產業見奪的貴族，更不必說了。

在停戰後四個月內，協約國對於中歐同盟國繼續實行食物的封鎖。奧國因此項行動蒙害最大，在一九一九年，約有四〇、〇〇〇奧國兒童被送往國外（特別是到斯干地那維亞（Scandinavia）三國）喂養。另一批兒童（九〇、〇〇〇人）則於一九二〇年前半年被送出。有一個時期，許多失業的，凍餒的維也納人被遣至維也納森林伐木爲薪，由殷實的居民出資購買，並不是因爲他們需要木材，而是因爲這種辦法似乎是使那般無產民衆有事可做，不致騷亂的權宜之計。當美國的賑濟團來到奧國的時候，情形始略見改善。（註）

（註）這種可怕的情景（特別是在維也納）勞勃脫·牛曼（Robert Neumann）在他的洪水（Flut）這部小說內有生動的描寫。

（乙）國民議會

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之冬使奧國岌岌可危的混亂和破裂，引起了一般人渴望早日恢復秩序與經濟的穩定的心思。因之一九一九年二月的議會選舉，以比例的代議制和普選權爲基礎所舉行者，卒造成中和黨派的勝利。臨時政府於是辭職，以政權讓與「粉紅色的聯合政府」，這個政府的構成分子就是在議會中取得多數席次的都市社會民主黨黨員及鄉村的基督教社會黨黨員。宰滋當選爲國民議會的議長，芮涅則被推爲總理。兩人皆屬於社會民主黨。

國民議會承認臨時政府的宣言，其中大意謂德人的奧地利爲共和國，並且是德意志的整個一部分。接着海

布斯堡皇族被放逐了，它的財產被沒收了，使奧地利的地位適合爲德意志聯邦之一分子的對外政策也擬定了。政府卻沒有盡力商議維持從前與聯合帝國其他部分所成立的經濟協定。在這種情形之下，維也納當局在對德和約公布前從法國外交部忽開協約國決不准許所計劃的德奧合併，不覺大受震驚。

強迫奧地利於一九一九年九月接受的聖澤曼條約，就載有禁止德奧合併的條文，其中並規定此項合併祇有在得到國際聯合會行政會的許可時方能實行。因爲就一般情形而言，行政會的決議案必須經過全體一致的通過，所以合併的希望至少說是可疑的。就是「德人的奧地利共和國」一名稱也須抹去「德人的」三字，而改爲「奧地利共和國」。國民議會此刻除在抗議之下進行制定永久的憲法外，沒有選擇的餘地，制憲之事前經停止過，爲的相同草擬的德國憲法適合。最後，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議會採取了以基督教社會黨人所提出的草案爲藍本的憲法。該黨深恐許多過激的維也納無產階級在中央集權的國家中佔優勢，所以想出一個類似瑞士的聯邦制度。

憲法所制定的政府，包括總統一人和兩院的立法機關。下院稱爲「國民議會」(Nationalrat)以年齡超過二十歲之國民所選舉的議員組織之，任期爲四年。國民議會必須於選舉後三十日內集會，除以該會議本身之決議或法律外，不得使之閉會或解散之。上院稱爲「聯省議會」(Bundesrat)以各省(共有九省)所出代表最少三人最多十二人組織之。該項代表由省議會選舉，聯省議會的權力大都爲顧問性質。總理與內閣對下議院負責，並得以該院之單一決議彈劾之。

兩院合攏來構成聯邦議會，在一九二九年前，該議會有以祕密投票法選舉大總統（任期四年）的權力。在一九二九年，憲法中規定大總統由人民普選。大總統得連任一次，凡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上之公民，除從前的皇族外，皆有被選資格。大總統的每項行動應由總理或適當的內閣閣員副署。憲法中並無副總統的規定。

創制權與限制的複決權亦經規定，特別是在計議變更憲法的時候用得到。省議會保留着很大的地方自治權，在許多事例中，國民議會所通過的法律也都交由省議會施行。司法的尊嚴是政府的主要特質之一，最高法院具有廣大的覆審權。關於社會的，勞工的和農村的改革，國民議會安於草定一個範圍很大的計劃，由各省去執行。根據新憲法的第一屆國會選舉，於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七日舉行。社會民主黨喪失了他們的最多數於基督教社會黨，一部分因為他們自己發生內訌，一部分因為一般人不滿意澤曼條約，另一部分由於反塞姆族勢力的潮流。選舉後兩天，基督教社會黨聯合汎德意志黨成立新政府，這是共和國歷史上第四個政府。十一月二十五日與二十六日，上院議員的選舉舉行了，十二月九日，聯邦議會推選在學術界頗有聲名的亥尼士（Hainisch）為奧國的第一任大總統。同月，奧國獲准加入國際聯合會。

差不多在新憲法被採用後十五個月，奧地利共和國的疆界終經劃定（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奧地利包括九省：部耳根蘭特（Burgenland）、克倫地亞（Carinthia）、下奧地利（Lower Austria）、上奧地利（Upper Austria）、薩爾斯堡（Salzburg）、士的里亞（Styria）、提羅爾（Tyrol）、復拉耳堡（Vorarlberg）與維也納（Vienna）。克倫地亞（Carinthia）的克拉根佛爾德盆地（Klagenfurt Basin）之讓與奧地利而不割與巨哥斯拉夫，祇在一九

二〇年十月十日所舉行的民衆投票之後，投票的結果表明大多數的居民寧願歸奧以後。至於奧國的保有部耳根蘭特，一直到一九二一年之末爲匈牙利所詰難，匈牙利本來駐有軍隊在該區域內，後來因爲大使會議的動議始行撤退。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部耳根蘭特的奧登堡（Odenburg）城內外的居民在一位意大利將軍的監視之下舉行了特別民衆投票，結果該區域卒被判歸匈牙利人。奧國的面積有三二、三六九方哩，人口有六、六八〇、〇〇〇人（據一九三二年的統計）。單是維也納一城的居民就達一、八〇〇、〇〇〇以上。

（丙）狂風暴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年）

在一九二一年中，奧國的經濟情形每況愈下。尤以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之冬最爲嚴重，餓死的人盈千累萬。政府徒知仰助於通貨膨脹的政策，祇使事情更形複雜，奧國的克郎銀幣，額面價格原值二十仙，不久就一元可換三千個了。在一九二一年之初，絕望的政府當局乞求國聯助以款項，以便購買糧食來賑濟嗷嗷待哺的人民。國聯的答覆爲派遣一個調查團以調查奧國的問題。其時有各種國際借款與信用貸款（總計達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及慈善經費（約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暫充急賑之用。

這種可怕的經濟狀況，更促進了與德國合併的運動。一九二一年二月十日，規定舉行關於合併問題的民衆投票的法案，被提出於國民議會。如果該議會議決贊成合併，政府即進行請求國聯給予同意。然而協約國不准舉行民衆投票，並聲言如將該項法案通過，它們必實行懲罰奧國。因之該項議案卒被打消，但有幾個行省以爲即使奧國被禁止與德國合併，此項禁令決不能適用於各個行省。在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提羅爾的民衆投票以

一四五、三〇二對一八〇五之票數贊成合併。薩爾斯堡則於五月二十九日以一〇三、〇〇〇對八〇〇之票數表決合併。當士的里亞與奧地利準備舉行同樣的民衆投票時，協約國即揚言欲加干涉，中央政府乃加充分的政治壓力於各省阻撓此民衆投票。

一九二一年六月，叔柏爾 (Schöber) 博士成爲另一個聯合內閣的總理，他本是維也納的警察總監和汎德意志黨的領袖。他執掌政權到一九二二年五月，但他在任之時，曾兩次改組內閣。叔柏爾政府費了很多時間從事討論改良的財政方案並取消許多爲從前較急進的內閣所取的傾向於社會主義化的步驟。奧共和國又參加坡托·羅薩 (Porto Rosa) 的會議，多瑙河流域諸國即在這個會議重新訂正它們的關稅稅則，使彼此有利。依據拉那條約 (Treaty of Lanna)，捷克斯拉夫以五億捷克幣的信用借款給與奧國，奧國則報以友好的保證。但預算案的危機，終迫使叔柏爾內閣不免傾覆。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一個中年的耶穌會教士和基督教社會黨領袖宰泊爾繼任爲總理。他上臺後就與汎德意志黨妥協，好叫他們繼續與基督教社會一鼻孔出氣，接着他又遊歷外國，以便爲奧國取得經濟上的幫助。意大利首相法克塔 (Facta) 在這個當兒宣稱意大利當認德奧兩國間或奧國與其他多瑙河流域諸國間的任何種合併爲戰爭的導火線。宰泊爾因之不但訪問德國和捷克斯拉夫，並且也聘問英國和意大利，最後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向國聯致送特別的請願書。

國聯行政院經過相當的調查和商討後，向奧國提出一種計劃以待批准，依此計劃，英、法、意、比、捷克斯拉夫、西

班牙與荷蘭當擔保以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克郎（一三一、六九〇、〇〇〇元）的借款給與奧國，爲期二十年。奧國的資產有如菸葉專賣權應用作抵押品，奧國並須保證從事若干種經濟的改革。國聯應委派一個總委員和一個管理委員會（以各擔保國所派委員各一人組織之）駐在維也納，但他們不得侵犯奧國的主權。最後，各國重新擔保奧共和國的土地完整與經濟完整，奧國則重申不放棄本國之獨立的諾言。

奧國國會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批准了上述的計劃，並通過全權法（Law of Full Powers）授權內閣在一九二四年年底前辦理一切實行財政計劃的必要事宜。鹿特丹（Rotterdam）地方的親麥曼（Zimmermann）博士被派爲國聯的委員，在一九二四年，成立了一種代克郎（Crown）新的貨幣單位——錫令（Schilling）額面價格約值十四仙。財政上的進步很快，在一九二五年，奧國即能有滿意的決算。因之國聯行政會在六月間決定國聯對於奧國的管理應於該月告終。

其他範圍內卻沒有同樣的進步。一般的不安是可驚的，在一九二四年，接二連三地發生社會黨謀刺宰泊爾的事情，六萬金屬業工人的罷工，及嚴重的鐵路罷工。那個耶穌會員總理於是祇好辭職，由另一個基督教社會黨黨員拉美克（Ramok）繼任（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此時亥尼士博士再度當選爲大總統。

在拉美克的任期內，國內的困難情形依然存在，到一九二五年之終，失業的人數超過二十五萬。局面的不安和經濟的停滯重新引起了合併的觀念，一九二五年二月，德、奧的主要官吏將這件事提出於馬德堡（Magdeburg）大會。當時嚷求德、奧合併的示威運動非常盛行，以致意大利和小協商國向奧政府警告，要求阻止任何公

然的行動。

一九二六年十月，拉美克辭職，表面上因為與文職官吏發生意見，實際上因為他的政友與一件銀行界的醜事有關聯。繼其任者又是宰泊爾，他不久就和社會民主黨因年老與殘廢者贍養金的問題大起衝突。經過一九二七年四月的新選舉之後，宰泊爾另組政府。七月間，他的內閣遇到瀕於內戰的嚴重局面。我們要明白這個危機，必須略述國內兩個強有力的，敵對的政治組織——「國防衝鋒隊」(Heimwehr)與「保護同盟」(Schutzbund)的發展。

(丁)國防衝鋒隊與保護同盟

從共和國的最早時期起，奧國的工業派與農業派之間即有惡感存在。維也納、奧國東部平原（自維也納南及於維也納——紐斯大得特 (Wiener-Neustadt)）及士的里亞礦區的工人組成工業的無產民衆，有社會主義與反宗教的傾向。這般工人是社會民主黨的核心。其餘的奧國人大多數為農民，保守分子和虔奉宗教的人。他們擁護基督教社會黨和汎德意志黨，極力反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

大戰後，維也納完全落於社會民主黨之手，市政府的權力擴大及於各種很廣的範圍。法律將租金降得非常之低，以致分租的房屋成爲無人過問的滯貨。此外，政府又徵收很高的租金稅，此項收入用以建築市房，以居工人。這種市房的建築頗得當，光線充足，有隙地可透空氣，通常圈有一個引人心目的庭院，其中以著名的社會黨領袖的半身塑像爲點綴。卡爾·馬克思館 (Karl Marx Hof) 於一九三〇年造成，是歐洲最大的公寓，長達五分之

三哩，有住室一千四百間。

市政府又取得公共汽車與電車線及地道，水電系統的管理權。市立的啤酒釀造所，麵包店，冰店和火葬場亦經創辦，火葬場的設立雖遭天主教教會竭力反對，但政府不顧。許多舊校場被改為公共游泳池和運動場。從前的皇宮有幾所被租為事務所，其餘的則被撥充政府各機關的辦公廳之用。

以上一切行為大多數遭保守的農民詛咒，而維也納與內地農村之間的仇恨很明顯地表現於兩個敵對的團體之組織，這兩個好戰的團體就是農民的國防衝鋒隊和社會主義者的保護同盟。國防衝鋒隊或奧國的法西斯黨的政綱，要求打倒維也納的社會黨並與德國合併。在斯泰得爾 (Steidle) 與普夫利茂 (Priemer) 兩博士及富有的斯太漢堡 (Starhemberg) 親王的領導之下，國防衝鋒隊與德國的希特勒運動相應。國防衝鋒隊約有六〇、〇〇〇武裝的隊員（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其中祇百分之十是工人。

保護同盟計有（一九三一年）受過訓練的團員約九〇、〇〇〇人，集中於工業區域。這個團體似乎保有巨量的軍火和軍用品，儲藏於祕密地點如社會黨報紙的發行所等處，但政府時時搜捕這種私藏軍器的地方。國防衝鋒隊與保護同盟常常安排示威遊行，幾乎在同一地點和同一日子，於是政府不得不盡力設法維持治安。因為根據和約，奧國的軍隊限於三萬人，所以實際上政府在國內祇有極少的兵力。

恰巧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法院陪審官把三個被控謀殺在部耳根蘭特兩個社會黨員的衝鋒隊隊員釋放。全國的輿情堅以被告為有罪，在判決後第二日，維也納盈千累萬的工人未經初步的警告就實行罷工，他們

廣集於名流所聚的「圓路」(Ringstrasse)，擊敗勢力較弱的警察隊，並縱火焚燒那所華美的「審判宮」(Palace of Justice)。騷亂繼續了三天，其間死者數十，傷者數百。審判宮被毀壞一部分，很多文件和檔案均付一炬，或被水漬，或零亂散失，各業也暫時歸於停滯。

自經這次劇變後，這兩派有組織的團體衝突益烈，不斷地發生事故。在許多較危險的騷擾中，有下列幾起：一九二八年三月在費爾特扣區，一九二八年十月在維也納新城，一九二九年二月在格洛格尼茲(Gloggnitz)和維也納，一九二九年八月與十一月又在維也納，所發生者。在一九二九與一九三〇兩年中，國防衝鋒隊有好幾次揚言要效法意大利的法西斯黨進佔羅馬一樣進佔維也納，並推倒他們所認為柔弱無能的國會政府。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三日，普夫利茂博士宣布自立為迪克推多，並命令他的黨徒奪取士的里亞地方的幾所公共建築物。然而奧國軍隊迅雷不及掩耳地打破了這個政變，有幾個領袖不久即遭逮捕。十月，所有一切被告皆經格拉斯(Gras)地方的陪審官開釋。總之，祇要國防衝鋒隊與保護同盟存在一天，奧國是否能享受任何程度的國內安寧，似乎還屬疑問。

(戊)對外問題(一九二七—一九三二年)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這幾年中，奧國總理宰伯爾的心神為重要的德意關係所攝。常常發生的合併問題此刻又突然呈現，在一九二七年，一個德國的和一個奧國的委員會聚在一起從事討論使兩國有相同的刑法的方法。同年十一月，德國總理瑪克斯與外交總長史德理斯曼屢次聘問奧國，表示友好，到一九二八年九月，德國司

法總長又出席於在薩爾斯堡舉行的汎德意志法學家大會。一九二八年夏天，約有二十萬德國人在叔伯特祭日（註）遊歷奧國，兩國又時常有願在政治上和學術上團結一致的表示。可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奧國聯邦議會竟選舉反對合併的米克拉斯（Miklas）為大總統，以繼亥尼士之任。國務總理宰泊爾曾提議修改憲法以便頗得人心的亥尼士可以第三次當選，但他這個計劃終告失敗了。

（註）奧國舉行這個祭典，所以紀念大作曲家叔伯特逝世的一百週年。

一九二八年二月，由於總理宰泊爾與議員科爾布（Kohl）在奧國國會所發表的兩篇演說，其中深表同情於在意大利統治下的南提羅爾的德國人，發生了嚴重的外交上的糾紛，雖然演說者不過對於他們的同胞所處的苦境略表悲憫的意思，意國的駐奧公使立被召回，羅馬與墨梭里尼會商。墨梭里尼作了一篇強硬的警告言論，宰泊爾遂不得不於七月間另外發表較和緩的談話。意國公使乃行回任。

一九二九年四月，宰泊爾突然辭去總理之職，殊出一般人意料。他的退休顯然由於基督敎社會黨發生內訌，一般人批評他不該兼為傳教者和政治家，及本人的身體不健康（他在三年後就逝世了）。斯特利魯威滋（Stroop）HEWINS）此刻成為總理，其內閣中有六個贊成德奧合併的閣員。他的任期很短，可是艱難多故。一九二九年六月，法國白里安通知國聯，奧國的各種武裝隊伍使它成它鄰邦的威脅。奧國政府對此加以否認，但社會黨黨員指斥政府當局與國防衝鋒隊狼狽為奸。這種詰難激使國防衝鋒隊主張修改憲法，藉此可減輕工業無產階級的權力。當斯特利魯威滋反對所提出的若干修正案時，他的內閣就倒了，於是叔柏爾以一個中和的人才內閣重執政權。

(一九二九年九月)。

叔柏爾在試行採取急進派與保守派之中間方針時，遇到若干生死的關頭。十一月，英國外交大臣漢德森告訴他道，奧國如背離國會的政府，英國當認為對於歐洲安全的威脅。因之叔柏爾在十二月七日很順利地使他所擬的一批憲法修正案得到通過。這些修正案並不有礙奧國的聯邦組織，但將維也納的一部分稅收轉撥於下奧地利的財庫，增強大總統在危急時的權力，以大總統由民衆普選的制度代替國會選舉制，並減輕法院的政治權力。

叔柏爾總理既已採取行動來恢復秩序，就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出席海牙賠款會議，並取得各國的諾言，准許奧國至一九四三年止不再繳付任何賠款。接着叔柏爾訪問意大利（一九三〇年二月），作為請求外國資助金錢的第一步驟。與墨梭里尼會商後，他和意人簽訂了友好與協調公約，其中規定兩國間如發生任何爭執，當以司法手續解決之。該項公約中毫未提及南提羅爾，但意大利答應將來借款給奧國。叔柏爾又跑到柏林去，蓋恐怕德人有不良的印象，以為奧意的親密將阻礙兩國可能的合併。他在柏林商訂了一件德奧商業條約。此外，他復聘問英、法兩國，並向國聯保證他當盡力消除本國私行組織的軍隊的危險性。

叔柏爾於回國後依照他的諾言，提出裁軍法案於國會。其中建議將各省對於私藏軍火的監管權轉移於聯邦政府，並加重對於違犯國家軍器法律者的處罰。該項法案於一九三〇年六月獲通過於國會，雖然社會民主黨大加反對，以為它不過是欺瞞外國的方法，實際上決不足以減輕國防衝鋒隊的活動的危險。然而社會黨因政府

將國防衝鋒隊的參謀長及一九二〇年發生於德國的卡普陰謀案的共犯者帕布斯特 (Waldmar Pabst) 放逐國外，也多少感到痛快。

一個月後，叔柏爾看到奧國所急需的公債售完，非常高興。公債總數約達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利息七釐，分二十七年償還。因為此項公債票係照票面九五發行，所以投資購買者實際上可得較高於規定的利率的利息。由於一九三〇年來歐洲所感受的經濟壓迫，奧國的經濟狀況也毫無生氣，雖有公債之發行，仍無補於事。它的貿易差額漸漸不利，失業者的人數在一九三〇年某一個時期一躍而至每四個工人中即有一人。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叔柏爾內閣爲了委任一個國防衝鋒隊領袖爲國營鐵路總理而失去基督教社會黨的援助，遂致站腳不住，悄然下臺。在接着的兩年中，奧國換了四個總理，但沒有一個能夠消除國家將瀕破產的危險。(註)

(註)爲節省一九二九年的憲法修正案所規定的大總統選舉的費用起見，國會乃於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重又選舉米克拉斯連任總統。

(己)合併運動

法、意、捷克斯拉夫及其他國家所以反對德奧合併，係根據好幾種理由：(一)德國的面積遜於法國，但與奧國合併時，德國的幅員將超過法國。(二)德奧的人口如果聯合攏來將超過法國人口的一·七五倍。(三)如奧國歸併於德國，則捷克斯拉夫（它本身含有三百萬德國人）將一半爲德國的領土所包圍。(四)德奧一旦合併，將使德國成爲意大利的貼鄰，因之或使南提羅爾的問題更趨複雜。(五)德奧合併後，不啻將一塊強固堅厚的巨石橫放在中歐，這從軍事的觀點看來不利於法——捷與法——巨的同盟。此外，德國將與巴爾幹諸邦發生直接接觸。

(六)奧國雖煤量很少，卻有豐富的鐵、木材和水電力。德、奧的經濟力量的聯合是非常可怕的。

兩國打成一片，又有若干好處。奧國將在德國有自由的市場，將能與外國訂立較好的商業條約，並可以利用德國的非常發達的買賣制度。德國則將因之使與歐洲東南部的貿易關係大為便利，將能利用奧國的極佳的天然動力，並將使它的軍事力量大大增加。

可是，並非德、奧的全體人民都贊成合併。例如，許多德國的新教徒，不欲將六百萬以上的奧國天主教徒合併於德國。有些德國人覺得，就全體而論，奧國人在事業中和私人生活中是非常馬馬虎虎的，他們殊不願引這些懶散漢為同伴。他們以為德國已常代奧國受過，上當不淺，決不肯重蹈覆轍。

反之，許多虔信的奧國天主教徒，深恐一旦與新教的德國合併就會喪失教會的勢力。奧國一般人又不喜歡普魯士。奧人除若干較進步的商人外，似乎不希望普魯士的那種有效能的方法。有些維也納人則擔心與德合併後，維也納的地位將降為二等的省城，到那時它雖有光榮的過去，也不能掩蓋黯淡的現在。(註)

(註)據聞白里安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向法國國會演說時，曾主張下面這個關於少數民族之權利的奇異學說：「諸君常常聽見有人提起少數民族權利的方式。假定在某一個國家中，十分之九的人民把本國從地圖上抹去而作政治上的自殺行為，又假定祇剩十分之一的人民非常依戀本國而反對本國消滅，我就說，這個少數人民有權利滿足他們願繼續存在為一個國家的慾望。如以多數人民的意志，強使少數人民聽任本國歸於消失，乃是不可容許的事情。」

那時已有兩個重要的組織成立，從事運動合併。一個是「德、奧勞工聯合會」(Deutsch-Osterreich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 它的會員人數有限，但很重要，設總機關於維也納。這個聯合會的宗旨乃在草擬一種綱領，使德、奧的各種團體機關可依照它化成同一之體，並在防止足使兩國的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發生新的差別的任何趨勢或行動。其他一個就是「德、奧人民同盟會」(Deutsch-Osterreichischer Volksbund)，它的主要活動集中於德國。它專門從事排演民衆的合併示威運動與於雙方的邊境舉行會議。一九二八年叔伯特祝典所表現的汎德意志的色彩，大部分即是它造成的。

在一九三〇年，合併運動和「回到聯邦的思想」(Heim-ins Reich-Gedanke)，在奧國的官場比在德國更爲強烈。但到一九三一年，經濟上的需要驅使兩國簽訂了一個關稅同盟的議定書。這個議定書大遭法國、小協商國及其他國家反對，它們使用經濟的壓力強迫德、奧廢棄此項盟約。此後不久，世界法庭以八對七之票數提出勸告的意見，以爲這件盟約違反奧國在一九二二年所作不危害本國之獨立的誓約。

上述盟約的廢棄雖然弛緩了歐洲的緊張局面，但奧國所蒙的經濟困難仍未解決。在一九三二年，世界目擊奧國——以一個自主的國家竟向國聯乞求給與幾百萬元的信用借款，以便賑濟它的飢餓的人民。奧國拚死命力求從鄰邦得到有利的商業條約，但通常皆無效果。當局徒然藉助於無望的方法來防止本國金子供給額再行減少。各大銀行崩潰了，終致無現款餘剩好用來放賑。

在一九三二年之夏，有幾個國家以金錢貸與奧國，附有爲愛國者所不能接受的政治條件。然而經濟的需要畢竟克勝了其他一切的考慮。八月二十三日，國會以八二對八〇的票數批准了洛桑議定書。這件條約是因國聯

的贊助而草擬的，奧國藉此得到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借款，分二十年償還，但它必須承諾本國在一九五二年前決不與德國在政治上或經濟上趨於合併。力爭接受此項議定書的運動由奧總理陶爾斐斯（Dollfus）他是基督教社會黨黨員，領導着。反對接受者則以叔柏爾博士為首領，此派人包括汎德意志黨，農民聯合會及各種法西斯團體。在辯論此項議定書之中，叔柏爾突然逝世。四日後，議定書卒獲批准。

今日很少人敢斷定奧國的將來，但奧人自己仍舊相信那句很古老的預言：『奧國將永存於世界』——
“*Austria erit in orbe ultima*”。

匈牙利王國

（甲）自由主義的失敗

居主宰地位的馬札兒（Magyars）民族對於匈國內各受治的民族的不妥協態度，乃為促成大戰後匈牙利的崩潰的要因。正同日耳曼人在奧地利緊緊把持特權地位（甚至在大戰中形勢最劣的時候也是如此）一樣，馬札兒族在匈牙利也頑固地不理會國內少數民族要求政治上和社會上的較自由待遇的呼籲。的確，當查理士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頒布他的奧地利聯邦化宣言的時候，馬札兒人的首領們無意公佈關於匈牙利的同樣告示，就立即宣布一八六七年的「奧斯格萊虛」（Ausgleich）失效（註）。他們於是通告各國，匈牙利已成爲獨立的國家，僅因共戴一個君主的關係始與奧地利聯合。不料這種舉動竟激使國會中羅馬尼亞和斯洛伐（Slovaks）

民族的議員，堅決主張他們也須有同樣的民族自決權利，這真使匈牙利內閣總理驚愕沮喪了。並且，當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十月十八日承認捷克斯拉夫和南斯拉夫的獨立時，匈牙利國內的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立即要求同他們的同族人民合併。瓦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註）（一）「奧斯格萊虛」是一種調整一八六七到一九一八年的奧匈關係的公文。

奧地利國內有數量很多的中產階級團體，所以奧國即在分裂危機最高峯時候仍能維持其表面上的秩序，但在匈牙利，保有地產的貴族和奴隸式的農民為數佔全人口的四分之三，就沒有這種自制的工夫。在起初一個短時期內，人民頗有約束，這應歸功於卡羅爾易（Michael Károlyi）伯爵的勢力。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卡羅爾易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會，以國會中的私黨，加上國會外的社會主義派和非馬札兒人團體的適當分子組成。這個革命性質的聯盟以布達佩斯（Budapest）的衛戍軍為後盾，要求委任卡羅爾易為內閣總理，竟達到目的。

這位柄政的伯爵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和共和黨人。他雖出自貴族的門第，並擁有很大的財富，但以從事全民普選和割分大地產的運動而著名。在大戰時期內，他是一個暢談無忌的和平運動者，始終反對德國的政策，並聲言他深懼德國的勝利比奧匈的失敗將有更壞的結果。他比較得協約國的歡心，並希望一經上臺即可為他的國家謀得特殊的待遇。他做總理後的第一件行動即在使（十一月二日）他的屬員得免除盡忠於查理士的宣誓。接着，他在命令匈牙利軍隊從前線撤退並立刻全體復員之後，就前往柏爾格雷德（Belgrade），企圖從法國東方

軍司令官豆斯潘雷 (Franchet d'Esperey) 將軍處得到比較地亞士 (Diaz) 將軍前在朱斯提別墅 (Villa Giusti) 所給予奧——匈的較優的休戰條件。

但是，豆斯潘雷將軍對於卡羅爾易的代表團中不甚嫻雅的團員，率直地表示鄙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又將匈國的領土一部分割與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甚至比較地亞士所指定的還要多些。同日，卡羅爾易接到查理士的上諭，聲明他因讓位不再參與匈牙利的國事，他的失望纔稍稍減輕。就事實而論，這種「讓位」在憲法上是無效的，因為此項公文並未經國會所委的閣員副署，但在最近的將來，牠使卡羅爾易在政治的進程中較易應付。

十一月十六日，匈牙利宣佈為共和國。國家行政會解散了舊有的立法機關，並下令舉行應用普選方法的國民議會之選舉。其時卡羅爾易內閣草定了一個政綱，預許出版自由的法律，陪審制度，集會自由，比額的代議制；農村和教育的改革，政教分離，少數民族問題的公平解決，與鄰國交好，並單獨與協約國媾和。

外交與內政兩方面不利的形勢實際上使這個政綱無施行的可能。國內的少數民族不再斤斤於「權利」了；他們期望與匈牙利完全脫離。協約國不但不以特別的體諒待遇匈牙利，反而加緊封鎖。自前線歸來的兵士增加了失業和挨餓的人數，而外國的俘虜現在沿着國境騷擾蹂躪。保守派反對分裂大地產的計劃。共產的思想從俄國流傳進來。政府機關中若干猶太人的財富與權力日益增加，這種情形更激怒了反塞姆族者的情緒。一九一九年正月，民族部部长雅斯席 (Oscar Jaszi) 的辭職使內閣失去了一位能力最強的份子。不久社會民主黨全體

都遺棄了卡羅爾易，他因此只得將國民議會的選舉延期舉行。

國家行政會在一九一九年正月十一日的會議席上，力圖推舉卡羅爾易爲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臨時總統，以排擠他。在貝林刻（Berinke）領導下的新內閣頗多弱點，卡羅爾易卽利用此種弱點努力使農村改革法案通過（二月十五日）以恢復他的權力，依照此法，私有地產面積不得超過七百英畝，而政府補助農夫按照戰前地價購買小田產時，分五十分拔還。但是這個改革又來得太晚了。許多農夫反對此項計劃，因爲他們可以在更好的條件之下直接從地主手中取得田地。此外，社會主義者反對此項法律，深恐牠阻礙土地完全收歸國有的進程，而保守階級認爲這是一種等於沒收的辦法。

三月二十日，當消息傳來，巴黎和平會議業已確定把德蘭斯斐尼亞（Transylvania）判歸羅馬尼亞的時候，卡羅爾易受到最後的打擊。因爲國家行政會議或卡羅爾易都不能服從和會的這種處置，匈國總統遂行辭職而亡命國外。一個隸屬於社會黨政府的職員孔飛（Sigmund Kurf）和一個在獄中的共產黨領袖貝羅孔（Bela Kun）預料到卡羅爾易的下場，早已草定計劃，擬將社會民主黨和最近成立的工人與兵士會議聯合起來。這個聯盟取名國際革命匈牙利社會黨並準備隨時奪取政權。當卡羅爾易去國的時候，貝羅孔立刻從獄中被釋，成爲新政府的首腦，並兼外交委員。一位從前做過磚匠的加貝（Alexander Garbai）則當選爲總統。

（乙）赤色與白色的狄克推多制

貝羅孔是一個猶太籍的新聞記者和政治家，大戰期內他在奧匈軍隊中擔任軍官職務，直到被俄人俘虜入

獄、一九一五年爲止。在俘虜營中，他同許多俄國革命黨人結交成友，當三月革命發生時，他被釋放出來，成爲克倫斯基 (Kerensky) 的宣傳局局長。到十一月革命之時，他得到機會與列寧和托洛茨基 (Trotsky) 相識得很熟。大戰後，他以假造的護照重入匈牙利，並編輯破壞性的赤色新聞 (Red News)。他時常與警察發生衝突，有一次竟受傷而被捕入獄，他與社會民主黨磋商聯盟，即是他在獄中休息的時候。

人民委員會 (孔內閣自稱的名辭) 執政之後，即頒行激烈的命令，以革命法庭的審判驅逐政治上的異己者，禁止酒精的出售與消費，組織精強而有紀律的紅軍。一俟將社會民主黨擠出政府之外，立即將教會財產、礦山、銀行交通運輸工具、雇用二十五人以上的商店、面積在一百英畝以上的地產、和一切超越某某最低限度收入的私人財產完全收歸國有。

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匈政府採取了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正式憲法，並準備向鄰邦宣傳赤色福音。以前的政府所留下來的許多硬幣都運往意國以購買軍火和軍器，而另採一種新幣供國內之用。匈政府又將款項運往維也納供戰場上應用，貝羅孔率領了他的紅軍與捷克斯拉夫人作戰。憤發的革命軍比較不費力地攻克了斯洛伐幾亞的時候，國內的反抗也在「赤色恐怖」之下鎮壓住了，這一件事是由一個名叫柴苗雷 (Tibor Selményi) 的流氓所領導的。

共產政府之必歸失敗，在命運上早已決定。農民拒絕任何人以新幣來購買他們出產的糧食，協約國仍維持封鎖政策，結果使匈牙利各城市瀕於饑荒。職工組合主張者因爲工廠缺乏原料而倒閉，並因許多猶太人得到高

級官吏的地位，大爲憤怒。同時益千累萬的反對革命的人，即所謂「白黨」的，在約瑟夫大公爵（Bethlen）伯爵，卡羅爾易的異母兄弟朱理亞（Julius）和從前奧——匈海軍的海軍中將和帥（Horthy）等人的領導之下，於法軍佔領區域內的塞革特（Szeged）地方集合起來。雖則在布達佩斯（Budapest）發生的那次未成熟的白色暴動輕易地被鎮壓住了，但一般的不安不久傳播各處，形勢很爲危險。貝羅孔深懼巴黎和會的震怒將轉變而爲對付他的軍事行動，他就從捷克斯拉夫撤退回來，率領他的隊伍抵禦向布達佩斯前進的羅馬尼亞軍隊。這次貝羅孔戰敗了，他最後的希望也粉碎了。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他往維也納——在那裏被安置於瘋人院。他終於設法逃到了俄國。

在貝羅孔遁逃數天後，一個社會民主黨黨員叫倍特兒（Pethő）的出來處理政務，但不久大公爵約瑟夫（Joseph）——他被返國的反革命派推爲匈國的執政——就委派孚利特里虛（Stephen Friedrich）爲內閣總理。哈布斯堡的勢力之死灰復燃，使匈國的各鄰國大大震驚，它們堅持約瑟夫必須退出匈國政府。同時，匈牙利國內秩序的紊亂爲匈國所向未經歷。羅馬尼亞的軍隊，不願協約國最高會議的勸告，佔據布達佩斯達三月之久，凡能以火車、貨車、或人力運走的物件無不劫掠殆盡。在羅馬尼亞軍離開布達佩斯三天之後，和帥（Horthy）繼約瑟夫爲白色軍司令將軍隊開進匈國都城（十一月十四日）。他以胡斯柴（Huszár）替代孚利特里虛做內閣總理，並與協約國講和。

議會的選舉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舉行了。任何的政黨都沒有得到最多數，但所選的代表中有百分

之九十五是傾向於帝制的。因此，議會在首次集會時即行恢復以前帝制的憲法。因為協約國二月二日的備忘錄阻止哈布斯堡皇族重登皇位，和帥就被指派為總督兼攝政者。此後十二個月中，除內閣的升沈，反動的法律的激盪，和對於猶太人的大屠殺之外，並無其他重要的政治事件。直至伯爵柏特楞於一九二一年四月就任內閣總理，國內始逐漸恢復秩序和安定。

反動既達這樣程度，查理士遂受人慫恿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回到匈牙利復辟。但是，和帥因事前未得議會的同意，拒絕交出政權。此外，各主要協約國提出猛烈的抗議，而捷克斯拉夫揚言除非查理士立即離開匈牙利，即將採取軍事行動。這位哈布斯堡族人在憤惱與惆悵之中回到了瑞士。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他重又啓程赴匈牙利，這一次是乘飛機去的。他在奧登堡下機之後，即率領臨時聚合起來的人衆向布達佩斯進發。和帥力圖諫止查理士從事這種冒險之舉，但未成功；三天之後，當捷克斯拉夫和南斯拉夫開始動員的時候，和帥派了哥麥波上校率領軍隊抗拒查理士入京。查理士不久被擄，押送到多瑙河中的英國軍艦上。（註）小協商各國於是強迫匈牙利議會於十一月通過廢立法（De-thronement Act），廢去哈布斯堡皇族並規定以選舉產生國王。十一月十日，匈牙利承諾在選舉國王之前，與主要協約國商議。

（註）查理士和他的家族在十一月十九日被流放到馬得拉羣島（Madeira Islands）。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他染了海島熱病和肺炎而逝世，享壽僅三十五歲。

一九二二年的上半年，匈牙利國民議會就壽終正寢。它除了締結非常不滿人意的特喇農條約之外，兩年來

實毫無成績可言。牠並未解決國內政體的問題，甚至連它本身繼承者的選舉方法都未制定。和帥和內閣總理柏特楞因此草訂了一件行政的選舉法令，其中大大限制選舉者的人數，並規定鄉區之選舉應以公開投票法替代祕密投票法。再者，政府又施行嚴格的新聞檢查，禁止印行馬克斯·列寧和惠特曼（Whitman）等人的書籍。自然，當選加入新議會的代表們泰半是與政府親善的。正統派（Legitimists）想推查理士之子鄂圖（Otho）大公爵爲國王，但他們並未得到選舉者的鼓勵。因之柏特楞內閣得免又陷於外交上的糾葛。

那般企圖打倒攝政的極端保皇黨卻不因選舉失敗而懊喪，他們乃從事創設具有法西斯蒂性質的祕密會社，與和帥、猶太人、職工組合派和共產黨抗爭。以上各派的核心即爲『馬札兒人覺醒社』和『匈牙利統一協會』。這兩個團體設立的宗旨在於鼓起反對和平條約的運動。有些白色恐怖主義者鑒於意大利法西斯黨在一九二二年的勝利而心動，於是與巴威保皇黨聯合，共謀推翻幾個中歐政府。自然，匈牙利當局是反對這樣冒險的活動的，在一九二二年秋天，匈國議會通過了國防條例。該項條例給予匈牙利王國政府約束過於熱烈的保皇黨的權力。

從一九二一年四月到一九三一年八月，匈牙利政府的真正首領和實際上的獨裁者就是內閣總理柏特楞。號稱『歐洲的怪物』（Sphinx of Europe）者。他是以一八七四年生於德蘭斯斐尼亞省熱內業綏格（Gernyesszeg）地方一個貴族而殷富的家庭。一九〇一年，他初次加入國會，不久就顯出他有不可思議的才幹，能在辯論中以極簡潔的句子爲任何方面捉住爭論之點。他受世界大戰和特喇農條約之影響，成爲貧乏悲苦，因爲他是

寧願犧牲德蘭斯斐尼亞的大地產，而不願取得羅馬尼亞公民資格的「自願選擇者」的一分子。

在國防條例通過後數年內，柏特楞鞏固了他的統治權力。一九二五年，政府將人民的選舉權更加限制，採取新的步驟，抑止共產黨，對猶太人入大學的名額嚴予限制。國聯對於最後一點提出抗議，認為違反少數民族權利的原則，於是此項法律終得經過修正。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院的議會創立了一個上議院，以替代昔時的「上議院議員圓桌會議」(Table of Magnates)。上院的二四四個議員中，大多數是由匈國幾個固有的團體（包括貴族、教士、市政會、商會、其他商業組織和職業團在內）選舉或推定的。其中有幾個經政府加委為終身職，少數高級官吏如陸軍總司令則依職位為當然議員。但是，此院僅具有延擱議案的否決權，對於預算無權過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大戰後的第三屆議會選舉舉行了，與政府親善的統一黨輕易地獲得了勝利。顧及地主、富農、商業團體和教會的利益的種種政策，至少仍可繼續施行五年。

(丙) 財政與經濟

當柏特楞內閣就職的時候，牠遇到兩種特殊緊急的工作：使匈牙利脫離小協商各國的干涉，完成匈國財政上與經濟上的改造。當柏特楞在一九二二年設法使匈牙利加入國聯的時候，小協商國的威脅已銳減了。雖則匈牙利以簽字於國聯盟約而默然保證決不企圖強行修改本國的疆界，但牠本身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同時也得到了保障，並且她可以比較安心，不怕她的強鄰的突然干涉了。復次，她在國際團體中的新地位，可以幫助她解決財政上的困難。

當國聯從事於奧地利的財政改造時，匈牙利向國聯賠款委員會請求同樣的幫助。委員會就加以調查，並草擬了一個救濟的計劃，經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國聯行政院所採納。計劃規定：（一）在國聯主持之下借給匈牙利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克郎（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國際借款；（二）制止通貨膨脹；（三）創設具有發行紙幣專權的獨立銀行；（四）分期付款賠款，每年付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克郎，二十年付清；（五）指定海關收入和國家專利企業的進款為借款的擔保；（六）委派國聯主任委員一人。匈牙利在一九二四年二月接受各該項條件，五月，波士頓的大理財家史密斯（Jeremiah Smith）前往布達佩斯充國聯所派的委員。在他指導監督之下，匈牙利王國在一九二五年開始時即設法使預算保持均衡，比根據財政改造計劃所規定的和所預料的早十八個月。因此，國聯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投票決定停止它對於匈國財政的管理權。史密斯的和婉態度和同情心，使他在匈國很孚衆望；他在辭職時，以他的薪金一〇〇、〇〇〇金元指贈匈牙利的貧民。一九二七年正月一日，匈政府改用新幣制單位，「噴古」或「金格雷」（‘pango’ or ‘jingle’）此幣值美金一七·四九分，預算亦繼續表示有盈餘，直到一九三〇年為止。

經濟的改造比較財政的革新更難達到。為和平條約所瓜分的匈牙利，曾經是具有數世紀地位的，界限清楚的地理單位和政治實體。但是，特喇農條約將這個舊王國的土地割去了三分之二，將它的人口奪去五分之三，以致新匈牙利沒有一個海口，缺少木料和水力的來源，僅有很少的鐵道終點。（註）匈國保留着絕妙的鐵路網，以新工業替代已喪失的工業的志願——和高率的關稅。

(註)匈牙利現在的面積約計二五、九〇〇方英里，人口依照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的戶口統計爲八、六八三、七四〇人，居民百分之九十是馬札兒人。

匈牙利努力企圖培植新的工業，一部分是成功的，但匈國依然是農業國。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八十二，專供農事和牧場之用。全國人口雖有一半直接依賴田地爲生，匈牙利仍是大地產制的國家。在一九三〇年，農田面積三分之一集中於一五〇〇大地產，同時約七五〇、〇〇〇小田戶一共僅擁有不到二分之一的可耕地。(註)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匈牙利因穀類在世界市場中跌價的緣故損失甚重。

(註)匈政府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命令強迫國內五〇、〇〇〇吉普賽人(Gypsies)放棄他們的遊牧生涯，安居在農場上，用匈牙利語言並納租稅。

匈牙利所以重要，在於它是糧食的輸出國和製造品的輸入國，因爲這種關係，她在促成多瑙河聯盟的任何行動中，佔着戰略上的要害。小協商國，奧地利和匈牙利之間曾舉行過多次會議，以經濟聯盟的問題爲主要的議題。每次會議關於聯盟的事情，都遇到同樣的阻礙。各關係國對於國家的尊嚴和主權彼此猜忌，以致難以達到讓步與妥協。此項聯盟究應採取何種方式一問題，又爲另一困難之點。列強深懼奧地利與捷克斯拉夫的工業將在聯盟中占特惠地位因而影響到使本國喪失市場，所以對於聯盟計劃都抱冷淡的態度。有幾次，前項會議的不順利結果，致使參與會議的各國之間宣告關稅戰爭。

(丁)復辟與疆界之改正

一九二〇年後匈牙利的外交關係，根本爲皇位問題與和平條約問題所造成。倘使保皇黨內部不分裂，匈牙利法庭對於法西斯蒂運動者的寬厚態度，及柏特楞的保皇情緒，也許可以使帝制的紛議早日得到解決。正統派堅持大公爵鄂圖必須加冕爲皇。鄂圖其時不過是一個小孩——他生於一九一二年——他的復辟運動極爲他美麗能幹的母親席妲(Nisa)所主持，她總是不厭煩的設法使她兒子重獲她的丈夫的皇冠。反之，『馬札兒人覺醒社』社員重行集合於大公爵阿德勒希特(Albrecht)的旗幟之下，擬擁戴他爲國王，他是哈布斯堡族匈牙利分枝的後裔。阿德勒希特的大舉也爲他的野心的母親——一位頗具有精神上和物質上的策略的比利時公主所勉勵。

在一九二六年，一切熱心的保皇黨黨員的活動受到暫時的阻止。一般反革命運動者爲籌款實施他們的計劃起見，在一九二五年開始僞製大批法幣——佛郎。當此項奸謀於一年後被發覺的時候，小協商國又驚惶失措，於是匈政府祇好勉強處罰這般犯罪者。許多高級官吏也被牽涉在案內，但政府對他們（他們聲辯的理由是爲了愛國並對法國復仇）處罰甚輕。大多數罪犯被釋放了，其他的人僅被判處短期監禁。

匈牙利鄰國的安寧的心境常常受到擾亂。一九二九年春季，各種謠言盪起，人心惶惶，以致柏特楞不得不宣稱現政府的形勢在各方面都能令人滿意，只要和帥活在一天，匈政府自然會維持原狀。縱然有這種保證，在將近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時候（那一天正是鄂圖達到成年並依照習慣成爲哈布斯堡族首領的日子），小協商各國又大起恐慌了。到了那天，鄂圖的領袖地位經全體族人（阿德勒希特也在內）加以承認，其時阿德勒

希特因與平民結婚，不能再爲皇位的競選人了。和帥與柏特楞準備應付政變，但當時並沒有任何變動事件發生。鄂圖在他母親所住的比利時境內一小鎮上舉行小小典禮之後，就回到盧芳大學（University of Louvain）讀完他的大學課程。他在簡單的演詞中表示他毫無危害歐洲和平的意思。

改正國界運動的前途比復辟運動更爲慘淡。和平條約不但把匈牙利的面積與人口大大減少，並且將三百萬馬札兒人劃歸它的鄰國。羅馬尼亞得到一百五十萬馬札兒人，捷克斯拉夫約得一百萬，南斯拉夫約得五十萬。此項和平條約在布達佩斯發表的時候，牠的四周圍縛有闊的喪用黑帶，同時領土回復主義者的運動突然爆發，此後情形一年緊張一年。在教堂、學校課室、私人住宅、電車、飯店、跳舞場中，各處都掛着舊匈牙利的地圖，失去的土地印成黑色，全圖圍以荆棘的皇冠。這些地圖上都印有『我們能讓他保持這樣的狀態嗎？』（Maradhat ez így?）這個問題，及『不！不！永遠不能夠！』（Nem! Nem! Soha!）的答案。郵票、膠皮圖章、信封、郵片、徽章、廣告、碟子、鈕扣和其他物件上面也都印有這三詞：『不！不！永遠不能夠！』

這種宣傳不僅限於匈牙利國內。它早已大規模地進行於全世界，在英格蘭和意大利兩國尤爲順利。匈牙利領土完整維持會和馬札兒人同盟會——其會員大部分是學生——爲改正國界的事情大事活動，力求取得外國的同情。這個同盟會在英格蘭設有分會，稱爲「牛津匈牙利民族自決聯合會」。凡能在外國提出匈牙利事件的機會，從未錯過。當國聯秘書長德魯蒙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遊歷阿根廷首都倍諾斯·愛勒（Buenos Aires）時，當時的匈牙利居民在匈文報紙上致他一封公開的信，對於特喇農條約竭力抗議。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兩

個匈牙利飛行家爲擴大此項運動的宣傳起見，從紐芬蘭的格累斯（Harbour Grace）港飛到將近他們的目的地——布達佩斯的地點，所乘的是一架單葉飛機『爲匈牙利求公道』號（Justice for Hungary）。

一九二七年夏天，洛忒米爾爵士（Lord Rothermere）所主持的倫敦每日新聞爲匈牙利發起修正國界運動的特殊宣傳。該報通訊員之一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得與墨梭里尼晤談，結果墨氏表示他贊同匈牙利修正國界事實上，墨梭里尼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一九三〇年七月與十月，及一九三一與一九三二年中的演詞中已再三以着重的語氣提到此項問題。在一九三二年，他公然反對法國的霸權，並成爲總括修改條約的主張者。

事實上，意大利和匈牙利在一九二七年就簽訂了友好條約。同年下半年，接着發生從味羅那（Verona）偷運軍火的事件，此項軍火，表面上是運到捷克的一個小鎮，其實是運往匈牙利的。此項貨物標籤上面寫明『機器零件』，引起了聖哥太特（St. Gotthard）邊鎮奧地利海關官吏的注意，於是受到檢查。因爲特喇農條約禁止將軍用品運入匈牙利，所以小協商國就迅速向國聯提出抗議（一九二八年正月）。國聯卽加以調查，但因此案或許將意大利牽涉在內的關係，其真相竟不能披露。結果，匈牙利略獲斥責，此事就此打消，但在各國人民心理上，仍留着很久的反響。

使小協商國和法蘭西更驚異的，就是一九二七年後匈牙利、意大利、德意志和土耳其各國之間所商訂的各種友好條約。柏特楞時常走訪上述各國的京都一事，特別引起小協商國與法國的不安。匈牙利和小協商國之間曾疊次努力企圖合作，但結果僅引起進一層的惡感，尤其因爲關於各關係國有時虐待馬札兒少數民族的謠言。

各處流傳，使惡感更甚。

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內，恢復帝制和修正國界兩種運動頓然衰落。其原因即在匈牙利政府需要法蘭西的財政上的幫助。一九三一年八月，雖然他的統一黨和該黨的同盟各黨能在六月國會選舉中取得下議院的二四五席中的二〇〇席，內閣總理柏特楞辭職了。雖然政府正式公布他的辭職原因為身體不佳，但他所以決心告退，實有其他因素。外面所知道的有以下幾因：(一)一九三〇——一九三一會計年度匈國預算本估計有五〇〇、〇〇〇金元的盈餘，但柏特楞政府所給予國家的反為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虧空；(二)因為受世界一般不景氣的影響和奧地利信託公司崩潰的關係，匈牙利的銀行組織有瓦解的危險；及(三)法國當匈牙利在危機中要求她幫助的時候，她就承諾借款，但以中止修正國界運動為條件。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法國貸與匈牙利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事情在巴黎宣布了，四天之後，柏特楞即行辭職。

新內閣總理為柏特楞的朋友，卡羅爾易伯爵。他雖能設法採行了一種預算案，但為恢復財政和政局不穩諸問題所困擾。國聯因根據匈國的請求施行另一個財政調查，匈牙利由十國銀行團借得了短期借款美金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關於付償外債的部分延期付款期限亦經宣布。當時法西斯黨的騷擾和共產黨的暴動成為常事，而捷克斯拉夫與羅馬尼亞的關稅戰爭更增加了困難。一九三二年九月，卡羅爾易內閣在柄政一年餘之後就辭職了，繼任者為貢布爾斯 (Gombó) 內閣。貢閣的就任對於正統派是一種打擊，因為他曾在一九二一年領導一般人從事防止查理士登位。但他出名為熱心於修正國界運動者和親意派。

當一九三二年將近終了的時候，帝制恢復和國界修正兩問題在匈牙利內政和外交兩方面依然居於第一重要的地位。領土回復主義者的運動遮蔽了國內的民治政治的要求，對於歐洲及世界的和平，依然是一種嚴重的威脅。

第十七章 兩個斯拉夫民族的共和國

捷克斯拉夫

(甲) 獨立之勝利

從滅亡的聯合帝國 (The Dual Monarchy) 裏產生出來的最健全而組織最完善的國家，就是捷克斯拉夫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包括着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奧地利、西里西亞 (Silesia)、斯洛伐基亞 (Slovakia) 和羅色尼亞 (Ruthenia) 五區域，共佔面積五萬四千二百七十方哩。(註) 從最初，捷克斯拉夫已獲得經濟上的穩定和外人的重視，這對於歐洲的一個新與小國是一種破格看待。這種成就，不僅由於捷克人在戰前已達到一種很高的文化水準，且當歸功於兩位大學教授：馬薩里克 (Thomas Garrigue Masaryk) 和彭尼斯 (Eduard Beneš)。

(註) 上述五個區域，前三個以前屬於奧地利，後二個則屬於匈牙利。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西里西亞的斯拉夫族土人向稱捷克人，斯洛伐基亞的斯拉夫族人則稱斯洛伐克人，羅色尼亞的斯拉夫人稱羅色尼亞人，喀爾巴阡山俄羅斯人 (Carpatho-Russians) 或烏克蘭人。

馬薩里克以一八五〇年生於斯洛伐基亞地方的農家。他雖然出身貧苦，卻能設法受到高等教育，後來在布拉格 (Prague) 為哲學教授。在一八七八年，他和一位美國女子夏綠蒂·加立格 (Charlotte Garrigue) 結婚，把

她的姓做了他的中間名字。他賴妻黨的聯絡，在美國認識了許多益友。在大戰之前，他是一個著名的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一個自由主義的哲學家，又是一個愛真理和正義的人。他很早就不得與奧國當局的歡心，因為他主張為斯拉夫民族爭得國家的和社會的權利。當歐戰爆發時，他決意「拚命反抗奧地利，到死方休」。

馬薩里克覺得，倘使他沒有被捕的危險，他就能為捷克人的解放運動格外效力。所以他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就到意大利去，從事宣傳工作並在各主要協約國中造成一種輿論，其間經過約有四年。在俄國，他幫助組織捷克人軍隊；在美國，他籌募款項；在法國，他設立宣傳的大本營；在各處，他總是努力喚起為捷克人求得獨立的情緒。與國內「革命運動」（在本國則稱之為「爭自由的奮鬥」）接觸的方法則有「祕密偵探部」的有效組織，由馬薩里克的學生和朋友彭尼斯所指揮。

彭尼斯以一八八四年生於靠近比爾森（Pilsen）的地方。他曾求學於布拉格、柏林、巴黎和第戎等處，專攻法律和哲學。他是一個多產的著作家，所寫的都是關於社會、經濟、政治的問題，又是布拉格工藝學校的哲學和社會學教授。同時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崇拜民主政治的人，所以極端反對海布斯堡皇朝。彭尼斯一聽到歐戰爆發的消息，就覺得奧匈聯合帝國的將來不出兩途：非因戰敗而亡國，即當為戰後革命所顛覆。因之他決定犧牲一切，來實行革命。雖然起初他仍居國內，以便時常將國內所發生的事情通報在國外的馬薩里克，但後來也覺得有逃出本國的必要了。抵達巴黎後，他的外交才能和機智大有助於取得外國民眾對於他們的義舉的同情，並與留在奧匈的革命領袖互通聲氣。（註）

(註)在名位上僅次於馬薩里克和彭尼斯二氏而爲捷克共和國創造者之一的人，就是斯推芬尼克 (Milan Stefanik) 將軍。他曾在法

國西指揮捷克軍團。

革命黨當前的任務，是非常困難的。黨中人對於博取自由所應取的途徑意見兩歧。有幾個著名領袖——例如克拉馬司 (Kramar) ——主張依賴俄國和汎斯拉夫主義，以爲指導或援助。反之，馬薩里克和彭尼斯則贊成傾向西方，從西方各民治國家中乞求助力和鼓勵。甚至俄國在一九一七年脫離戰爭一事，也沒有完全消除這個爭端。此外，革命黨人又須運用智巧和忍耐心來說服協約國，使它們相信捷克人的領袖並不是奧地利的間諜，同時也須把捷克斯拉夫各省的真實狀況報告他們。

爲使在巴黎的領袖與國內的領袖時通消息起見，他們又須想出許多聰明的詭計和策略。這些用計的故事，說來真是動人聽聞，其中充滿着逮捕，間不容髮的脫逃，祕密的會議，暗電的拍發，護照與證書的偽造，牙齒縫裏或煙斗孔中密藏着的極微文書。至於重要的國家機密，都是由素不疑心的奧地利官吏的捷克僕役所洩露出來的。除了上述一切以外，他們還得籌募款項，羅致幹練的新聞記者，編纂各種宣傳文件、小冊子、宣言、散文等等，營救被拘禁的領袖，並爲設在巴黎的捷克斯拉夫國民會議取得各國的承認，認爲捷克斯拉夫人民的正式發言人。

這許多問題是在他們的剛毅的決心之下，逐一得到解決的。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中，就有成功的第一朕兆了。那時協約國，確把「捷克斯拉夫應劃爲一自治的區域」作爲戰爭的目標之一。於是在一九一八年之秋，當協約國行將戰勝的時候，馬薩里克、彭尼斯和史推芬尼克三人認爲時期成熟，乃於是年十月十八日，發出獨立的宣言。

十日後，布拉格的捷克國民會議，在克拉馬司領導之下，從帝國官吏手中攫得政權。十月二十九日，斯洛伐克國民會議議決與捷克人合併，組織一個統一國家。這個顛覆運動幾乎沒有經過流血。十一月十四日，臨時國會一致宣佈成立共和國。馬薩里克被選為捷克斯拉夫大總統。克拉馬司為首相。彭尼斯任外交總長，史推芬尼克則為陸軍總長，這樣分配再適當也沒有了。後來，克拉馬司和彭尼斯代表這個新共和國，聯袂出席巴黎和會。這樣一來，海布斯堡族的四百年統治就此告終了。（註）

（註）臨時國會僅代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其時幾個少數民族採取超然的態度，暫不參加，日耳曼人希望他們同德國或奧國結合，馬札兒人則深信他們會與匈牙利併合。當捷克軍隊被遣往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佔據德國城市的時候，就大流血了，但馬薩克在耶誕通電中允許對於日耳曼人和捷克人同等看待，於是騷亂就漸漸停止了。

（乙）憲法與改革

捷克斯拉夫的憲法經過制憲委員會近一年的研究，又經臨時國會略加討論後，即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採行了。這個憲法是以美法兩國的憲法為藍本而草定的，其中規定了民主政體和各權分立的政府。憲法的序文上，表明捷克斯拉夫共和國「願意加入國際聯合會，成爲一個開明的、和平的、民主的和前進的會員國」。

衆議院由議員三百人組成，議員年齡至少要滿三十歲，任期六年，都是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女的強迫投票選舉出來的。參議院的議員只有衆議院的人數一半，他們的任期是八年，爲二十六歲以上的國民所選舉。參議員的候選人的最低年齡爲四十五歲。內閣對衆院直接負責。衆院有不顧參院之否決而通過法律之權。參衆兩院每年

應開常會兩次，第一次在三月，第二次則在十月；如遇特別情形，並得隨時召集緊急會議。在兩院休會期間，立法委員會得通過各項臨時法律。關於法律是否合乎憲法的問題，統歸憲法法庭決定之。

大總統由參眾兩院共同選舉，任期為七年。他有不裁可法案之權，並較法國的總統稍為權大。總統候選人的年齡須滿三十五歲。法律上雖准許大總統於第一任滿期後重行當選，但除馬薩里克外，任何人不得連任二次以上。副總統是沒有的。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馬薩里克被選為第一任大總統，到一九二七年，又被舉為第二任。捷克斯拉夫國內的政黨是很多的。一九二九年十月選舉的結果，眾議院裏就有十五個政黨的代表。政黨的排列，第一是根據種族來分的，然後依照他們所代表的經濟利益與宗教利益再來分類。所以該國有捷克斯拉夫和德意志人的黨，各自標名為農民黨，社會民主黨，國家社會黨，和國家民主黨。同樣，又有捷克斯拉夫人和斯洛伐克人的人民天主教黨，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基督教社會黨。共產黨與各種獨立的團體也確立了它們的地位。在這種情形之下，內閣的成立大都依賴於政黨的聯合，實在不足驚異。

這個新興國家所遭遇到的最迫切的內政問題，恐怕要算土地的改革了。在海布斯堡統治之下，各省即有土地集中於少數大地主手裏的趨勢。舉一個例來說，有一個時期，三十三個人保有波希米亞省六分之一的土地，同時三三三、〇〇〇個農人所有的土地，反而不及百分之一。在一九一八年，波希米亞的大地主百分之二，擁有該處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土地，而在摩拉維亞，幾乎三分之一的土地，是歸百分之一弱的地主所管轄，斯洛伐基亞則有一半的土地為一千個人所有。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農田，有四分之一是具有七英畝半弱的面積。全國的

大地主大多數爲德國人或馬札兒人，他們就是以前的統治階級。

一九一九年四月，即採用憲法的前一年，臨時國會開始進行關於土地改革的計劃，這種計劃到今日已漸告完成了。國會又通過了許多法律，規定將所有面積超過三百七十五畝的耕地或超過六百二十五畝的半可耕半不可耕的混合土地，一概收歸公有。凡以前屬於皇帝或海布斯堡皇族中人的土地，也概以充公，不給補償。在其他情形中，所規定的地產補償額多低於該項地產在戰前的真實價值。國家將這樣取得的土地，以最公道的價格和最輕的條件賣給一般小農，和一般並無土地而願取得土地耕種的人。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任何人不得分有三十畝半以上的農地。至於那些不可耕種的荒地，則以之撥與科學機關，合作社，公共團體，地方自治團體和教區。到一九二六年，雖然還有許多土地仍由較大的地主掌管着，但是五十萬以上的國民已經成爲『中產階級的農民』了——他們是直接享有足以維持其適當生活的土地的主人翁了。

大地產的分裂更有一個效果，即促成了政府和羅馬天主教教會的爭執。有許多土地曾經是教會的產業，教會當局自然不贊成政府大規模徵收地產的政策。但，雖則共和國的一半人民都是天主教徒，大部分的斯洛伐克人也虔信該教（捷克人對於宗教信仰反而非常冷淡），一般人民的輿論卻頗有協力擁護政府的趨向。捷克人是異教徒約翰·胡司（John Hus）〔他在一四一五年因君士坦司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的命令而遭焚死〕的鄉人，在十六世紀就變爲新教徒了——到十七世紀，海布斯堡皇朝纔強迫他們轉信天主教。所以宗教的熱誠已非波希米亞人的顯著特性，所以捷克人對於教會的土地要求，也比較很少表示同情。

沒收地產一事，還不是政府與教會衝突的唯一焦點。在帝國時代，斯拉夫各省的高級教會職員多由德意志人和馬札兒人擔任，他們憑藉了教會的勢力為海布斯堡族作俵，這種情形，產生了雙方的隔膜。教會的佈道工作通常是用德文與馬札兒人的文字，他們是不用拉丁文的，學校則被認為保皇黨和教士的便利的宣傳機關。共和國因此努力實行「避免教會氣味」的教育，並且廢止學校內的宗教必修課程。在教士具有特別教育勢力的斯洛伐基亞政府不顧教士的激烈反對，設立了幾百所新的國立學校。

當時，政府堅決主張：（一）羅馬教廷應重劃教區疆界，使之符合國家版圖的邊境；（二）捷克人應充高級的教會職員；（三）在斯拉夫人居多數的教區裏，應以本地語代替德語或匈牙利語。國會裏有若干激烈分子和民族主義者要求政府與教會絕對分離。在一九二〇年一月，發生一種所謂「脫離羅馬」的運動，其一部分工作即創立捷克斯拉夫國立教會，它宣佈脫離教皇而獨立，並取消教士應過獨身生活的規定。但是這個教會幾乎得不到一個斯拉夫人為信徒，捷克人加入的也僅百萬人而已。

到一九二五年，當七月六日那一天（即胡司被焚死的忌辰）被宣佈為全國休假日的時候，政教的衝突達到尖端了。於是教皇把駐在共和國的聖使撤回，共和國也把駐教廷的捷克公使召了回來。這樣的僵局經過了二年有餘的時期方纔打開，已斷絕的外交關係，乃因雙方妥協而得恢復。一九二八年一月，雙方締結了一個暫定條約。其中規定教區邊界當重行劃分，以便與國境相符合，國家仍繼續付與教士俸給，但應有舉薦主教的發言權，祇有捷克人得被任為主教，所有教會職員須宣誓忠於國家，國語應在舉行某種宗教儀式時使用之。一九二九年，教

皇以「大十字聖章」頒與大總統馬薩里克，作為修好的紀念。

(丙) 少數民族問題

捷克斯拉夫有居民一四、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三分之二為捷克人或斯拉伐克人。其餘三分之一包括三、三〇〇、〇〇〇德意志人，七六〇、〇〇〇馬札兒人，四八〇、〇〇〇羅色尼亞人，及若干波蘭人和猶太人。在一九一九年的和平會議，捷克斯拉夫曾被要求簽訂一件少數民族條約，以保護非捷克籍的人民。一九二〇年的憲法又保證一切人民，無種族語言或宗教的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為履行上項諾言起見，政府就為少數民族開辦了幾所特別學校，規定凡遇五分之一居民使用少數民族語言的地方得以該種語言辦理公務，銀行鈔票上則印有三種文字，少數民族在政府裏的發言權亦因採用比額代議制而得到保障。

儘管政府有這些保證和讓步，在對付少數民族的時候，仍舊經歷許多困難。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數百萬德意志人，他們在歐戰前大都屬於上等階級而被捷克人視為壓迫者的，現在成爲一強有力的反對的單位。起初，這般德意志人拒絕參與國會選舉，並百般妨礙國家行政。但到後來，他們纔漸漸覺悟，他們若能積極參與國家政治，就所得利益將更多。馬薩里克對於他們的這種態度，盡力予以鼓勵，在一九二六年，就有兩個德人被任命爲史維拉 (Anton Svehla) 內閣的閣員。至一九二七年，國會中有四分之三的德籍議員，投票選舉馬薩里克爲第二任大總統。自然，德人和捷克人之間總有些不能調和的地方。在一九三〇年，有幾個波希米亞的國家主義者，企圖搗毀放映德國影片的戲院。但是這些趨於極端的人，爲數尙屬有限，並且他們的跋扈行動常爲當局所遏制。(註)

(註)一如所預期的，以前的地方以德文與匈牙利文爲地名者都改爲斯拉夫文的名稱了。例如，布拉格現在改稱普刺哈(Práha)，而斯堡(Prossburg)改稱布累的斯拉瓦(Bratislava)，卡爾斯巴德(Karlsbad)重稱卡羅維·凡果(Karlovy Vary)。

捷克人與喀爾巴阡山俄羅斯人的關係，比了和德人的關係更爲尷尬。巴黎和會將羅色尼亞劃入捷克斯拉夫的版圖，以便使這個新興國在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有天然的界線，並使捷克共和國與羅色尼亞發生直接的接觸，而造成包圍匈牙利的堅環。雖然依據聖澤曼條約的條款，捷克國應以地方自治權給與羅色尼亞人，但因他們鄙野而落伍的緣故，捷克人有若干時期曾靳而不與，據謂深恐該省內受過教育的馬札兒人和猶太人取得統治大權。復次，又因爲天主教教會和馬札兒人支配着羅色尼亞的教育系統，所以捷克政府就急急開辦了幾所國立學校，以羅色尼亞和烏克蘭的方言授課。同時政府宣稱，在羅色尼亞人發展到能任公務的時候之前，重要的政府位置仍由捷克人充任。

改革教育及以捷克官吏替代羅色尼亞公務員的過程非常延長，以致引起羅人的不平。然而在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年，政府通過了改組羅色尼亞全省行政系統並頒賜羅人地方自治權和省議會的法律。這樣一來稍爲和緩了羅人的不滿，但他們仍訴說捷克官員的人數過多，而這般官員的心目中，只以捷克斯拉夫的利益爲前提，很少顧到羅色尼亞的利益。那時，甚至僑居美國的羅色尼亞人，也舉行反捷克運動，他們發表文章，責備捷克人無信義並藐視民族自決的原則。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自相仇視，使民族問題更趨複雜。捷克人的人數超出斯洛伐克人幾一倍，比後者較

爲西方化，在政治上也佔優勢。他們識字的人數比斯洛伐克人爲多，多傾向於政治的自由主義和對於宗教的懷疑，他們對於農業的興趣不及對於工商業的來得濃。（註）而斯洛伐克人卻都是篤信宗教和最保守的農民，這多半由於從前的匈牙利統治者的薰陶。

（註）斯洛伐基亞和羅色尼亞的居民，三分之一是直接依賴耕田爲生的，而西方的居民不到一半是依靠農業的。

不久，齟齬與衝突（有時竟至流血）就發生了。斯洛伐克人譴責捷克人壟斷重要官職，並違反一九一八年的匹茲堡公約（Pittsburgh Pact），馬薩里克因要取得僑美的斯洛伐克人對於捷克——斯洛伐克統一計劃的贊助，曾在此項公約內允許斯洛伐克人有自治的權利。斯洛伐克人民天主教黨特別急於爲該省取得自治權，免除政府對於學校制度的干涉，並確保教士對於農民的操縱勢力。一九二四年，斯洛伐克人開始了抵制運動，對於捷克人的一切加以排斥。但在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九年之間，發生了幾件緩和紛爭的事情：在一九二六年有兩個斯洛伐克人被任命爲閣員；在一九二八年，共和國與羅馬教廷的裂痕業已彌縫；在一九二九年，給與各省地方自治權的法律發生效力了。但接着又有另外一個因素使爭鬪死恢復燃——即匈牙利人的領土回復主義。捷克人責備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馬札兒人醞釀分離運動，此項運動目的在將斯洛伐克與馬札兒王國重行合併。雙方的爭執在一九二八年的十二月裏達到了危機，那時有一個斯洛伐克議員，屠卡（Tuka）教授，被指爲領土回復主義者，後以充當間諜和叛國的罪名被判處十五年監禁。當此案審訊之際，及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的時期中，斯洛伐基亞地方感到極度的不安。後來最高法院維持了原判，一時的騷動亦趨平靜。但不久謠傳屠

卡在獄中備受虐待，於是又起糾紛。雖然目前捷克共和國似不致即趨分裂，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齟齬對於國家的統一，終究是一種潛伏的危險。

捷克斯拉夫雖有國內的種種困難和糾紛，但自一九一八年以來，它在文化上確有顯著的進步。捷克人早就相信教育的價值，他們又以遠在一三四八年成立的普利哈大學而自豪。著名的教育家柯門斯基 (Komenský) [即夸美紐斯 (Comenius)] 一五九二——一六七〇年]與宗教改革家胡司是捷克人所崇拜的國家英雄，他們很歡喜稱本國為「柯門斯基的故土」。捷克的學者，受了巴拉溝 (Palacký) 的巨著波希米亞民族史 (History of the Bohemian People) (共有五卷) 的鼓勵，現在正忙於從事考古工作，探求未經德人裝飾的本土古代文化的遺跡。雖然捷克人誇耀他們的音樂家史美搭那 (Smetana) 和特服拉克 (Dvořák)，但他們尚未產生傑出的文學家，有之，也許就是那位創作機器人劇本 (Rosson's Universal Robots 1921) 的卡拍克 (Capek)。捷克人對於競技和運動，也和今日的歐美各國人士一樣非常注重了。一九三二年，捷克斯拉夫的競技會和運動會的會員，不下五十多萬人。大規模的露天健身運動和唱歌表演非常盛行。

(丁) 經濟與外交

從經濟的觀點看來，捷克斯拉夫是歐洲最幸運的國家之一，因為它的疆土從未受到戰爭的蹂躪。它承繼了聯合帝國的重要鐵路線及其百分之八十的工業。它雖然只有奧匈的舊壤五分之一，人口四分之一，但擁有前帝國五分之四的工廠（包括著名的波希米亞玻璃與瓷器廠及紡織業），五分之三的啤酒釀造所，十分之九的有

煙煤和五分之三的鐵礦苗。在農業方面，也有同等的良好情形，實際上捷克斯拉夫在糧食上是自足自給的國家。在舊時代，波希米亞出產帝國的百分之九十的甜菜，百分之八十的忽布(Hop)，百分之七十五的水果。全國的土地有百分之四十二是可以耕種的，斯洛伐基亞則出產巨量的亞麻、玉蜀黍、酒類和煙草。各種礦產如錳、銅、鉛和銀亦甚豐富。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這十年中，捷克斯拉夫的對外貿易常能保持出超。它的主要的經濟障礙，就是它所處的被包圍的地位。即使有這種缺點，也因和平條約中允許它在德、意兩國的海口如特里斯德(Trieste)、斯德丁(Stettin)和漢堡(Hamburg)三處出海而得減輕。國內又有八百哩可通航的河道，並在監督易北河(Elbe)與奧得河(Oder)運輸事宜的國際委員會派有代表。

因為本國具有前帝國的各種工業上的設備（這原是用來供給帝國時代龐大人口之需要的），現在的人口決不能完全吸收各廠的出產品，以供自己的消耗。因此，捷克斯拉夫的經濟繁榮，不得不依賴對外貿易及與他國的商業關係。它的最好的主顧首推德國，次為奧國，再次為英國和匈牙利，同時它所購的貨物大半來自德意志、匈牙利和波蘭三國。它與這幾個和其他許多國家，早已締結了通商與貿易的條約，並確立了友好的商業關係。如無此種關係，它縱能自給，總不免蒙受經濟上的重大損失。（註）

（註）捷克共和國的幣制單位是克郎，克郎的價格經穩定為美金二·九六分。在一九三〇年一月的海牙會議，捷克的賠款要求額和外債額業經確定。

商業一層並不是捷克斯拉夫希望維持和陸的外交關係的唯一動機。捷克共和國的面積，長度計有六百餘

哩，闊度則從五十哩到一百二十五哩不等。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她的入海之道是靠和約上的規定。它四周圍有五個國家環繞着，其中大多數曾與之有過仇隙。這五個國家就是德國、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奧地利。她的一半國界，是被德國南境和奧國北境所造成的鉗子形夾着的。所以它切望阻止德奧合併的成功。再者，除了喀爾巴阡山與埃爾斯奇堡奇（Erschburg）兩區域外，捷克斯拉夫的國界很少天然的屏障。

馬薩里克和彭尼斯（後者自一九一八年來即任外交總長，從未間斷）私人人都贊成國際和平與友好的政策，他們所以如此決定，『第一由於（共和國）在歐洲所處的經濟、政治和地理上的地位』。一直到現在，還是進行着這種政策，其犖犖大者，約有五端：（一）竭誠擁護國際聯合會，認它為弱小國家的保護者及歐陸的和平與安全所依賴的長城；（註）（二）與俄國保持友好關係，不問其政體如何，因為彼此有斯拉夫主義信仰的維繫和通商的希望；（三）始終不變地擁護產生共和國的和約；（四）贊助英法兩國對於歐洲較大事件的政策，尤其是法國的；及（五）對於中歐事件（特別是涉及最不滿現狀的匈牙利）與巨哥斯拉夫和羅馬尼亞採取一致的行動。我們當記得，捷克斯拉夫在進行第五項政策之中，曾與巨哥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共同組織（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小協商國聯盟。

（註）彭尼斯為一九二四年日內瓦草約（Geneva Protocol）的部分起草者並為一九二五年洛迦諾會議席上最熱心的代表之一。

自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小協商國與奧地利之間的邦交是和好的。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奧捷兩國簽訂了一個商業協定，一九二六年三月，又商訂了友好條約，其中規定：（一）兩國中任何一國遇第三國侵犯時，各應保

守中立；(二)兩國承諾鎮壓本國境內所有不利於對方之任何運動；(三)兩國誓相合作，以防止舊帝制的復辟企圖；及(四)兩國同意以將來彼此之間所發生的爭執交付仲裁。在一九二八年的夏季，巨哥斯拉夫的外交總長建議邀請奧國加入小協商聯盟，但是因為維也納不願加入凡以另一中歐國家——匈牙利為敵視之目標的同盟，所以此項邀請被拒絕了。一九二三年以後，當小協商國盡力為匈牙利借得國聯債款時，各小協商國與後者的關係方得暫時改善。

在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的一个時期中，小協商國的團結，似乎有鬆弛之勢。果然，在將成形的歐洲外交新陣線中有兩個締盟國漸漸傾向法國，第三個則趨向意大利。然而，一九二六年後，德奧兩國內合併運動的復活，一九二七年意、匈的友好條約之締結（此事發生之後，意國即有軍火運往匈國，而馬札兒人的領土回復運動重又興起）及一九三〇年後巴爾幹各國為改進各該國經濟地位而有組織巴爾幹或多瑙河聯盟的鄭重考慮——這一切給與小協商國的關係一種新生命。

假如小協商聯盟的復活單單是在它們認為必須阻撓奧國或匈國的行動之時發生，那就未免可憐。雖然，這種區域的『諒解』的觀念，後來也許足為組織更密切結合的經濟集團之基礎，此種集團或能享受舊奧——匈帝國各部分因聯合為整個經濟單位而得到的那種經濟利益。

波蘭爲十世紀末年波爾斯拉夫 (Polish) 大帝所創立的一個王國，它在中古時代有過光榮的歷史。然而黃金時期過後，它的勢力和國威就漸趨衰落了。內部的猜忌與紛擾常使一般波蘭人民反去懇求歐洲的貴族來做他們的國王。因爲國王一向是選舉出來的，所以君主一死，就有一場內戰。議會裏的貴族議員有一種特權叫做「自由否認權」(liberum veto) 它可使議會不能通過任何法律，除非全場一致同意。再者，波蘭沒有天然的，易於防禦的邊境。到了十八世紀，國內情形愈爲惡劣，遂招致了外國的瓜分。

當波蘭的各鄰邦——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同時在雄主「普有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與有馬利亞·德利撒 (Maria Theresa) 女皇、俄有喀德林 (Catherine) 女皇」的統治之下的時候，它的歷史就達到了危機。這三國開始瓜分波蘭，自一七七二至一七九五年，前後共有三次。從此，波蘭在歐洲地圖上，沒有它的名字了。當拿破崙時代，波蘭的一部分會一度被恢復爲華沙大公國，但維也納會議重又將這個區域分割了。

在整個十九世紀中，波蘭的民族精神繼續在外國的壓迫之下生長，一般波蘭英雄又爲西歐各國（尤其是法國）的革命發揮着他們的才能。在二十世紀，許多愛國的波蘭人終究認清了歐戰是久已盼望的建立波蘭國家的絕好機會。他們覺得，這個產生人豪如大音樂家肖邦 (Chopin) 和大文學家顯克微支 (Sienkiewicz) 的民族必定能够獨立起來。他們要感謝協約國的友誼，及畢爾蘇資基 (Pilsudski) 和帕得勒夫斯基 (Paderewski) 的努力，波蘭居然復興了。

(乙) 畢爾蘇資基

畢爾蘇資基以一八六七年生於俄屬波蘭，爲昔時立陶宛貴族世家子，是在反抗俄皇專制的空氣中長大的。他於遊學數大學並爲參加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的活動而被各該大學開除之後，卒在一八八七年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他在那裏一直住到一八九二年。他回來以後，仍繼續從事於革命運動，幫助創立波蘭社會黨，該黨的基本信條爲波蘭的自由，而非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八九六年，他又被當局逮捕，監禁在聖彼得堡的『聖保羅與聖彼得牢獄』(The Prison of St. Peter and St. Paul)裏，有五年之久。在這個時期中，他的朋友雖仍時時設法與他通音訊，他被當局所嚴重監視。後來有一個醫生藉着替他檢驗身體的機會，幫助他逃脫了。

他逃走的消息傳出後，該城的祕密警察全體出發搜索他，但是沒有把他捉到。據說，他躲避的方法很妙，當全城大索犯人的時候，他正在一家著名的酒館裏用餐，穿得衣冠整齊，接着就『像紳士一般很大方地離城遠去了』。他逃到奧屬波蘭，住在克拉可 (Cracow) 城，一直到日俄戰爭爆發的時候。在兩國交鋒的當兒，他重返俄國，參加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但到一九〇七年又回到克拉可。他在那裏着手組織並訓練一枝祕密的波蘭軍隊。歐戰爆發時，他就率領了這枝軍隊，向壓迫波蘭民族最甚的俄人進攻。

畢爾蘇資基和他的黨徒所抱的目的，是在利用奧地利爲『對抗俄國之刀和抵禦德國之盾』。他們希望利用奧國對波蘭比較寬大的政策，以組織波蘭軍隊，作爲謀波蘭獨立的工具。然而波蘭人民不盡抱此見解。其時有一派以德模斯基 (Dimowski) 爲首領的，深信波蘭的統一要靠中歐同盟國的戰敗，所以他們寧願站在俄國方面。

作戰。還有第三派的愛國者，則以為要取得波蘭的獨立，不必憑藉奧、俄任何一方的幫助。此種見解在僑居國外的波蘭人（尤其是僑美的）中最受歡迎。這一派的最傑出的代表就是鋼琴家帕得勒夫斯岐氏。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六日，「波蘭最高國民委員會」成立於克拉可，它的任務在調整波蘭軍隊的活動並監督管理其財務和政務。此等軍隊是依照畢爾蘇資基的模範隊伍組織的。那般希望俄國援助波蘭統一計劃的人民，也在華沙（Warsaw）組織了一個「波蘭國民委員會」。奧地利當局給與克拉可委員會有限的承認，並組織兩大波蘭軍團，由波蘭種族的奧國軍官統率之。畢爾蘇資基的軍隊被編為第一軍團的第一聯隊。一九一六年畢氏被任為旅長。

其時中歐同盟國和俄國互相競爭着發表關於波蘭將來地位的高調而空泛的文告。其結果祇足以使波蘭人相信，他們不能希望從任何一方得到滿足，而自救之道只有在於獨立行動。畢爾蘇資基受了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威爾遜總統演說詞（其中力言「各處的政治家都贊成產生一個統一的、獨立的和自治的波蘭國」），及是年俄國完全撤退駐波軍隊一事的鼓勵，乃向他的黨徒說道：「現在俄國已被打敗，其次我們就要去打德國了。」柏林對於此言的答復，就是逮捕畢爾蘇資基（一九一七年七月），遣散波蘭軍隊，和解散最高國民委員會。歐戰告終時，波蘭全境就驟然產生了許多地方政府。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新被德國的社會主義者釋放的畢爾蘇資基，就回抵華沙。他馬上重組波蘭軍隊的軍符，十二月十四日，即成爲執政元首。兩天後，畢氏乃將新興的、獨立的波蘭共和國之成立宣告世界。其時在德模斯基領導之下的華沙波蘭國民委員會，已於一九一七年八

月十五日在巴黎設立了大本營。這樣一來，自稱代表波蘭國家的團體竟有兩個。

各協約國在戰爭的狂熱中誤以畢爾蘇資基的「社會主義」與俄國的布爾希維主義混爲一談，至此乃承認在巴黎的波蘭國民委員會，波蘭一般保守的中產階級和農民團體（他們在戰前曾加入一個所謂「國家民主黨」的黨）亦然。反之，擁護畢爾蘇資基的政府的人，都是一般勞動羣衆，急進的農人及風起雲湧的退伍軍人的軍隊。這種奪取政權的競爭，連同鄰國的敵視，地方的分離運動，人民的饑饉以及四年戰事所引起的一般紊亂，似乎在預示這個新國家的不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保持波蘭新近得到的獨立，顯然必需雙方的妥協。

後來，主要的政見的衝突終由帕得勒夫斯岐加以彌縫了，他不但爲本國人民所敬重，且博得西方各國的領袖和人民的信任。歐戰告終時，帕氏尙逗留於美國，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就到了巴黎，十日後，開始漫遊波蘭。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帕氏被任爲國務總理，兼攝外交總長職，其時畢爾蘇資基仍爲執政元首。因爲內閣閣員包納國內各重要區域與重要政治團體的領袖，所以和解是成功了。於是畢爾蘇資基統率了五十萬人的軍隊出發，開始以武力確立波蘭的廣大疆界，帕得勒夫斯岐則赴巴黎列席和會，折衝樽俎之間，爲本國力爭權利。

一般波蘭領袖充滿了擴張領土的野心和取得天然國界的志願，乃力求與再生的國家立陶宛、烏克蘭、和新奧的捷克斯拉夫之一部分——加里西亞合併，此外又欲根據人種、語言、歷史、或感情上的理由，獲得德俄的土地，多多益善。事實上波蘭確與立陶宛、烏克蘭和俄國發生過戰爭，以戰爭恐嚇過捷克斯拉夫，不理協約國最高會議的忠告；結果，它所得到的疆土是一五〇、〇〇〇方哩，而非它的代表所要求的二八二、〇〇〇方哩。再者，波蘭

因有這種侵略的行動，招致了所有六個鄰國的仇恨。

(丙) 國內的政務 (一九一九—一九三二年)

我們有戰爭、有債務、有國旗，倘使這都不能成爲獨立的國家，在世界上還成什麼呢？

上引一句是美國羅厄爾 (Lowell) 對於一八四〇年的得克薩斯 (Texas) 州的地位所說的感想，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的波蘭也呈現着同樣的景象。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帕得勒夫斯岐辭去總理之職，大半因爲他在巴黎和會中的成就頗爲國人所不滿所致。然而畢爾蘇資基——那時他已成爲波蘭的大元帥——仍保持着執政元首的地位，直到採取憲法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和選舉總統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之時爲止。波蘭的憲法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由全國男女所普選的國民議會起草的。雖然國民議會的工作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卽告完竣，它卻把國會的選舉展緩了，同時將支配政府的權力保留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波蘭憲法的大部分是仿照法國憲法的，其中規定設立一個參議院和一個衆議院 (Sejm)，人民具有普選權，衆議員選舉者的年齡定爲二十一歲，參議員選舉者的年齡則爲三十歲，同時採用比額的代表制。大總統由參衆兩院合併爲國會選舉之，任期七年。大總統的每項行爲須經內閣閣員一人副署。大總統如經參議院同意，得於衆議院五年任期屆滿前隨時解散之。因爲波蘭的政黨非常之多，所以政府不久卽藉政黨聯盟的制度而處理政務。在共和國成立後的十二年，中它換了二十二個內閣。

根據前項憲法所選出的第一屆國會，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召集，選舉出那魯托易士 (Narutowicz) 爲第一

任大總統。那氏於十二月十六日就職，但於十八日即被暗殺而殞命。兩日後，吳洗柯維斯基（Wojciechowski）被舉繼任。這兩次的總統選舉，畢爾蘇資基就放棄了執政元首的地位，而任參謀總長。

在此後幾年中，波蘭的政局令人回想到昔時王國的衰微時代。國會裏的保守派和急進派鬧成僵局，土地的改革難以進行，財政情形每況愈下，官吏的腐敗幾成風氣。使事情更糟者，總統和參謀總長以前雖為密友，現在卻生隔閡了。事實上，畢爾蘇資基已暫時退休，雖然他仍與軍隊和衆議院裏的左派議員仍有密切的接觸。

這位大元帥漸漸因國會議員的因循策略，立法機關之缺乏具體的成績，及衆院議員於討論時的爭吵不休而怒不可遏了。一九二六年五月，當畢氏的最大仇敵維托士（Vitosz）為總理時，他就公然指斥政府的無能和腐敗，忽視軍隊，和不予社會黨以正式的承認。那時有人諷示，政府將提起司法手續來對付這個「誹謗者」，於是畢爾蘇資基不能復耐，招集了三團軍隊，向華沙前進，這令人回憶到墨梭里尼之向羅馬前進。

經過三天的戰爭（五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死亡的有六百人，受傷的更多，接着畢爾蘇資基即行進京，同時大總統和國務總理都辭職而逃了（五月十四日）。最使他手下所驚奇的，就是畢氏拒絕建立形式的獨裁制，又不接受大總統的職位。他反而慫恿國會選舉他的摯友莫斯科基（Mosicki）教授為總統。他自己卻以在巴德（Bartel）的新內閣中任陸軍總長為滿足。

在此後數月中，畢爾蘇資基與衆議院之間，發生了劇烈的衝突。雖然大多數的議員漸漸討厭畢氏的強硬政策，但畢氏以有軍隊的擁戴和輿論的袒護，頗能強迫立法機關通過幾條憲法的修正案。這些修正案給與總統支

配國家預算的更大權力，准許他以內閣之同意解散國會兩院，並授權總統在選舉新國會前九日之間，對於經濟與會計事項得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內閣的權力亦有擴大，包括幾種立法的職權在內。當衆議院企圖重新申明它本身的權限，實際上並打消內閣的兩次動議的時候，畢氏即要求（一九二六年十月）總統任命他自己爲國務總理。

從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八年六月，畢爾蘇資基保留着總理之職，其間僅因患病略有間斷。他能藉國會統治一切，因爲立法機關不敢反對他。然而一般人對於這種掩蔽着的獨裁制益增敵視，畢氏乃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以病體難勝繁劇及厭惡衆議院的腐敗和無效能爲理由而辭職。巴德再度上臺爲總理，畢氏則仍長陸軍部。然而誰也不懷疑，這位陸軍部長就是實際的政府首領。

國會所遭遇的困難，並不隨內閣的改組而消滅。反之，畢氏的社會黨，現在也與反對黨聯合起來了。未幾，畢氏對新聞記者發表猛烈攻擊衆議院中一般政客的談話，他說他們是卑卑不足道的陰謀家，「故意制定那種憲法，致將未開化的簡單頭腦所能想出的最大恥辱加之於國內最有名望的人身上」。他並且謾罵那些議員，「叫囂如豬獾，行動若無賴」。他又說明他雖然已辭去總理之職，他仍可以「在危急之秋，干與國事」。他要大家曉得，支配波蘭的國際事務的權力，依然在他的手掌之中。

所以，畢爾蘇資基以陸軍部長的資格繼續獨斷波蘭的政策，並力主修改憲法，以便大大地增加國家行政首領的權力。新憲法草案卒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公佈了，大部分是畢氏的兄弟起草的。新憲法規定總統由

人民普選，而不由國會選舉，總統候選人有兩個，一個是由滿任的衆議院所推舉，另一個則由任滿的總統所遴選。元首應有締結條約的專權，否立法機關的任何法案的全權，召集或解散國會之權，及不必取得衆議院之同意，而任命或罷免內閣閣員之權。一九三一年三月，該項憲法就在下院經初讀通過，其最後的採用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一九三二年三月，國會被迫通過一項法案，授權總統在三年之期中得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之期中，畢爾蘇資基在各方面表示對於國會的輕視，一九二九年一月，他拒絕列席於討論國家預算的正式會議，又不願辯護其軍費要求，但當國會宣布預算案時，他就很嚴酷地加以批評。兩個月後，當財政部長捷可維茲（Zachowicz）因未經認可擅自動用超過預算案中規定額的經費八八〇、〇〇〇元而被彈劾時，畢爾蘇資基即自認此項行爲的責任，並向衆議院挑戰。這件案子終究擱置了，但捷可維茲和巴德總理也辭職了。十月，衆議院應接室內有五十個武裝軍官向畢氏致敬，不聽議長要他們離去的吩咐。國會的召集往往因總統的命令而延期，而對於反對的聲浪，都以各種橫暴的行動使之沈寂。畢氏又大聲疾呼道：「最使波蘭陷於危境的人就是那般議員！」正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的選舉舉行前，政府依照了所謂「肅清」政界的計劃逮捕了九十個議員。

在這五年中，換了六個內閣，都在畢氏的操縱之下處理共和國的政務。這幾個政府，因為構成份子多爲軍人，就有『將校內閣』（Cabinets of Colonels）之通稱。畢氏的統治國家，平常總須與國會裏的多數敵黨相周旋，但當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與二十三日的選舉的結果，他的黨徒〔他們組成一個『非黨同盟』（Non-Party

Union) 在衆議院的四百四十四席中獲得二百四十七席，並在參議院的一百一十一席中獲得七十四席時，他纔放心了。他們的勝利似乎不全是由於獨裁制之得人心，而當歸功於親畢派的選舉官吏的幹練與手腕。一九三一年五月，畢氏的摯友潑萊司托 (Prystors) 上校被任爲國務總理。

一九三二年過完了，陸軍部長畢爾蘇資基仍在獨攬大權。他有軍隊，總統和內閣爲後盾。國會中的多數議員都贊同他增強行政首領在憲法上的權力的企圖。主要的反對黨領袖，連三任總理的維托士在內，都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以謀叛罪受審判後關在牢裏了。然而他的健康漸漸衰弱了，使他不得不常常到氣候比波蘭較溫和的埃及或他國去作長期的休養了。

(丁) 財政與經濟的改革

波蘭也和它的許多鄰國一樣，在戰後數年中很受到財政膨脹與經濟不穩定的痛苦。戰爭的蹂躪，對俄兵端的綿延，五穀的歉收，農村狀況的不安定，及少數民族問題的糾紛，構成對於共和國之生存的嚴重脅威。這種危機卒激使衆議院採取斷然的行動。在一九二三年，就成立了一個專家的混合內閣，以總理兼財長革拉白斯基 (Grabalski) 爲首領。這個政府受有穩定國家金融的非常權力，它從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柄政，一直維持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革拉白斯基努力進行制止波蘭馬克的繼續跌價。他採用節約政策於政府各部，削減國有鐵路的補助金，提高稅率，加徵幾種稅項。政府拒付大部分國債，解散新近組織的「波蘭國家借款銀行」，另行創辦一個新波蘭銀

行。貨幣單位則改用金「士洛第」(Zloty)，其價值與金佛郎相等。紙幣的發行亦經宣佈暫時停止了。

可惜這些改革都沒有成效，這使財長大失所望。它們都過於猛烈，並加重人民的負擔。一九一四年的收穫非常不佳，以致大宗糧食反須仰給於進口，生活費也因而飛漲了。約在同時，因有少數民族問題的爭執，德國也停止購買波屬西利西亞的煤了。自與德國商訂商業條約失敗後，兩國的關稅戰爭遂於一九二五年六月開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與十二月，波蘭曾為對英美所欠債務準備付息基金，一九二五年二月又向美募得債款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但這兩件事只能算是暫時的救濟。一九二五年七月，「士洛第」的價格開始下跌，四個月後，總理革拉白斯基就辭職了。他的兩位繼任者，史克尋斯基 (Skizynski) 和 維托士 (V. Witos) 都不能恢復金融的穩定。

當「士洛第」跌到祇值原價一半的時候，史克尋斯基政府就聘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教授甘末勒 (Kemmerer) 氏前來研究波蘭的財政情形，並請其建議改進的方案。此項聘請曾於畢爾蘇賓 基獨裁時期內得到認可。甘末勒委員會經過兩星期的研究，就貢獻了若干綜合的意見，其中有許多經波蘭政府於一九二六年採用了。(註)

(註) 甘末勒委員會指出波蘭的預算經費有百分之三六·五是軍費，而國家警察與邊境防衛軍的經費尚不在內。

較穩健的貨幣原則之引用，一九二六年的收穫的豐富，及外國對於波蘭煤的需求之增加（因是年英國發生煤礦罷工），在使波蘭有走進繁榮時期的好望。一九二七年十月，波蘭借得七二、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作穩

定金融用的外債，同時又敦請美國財政部次長查理斯·杜威（Charles Dewey）為財政顧問和波蘭國家銀行的理事。國家的預算自有共和國歷史以來，到現在纔得第一次的平衡。「士洛第」的金價格則經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日的法令確定為一·二二分。

在此後五年中，畢爾蘇資基獨裁的政府頗能維持「士洛第」的穩定價格，並使國家的常年預算收支相抵。當杜威於一九三〇年十月辭職回國時，波蘭的財政似乎已走上平衡的路了。一九三〇年後的世界經濟恐慌自然也影響到波蘭，特別是在它的糧價跌到二十世紀的低點紀錄之時。然而因為政府在支出上力求樽節，一九三二年的預算尚能保持平衡，沒有藉助於通貨膨脹。這一年中波蘭每人的財富約及法國每人的財富三分之一。

差不多和財政問題一樣急迫的就是農村境況的問題。一般社會主義者和過激的農民，受了俄國榜樣的影響，無疑地贊成將波蘭全國的大地產分裂並重行分配土地。前俄屬波蘭和加里西亞的農民特別要求多得土地，以維持一家的生活。復次，美、德兩國的限制移民律，又增加了人數日增的波蘭無產民衆的痛苦。

保守的地主與過激的農民之利益衝突，及國會中左右兩派的勢均力敵，竟使補救方案的採用遲延了六年之久。一九一九年的土地改革法案（翌年即獲通過）從未施行，一九二三年雖又有一件土地法案提出，但內閣卻因此傾覆。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國會卒通過了一件法案，規定逐漸分割大地產，每年以二〇〇、〇〇〇公頃（四九四、二〇〇英畝）為度，限期十年。其中又規定，國家之徵收土地只能在自動的分配不能達到最低標準時作為最後採取的辦法。地價的付償，一半以現金，另一半以公債票。雖然兩極端派（左右派）都不滿意於此項

法律（對於此法所提出的修正案有六百條以上），但它已證明為將來的法律所可據以制定的折衷方案。

財政和土地的問題既然多少得到解決，波蘭的經濟也就有了確定的發展。新的鐵路固有加築，舊的鐵路亦經改良，實際上國內所有可耕種的土地都在墾植，新造的房屋添了幾萬幢，整個的生產也增加得很快。然而市場之不足，顯然為共和國的主要障礙。戰後關稅的增高，和一九三〇年的不景氣，使這種困難越發加重。到一九三二年，失業也成為波蘭的嚴重問題，雖然它祇有五分之一弱的人口直接依賴工業為生。政府對於過激的勞工運動取締甚嚴，因為波蘭與俄為貼鄰，此種運動之發展似有雙重的危險性。

（戊）少數民族

因為一九一九年中屬於波蘭國籍的人民，還不到它的全人口四分之一，所以在巴黎的協約國最高會議要求該國政府簽訂了一個關於少數民族的條約，擔保該國境內一切民族（不論其是否屬於多數）有平等的公權與政權。（註）居住波境的少數民族，應有自由入籍或離境之權，政府無論如何不得褫奪其生命或財產，並不得干涉其信奉宗教的自由。對於在任何區域組成人口之「一大部分」的少數民族，須保證其有創辦學校並享受國家的教育補助金之權。少數民族的語言得在商界、法院、公共場所、和宗教儀式中使用，不應加以限制。凡遇上列各種特權被侵害時，可向國聯行政院控訴。波蘭雖接受這些義務，但有一個時期，它對於少數民族所施的壓迫，似不亞於以前俄、德、奧三國之對待他們那樣。

（註）波蘭的人口在一九一九年為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在一九三二年則約有三一、〇〇〇、〇〇〇。

波蘭國境內最大的少數民族團體，就是東部加里西亞的羅色尼亞人和烏克蘭人，他們的人口占全人口七分之一。其次要算猶太人，波蘭各地都有他們的蹤跡，占全人口二十分之一。再次的少數民族為德國人，他們占全人口二十五分之一。在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四年之間，這些少數民族所處的地位非常危險。波蘭的民族主義者中又發生很大的反對少數民族條約運動，但是不大順利。他們宣稱此項條約既未經美國批准，實際上不生效力。雖然一九二二年九月波蘭政府通過了一件法律，給與東部加里西亞（Galicia）若干地方自治權，但是羅色尼亞人民仍對波蘭的統治政策深懷不平。「一貫的行政方針的缺乏，移殖波蘭兵士於徵收的土地之企圖，及新出茅廬的，毫無經驗的，和能力薄弱的行政人員之充斥於該區域」，這一切在在足以證明波蘭國家要把東部各省實行波蘭化的野心。一九二四年的情形更為惡劣，以致俄國政府向華沙提出了強硬的抗議，並引起世界對於此事的注意。俄國自稱有關心這般人民所受待遇之權，因為蘇聯境內有很多烏克蘭人。

雖然波蘭以傲慢輕蔑的態度答復蘇聯的牒文，總理革拉白斯基卻於一九二四年七月設法通過了三種法律，都是關於使用少數民族的語言於行政官署、法院和學校的。波蘭語被確認為國語，但遇辦理公務與司法事件之必要時，准許並用烏克蘭語，立陶宛語和白俄語。各私立學校得以任何一種語言授課，凡遇非波蘭籍之少數民族至少占人口百分之二十五的區域內有四十個兒童的父母們請求時，該區域內之公立學校亦應以該少數民族的語言授課。然而教授地理和歷史時，無論如何應強迫使用波蘭語。

政治上的反對有一個時期延緩了這種法律之適用。但即在施行的時候，幾個民族團體間的關係，依然不能

和諧。羅色尼亞人以待遇不公，常發怨語，其中有些人且組織了一個「烏克蘭軍人會」，從事運動東部波蘭與俄國合併。波蘭政府譴責該團體怠工，乃取戡亂的斷然處置。一九三〇年，少數民族哀呼的聲浪為國聯行政院所聞，它就將此事交付一個「三人委員會」討論。

當三人委員會將各當事人所呈送的相反報告加以研究時，波蘭的局勢愈增惡劣了。烏克蘭的農民漸漸集合起來，從事於如不納租稅之類的反政府運動。政府認為有鎮壓之必要，乃遣派軍隊前往拘捕運動的領袖，一面迫令服從法律。一九三二年九月，當局解散了那個號稱有四十萬黨員的「烏克蘭急進黨」，其理由則謂該黨參加共產的和反波蘭的活動。這種繼續不寧的狀態，使三人委員會在造送報告書於國聯行政院之中，不得不屢次請求延長時間。

比羅色尼亞人的難題麻煩略少的問題，為波蘭國內猶太人的問題。猶太人在歐戰後的幾年中，也受到嚴酷的壓迫。政府責備他們為親德派或親俄派，毫無波蘭人的愛國心，拒絕遵從波蘭國的生活標準，重視經商的贏利。在重視國家幸福之上。他們常為遭人襲擊和暗殺的犧牲者，甚至不能享受一九二四年的語言法律的利益。那時關於猶太人受虐待的謠言盛傳國外，以致英、美兩國派了兩個調查團，到波蘭去從事調查。最後，在一九二五年六月，波蘭當局和猶太人訂立了和解的協定，即所謂華沙宣言（*Declaration of Warsaw*）。

依照該項協定的條款，猶太人經由他們的政治代表允諾承認他們對於波蘭國家應盡的義務與責任，並將他們的反對策略限於國會與憲法的常徑。政府為報答猶太人起見，允許對於猶太人的教育和經濟利益多加注

意。又制定幾種法律，給與猶太人語言及宗教的權利，和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准許猶太人所設店鋪於星期日照常營業，以代替星期六；並減輕對於猶太人的小本經營所課的特稅，因為此種特稅影響於猶太店主者甚大。波蘭政府又答應不在星期六舉行選舉，俾信奉正教的猶太人不致被剝奪選舉的權利。在此後數年中，尤其是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裏，又有反塞姆族的運動發生，但是這些法律實質上改善了關於猶太人的一般情形。

少數德國民族的問題涉及兩項的爭論。第一個是小部分佃農的問題，他們受了德國政府的援助，曾移殖於前普魯士所屬波蘭。大戰後，波蘭人打算將這般外來的殖民驅逐出境，且不補償他們的土地損失——他們的土地是根據從德政府所得的特殊契約而保有的。但是德政府就替它的國民將此事件控訴於國聯行政院，要求賠償。波蘭政府否認國聯行政院有干涉此事的權力，於是爭論又被提出於世界法庭。世界法庭判決國聯有過問之權，並向波蘭致忠告的意見，大意謂波蘭應尊重德籍人民的私有權利。結果，華沙政府卒允許賠償被逐的德民的損失。

第二個困難是關於上西利西亞 (Upper Silesia) 工業區內德籍人民的地位的問題。該處的少數德國民族高聲抗議波人的虐待和不公平的歧視，尤以關於教育的機會方面。他們組織了一個團體，運動改善他們的狀況，一方面又請求德政府予以同情。據說，波蘭人曾加各種壓迫手段於少數德國人民（自檢查新聞至威脅行動），特別是在選舉的時候。又說，波政府對於非波蘭籍的居民，未予相當的保護。柏林政府屢次促催國聯對這種糾紛加以注意。一九三一年，德波兩國的代表又在國聯行政院會議席上對西利西亞的問題作激烈的辯論。整個的爭

論其實涉及修改德國東部疆界的較廣問題，這個問題存在一日，對於東歐的和平是一種威脅。

(己) 但澤與波蘭迴廊

我們當記得，巴黎和會曾規定把德國的但澤，變為一個自由城，由波蘭掌管經濟權，一般政務則由國際聯合會監督。雖然那時全城的居民幾乎盡是德國人，但和會認為這種辦法最足以解決給與波蘭出海之道的問題，並足以使波蘭與西歐各國發生商業上的關係。國聯抱定了這種宗旨，就要求但澤的人民草定憲法，並與波蘭訂立一件關於他們與該共和國的將來關係的協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九日，遂有波蘭——但澤協定（Polish-Danzig Agreement）的簽訂，六日後，但澤自由城即正式成立了。但澤憲法於一九二二年五月得到國聯行政院的最後批准。

根據前項憲法協定，與一九二一年附加的條約中的規定，但澤自由城由一個衆議院和一個參議院統治，其行政權則由國聯委任的「高等委員」執掌之。該委員又為受理波蘭與但澤間爭議的初審法院性質的官吏，但爭議兩方，皆有向國聯行政院上訴之權。波蘭負自由城的外交事務的責任，並有監督其海關之權。但澤海港如事先未得國聯的允許，不得用為海陸軍的根據地。波蘭與但澤兩地之間可以完全自由通商。海港局由五個波蘭人民，五個但澤人民組織之，並以一個中立國人民為主席，其職務在管理港口事務並照顧雙方的權利。該城對於少數民族的權利（尤其是波蘭少數民族的），應予擔保。總而言之，波蘭具有管理自由城的經濟和外交的權力，而居民享有很多的自治權。

波蘭與但澤的關係曾一度緊張，這一層無待我們指出。在自由城成立後的五年中，高等委員所判決的案件，幾達五十餘起。國聯行政院也常常接到它們的上訴案件，甚至世界法庭也被驚動來解決雙方的爭議。經濟與政治事件間的界限之難於劃清，兩民族間相沿的仇隙，及但澤人民的深懼波蘭政府終將併吞該城，一切都足使目下的局勢成爲危險的情形。再者，但澤人又深以波蘭在格台尼亞（Gdynia）開始築港計劃爲隱憂。

華沙當局爲減少波蘭商人與運貨者對於但澤港種種設備的依賴起見，乃藉法國的一個資金與建築企業組合的助力努力推進格台尼亞的發展，這個地方距但澤的西北角僅有數哩。波蘭希望擴展這個港口，俾可每年把握一千五百萬噸以上的運貨。但澤居民自然非常憂懼鄰境的這種經營，因爲它將奪去他們的運業。德國國內的人民對於但澤人的困苦常常表示同情，而希特勒黨人更表示他們的決心，要將他們所認爲凡爾賽條約的顯然之錯誤，一舉予以糾正。

但澤的西南面，有一條狹長的地帶，長度約有二百六十哩，平均的闊度約有八十哩，這條地帶的一部分以前屬於西普魯士與波森（Posen）兩省。維斯拉河（Vistula River）就在該地帶內通過，這條河是東部中歐的商業渠道。凡爾賽條約規定將該地帶劃歸波蘭管轄，結果德國的土地被分成兩個不相啣接的區域：東至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德國本部，與東普魯士。這種疆土的轉移，在協約國方面是認爲非常正當的，他們的理由是：『東普魯士的德人不到二百萬，他們於設法使本土與德國連接之中所有的利害關係，其重要比不上整個波蘭國於取得入海通道之中所有的利害關係』。

因有『波蘭迴廊』(Polish Corridor)之建立，波蘭就成爲完善的經濟單位了。反之，從經濟與軍事上的觀點看來，德國卻變弱了，它要在波羅的海區域伸張勢力，也感覺困難了。至於東普魯士的命運，更爲乖蹇，因爲它在迴廊區域內不再享有銷售糧食、牲畜、木材和馬匹的自由市場了。一九二一年四月，柏林和華沙互派代表，訂立了一件協定，其中規定波蘭應准許德國的人民與貨物自由經過迴廊，往來於德國本部與東普魯士之間。然而這種辦法還不能算爲滿意。德國人之希望不用護照，且不受稅關檢查的煩擾，而通行該地者，必須乘了『加封的』特別車走過。坐在這種車子裏往往感到非常不舒服。

德國本國人對於波蘭人虐待住在迴廊裏的少數德人的事情，更懷不平。至於該地的波、德人民孰多孰少，在一九一八年還沒有準確的統計，但在今日，無疑地是波蘭居民占大多數。華沙政府曾經勸誘該地德人離境，往往直接加以驅逐，一方面又獎勵波蘭人民移殖到該區域內。在一九三二年，在那裏的德籍居民，恐怕只有十萬人了。波蘭迴廊的問題，就是德、波兩國交惡的最重要元素。這兩國的商務條約，多年來沒有議妥，無非因爲迴廊的爭議和少數德籍人民的問題未得解決所致。在一九二五年的洛迦諾會議中，德國斷然拒絕保證不侵犯波蘭的國界。自此以後，德國政府常常指出東部邊界有加以修改的切要。但是波蘭聲稱它的經濟生命有賴於迴廊之保留，它的同盟國——法國對於它這種見解力予擁護。附帶說一句，波蘭在迴廊地帶所耗於商業和軍事之經營的一筆大款子，卽由波蘭政府向法國的兩大軍火製造廠(Schneider-Creusot)所借得。

(庚)維爾那：另一個疆界爭執

在中古時代，維爾那（Vilna）是立陶宛大公國的首都。後來，當波蘭與立陶宛因兩國皇家婚姻關係而聯合的時候，維爾那的文化與經濟，漸漸為波蘭人所操縱。自波蘭於十八世紀被瓜分以後，維爾那就歸俄國治理，約有一百二十五年之久。

經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俄國革命後，立陶宛人乃宣佈獨立，並在維爾那設立新政府。接着兩國發生戰事，一九一九年一月，俄國共產黨軍隊進佔該城，但是又為波蘭軍隊擊退。其時，因為巴黎和會沒有劃定立波邊境的界線，協約國最高會議乃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規定所謂「寇純界線」（Curson Line）的臨時邊界，將維爾那劃歸立陶宛。那時波蘭尚在與俄交戰，就接受了此項規定，但祇認為暫時的處置。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二日，俄國依據莫斯科條約（Treaty of Moscow）確定把維爾那讓與立陶宛了。

俄波戰爭終了的時候，波蘭人就以戰勝為理由要求取得維爾那，結果與立陶宛發生武裝衝突。接着國聯委派了軍事調查團前赴出事地點，制止戰爭。一九二〇年十月，兩國政府因國聯的勸說，締結了蘇瓦爾吉協定（Agreement of Suwalki），因此「寇純界線」略經修正後又被雙方接受為臨時的邊界，而維爾那仍歸於立陶宛。

十月九日，即前項協定發生效力的前一天，波蘭的一個山賊齊立各維斯基（Zeligowski）率領了一萬五千人的雜牌軍隊，突然佔領該城。雖然華沙政府聲明不負此項行動的責任，但齊立各維斯基卻被波蘭人民呼為「波蘭的英雄」了。立陶宛即以此事訴諸國聯，請它主持公道。國聯有一個時期開玩笑似的準備付諸該地人民投票表決。然而到一九二一年三月，國聯行政院就向這兩個爭執的國家，建議舉行直接談判。當談判結果失敗時，

行政院又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三日規定了另一個臨時的疆界——這一次卻把維爾那劃歸了波蘭。次年三月，「大使會議」承認這個疆界爲永久的國界。

波蘭和立陶宛之間的戰爭狀態，自一九二〇年十月以來即存在，直到一九二七年纔告終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國聯行政院又不得不注意這個局面，當時立陶宛訴說在維爾那城的本國人民被波人虐待，波蘭也訴說在立陶宛的本國人民被立陶宛人同樣虐待。國聯遂請求畢爾蘇資基元帥與立陶宛的國務總理到日內瓦來開談判，結果締結了一件協定，立陶宛答應終止「戰爭狀態」，波蘭則允諾尊重立陶宛的完全獨立和領土完整。然而就立陶宛一方面而言，維爾那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一九二八年春季，在哥尼斯堡（Königsberg）舉行的波立會議，並未有所成就，兩國的邦交，依然非常緊張。

一九二八年五月，立陶宛政府公佈新憲法，其中把維爾那確定爲立陶宛的首都，雖然它的政務仍在科甫諾（Kovno）處理。立陶宛這種行動，大爲國聯行政院所譴責，於是又定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舉行第二次哥尼斯堡會議。可是會議的結果依然失敗，因之維爾那的爭執，對於歐洲的政治仍爲易起糾紛的因素。

（辛）外交

自波蘭復興爲獨立國後，它的對外關係，大半是於與鄰國在地理上的接近而形成的，這些鄰國對它都有敵意，至少是不友好。它的東面是蘇俄，北面是立陶宛和東普魯士，西面是德國。所以波蘭將它的主要希望放在軍事同盟和仲裁條約上，以求保障它的安全。一九二一年，它與羅馬尼亞和法蘭西訂立了同盟，與捷克斯拉夫締結了

中立條約。一九二二年，又與各小協商國建立了友好關係。三年之後，又與芬蘭、拉特維亞、愛沙尼亞、捷克斯拉夫和奧地利等國商訂了許多仲裁條約；與羅馬尼亞重締同盟；與巨哥斯拉夫訂立友好公約；接受洛迦諾協定；並與羅馬教廷簽訂和好條約。

一九二九年，波蘭、蘇俄、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和羅馬尼亞贊同李維諾夫議定書（Litvinov Protocol），因此開洛格公約不問別國簽訂與否在這五個簽約國立即發生效力。一九三一年，波蘭又與俄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與法蘭西和羅馬尼亞重結同盟。在這一年中，我們又看到波蘭從法國一個企業組合訂借了五千萬金元的款項，以完成從波屬上西里西亞到格台尼亞港的一條重要鐵路。同時，波蘭對於叔伯爾和庫圖斯兩博士會商的德奧關稅同盟計劃提起反對的呼聲。

若干國家曾在波蘭的提倡之下努力進行「波羅的同盟」（Baltic Union），它包括波蘭、拉特維亞、愛沙尼亞、芬蘭和立陶宛在內。這種聯盟對於各締盟國當有顯然的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但這一方面的工作還沒有什麼進展。俄國反對任何足使波蘭在波羅的海操霸權的計劃，立陶宛對於波蘭也不懷友好之意，芬蘭則漸漸傾向於斯干的那維亞的方位，而不願加入波羅的同盟。

在一九三一年之終，波蘭的常備軍計有二七〇、〇〇〇人，佔世界陸軍的第四位。在海陸軍軍費上它可居世界各國的第九位。一九三二年的波蘭預算案中，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經費為軍備所吸收。它的財源也很涸竭，因為波蘭共和國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

第十八章 蘇俄

帝制時代

尼古拉斯二世 (Nicholas II) 是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全俄皇帝與專制君主』。他所統治的帝國，幾占全球的陸地面積六分之一。他的領土共有八、七六四、〇〇〇方哩，西起中歐，東至太平洋，北自北冰洋，南迄裏海、高加索、波斯與中國。這個廣闊的幅員，居民約達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將近半數為真正的俄羅斯人，或大俄羅斯人。其餘則為小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波蘭人、芬蘭人、拉特人 (Lithuanians)、土耳其人、蒙古人、亞美尼亞人 (Armenians)、猶太人及其他。這許多種族不同的人民的文化程度非常高低不齊，從最文明的歐洲俄羅斯貴族與知識階級以至於過着半野蠻生活的西伯利亞土人。

據一九一四年的統計，在俄皇統治之下的每一千個俄羅斯人中，有十七個貴族，一二五個商人和市民，及八〇〇多個農民。直至一八六〇年為止，這些農民，除少數例外，都是農奴，受着封建法的種種限制寄生於政府或私人所有的田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一八五五——一八八一年) 登位後，就陸續頒佈了敕令（以一八六一年三月所頒佈者為最後的），廢除農奴制度，並規定土地的重新分配。依照他的命令約有一半歐

俄的可耕地被分派於各村 (mir)，每個農人都有權利爲本身的利益耕種屬於本村的田地之一份。政府則墊款給貴族，以賠償其土地的損失，但人民當於若干年中備資付還國家。

除掉因個人自由的給與所生的某種顯明的利益外，一八六一年後的俄國尙留有許多磨難，使一般農民之境況非常悲慘。被釋放的農奴往往不能靠所分得的一份田地自食其力與贍養家屬。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此種困苦每況愈下，蓋分配地的增加，不能同農民人口的繁殖並駕齊驅。農民每年收入的大部分，全被各方面吸收而去，如匯款於政府以償地價；繳納本村，本省與國家所徵收的苛重的直接稅與間接稅；經過層層剝削，已無多可餘。農民也沒有改良其保有地的信心，因爲改良的費用浩繁，非他們的力量所能勝任，況且村政府往往按期重新分配地段。此外，村政府所制定的規章條例多半十分嚴酷，一般農民如未經准許不得離開本村而遷往城市。

以上種種惡弊，有些或因政府於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爆發後所陸續頒佈的田地均分法令，稍獲減輕。這些法令所規定的事件中，有豁免農民所欠的地價，減少村政府對於村民的權力，並給與村民公然要求本村所保有的田地中本人名下一份的權利等項。這樣一來，農民成爲財產的直接所有者，他可以依自己的意思使用，出租或出售其田地。

由若干比較有進取心的國人看來，這些新的機會極投本人之好，他們於是趕快利用此項權利，成爲獨立的農夫。有許多農民，「依嗜好與習慣都是些小耕作者，切於購買或租借田地，有時甚至於起而強奪之」，就馬上爭先恐後地求得「租借田地的機會，而租價之高，往往使其勞作的報酬，還不如他們在鄰家田地耕耘所得的工資」。

有些人簡直不能『在更個人主義的制度下保持他們的所有地，遂以之售與鄰人，自己則成爲代人耕種的農夫或跑到城市裏去找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顯然可見農民的狀況到一九一四年還沒有充分改善。在大戰的前夜，仍舊可以找到幾百萬農戶正在過着極貧困的生活，並貪求更多的田地。

俄國的二、五〇〇、〇〇〇工人的境況也和農民一樣可憐。他們遭受着所有工業革命初期的那種不幸，他們又被不開明的政府抑制着，不能表示他們的痛苦。有些工會被破壞了，罷工運動常常受到無情的鎮壓，而關於社會問題的法律也比較少。其結果一般工業的無產階級熱心地諦聽宣傳改革的人的話，又因爲工人麇集於工廠與陋巷，所以很容易在他們中間鼓吹革命。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之際，工人早已在聖彼得堡、莫斯科、科甫諾（Koyno）、里加（Riga）及其他城市以大罷工和騷亂表現他們的憤怒，到一九一四年，他們似乎在準備另外一個暴動了。

俄國的農民與工人裏面文盲的百分數，冠於歐洲各國，而人民之爲一種猛烈的白蘭地酒（Vodka）這種酒含有百分之四十酒精）的奴隸，也是一種毒害。雖然酒類的販賣早爲國家之專利，以便徵收酒稅並減少隨着私人售賣酒精而至的罪惡，但酗酒仍是普遍的現象。所以，就全體而觀，民衆是鄙野而兇猛的，並且充滿着對於上層階級的畏懼與毒恨。在國家支配之下的希臘正教會，雖在農民中有很大的勢力，然而它是帝政的最忠順的擁護者，它顯然很少作過提高人民文化程度的功夫。

俄羅斯帝國在大戰前夕的政局是非常不穩固的。箝制言論的行爲早已著聞於世，警政方面也極爲殘暴。沙

皇尼古拉斯二世這個人很不適於行使專制權力於這個廣闊的領土。他雖是秉性良善，且愛國家，但爲人庸懦無能，並易聽信人言，爲所左右。他特別受制於那個神經質的皇后亞歷山達拉(Alexandra)，她本人又受一位西伯利亞的『僧人』叫做拉斯蒲丁(Rasputin)的所操縱。對於拉斯蒲丁的來歷有許多傳說，但似乎他具有催眠的魔力。他所以能迷惑皇后，使她受本人的支配，就因爲祇有他能够撫慰那個患血友病並有奇癖的年輕太子亞歷西斯(Alexis)。據說，拉斯蒲丁的一句話就足以任命或罷黜一個大臣或將軍，但他的大權顯然不是完全爲了國家的利益而發揮的。那時俄國的全局就有不吉的兆頭，特別是因爲要維持專制政治，就需要堅強而有決斷的領袖。它決不能在一個優柔寡斷的皇室與一個目不識丁的投機者的指導之下繼續存在。

一九〇五年的暴動的結果，尼古拉斯給與了人民一個國會(Duma)。這個國會的權力殊有限。再者，所制定的選舉法，使國會中的保守派常占過半數的人數，因之政府於繼續施行其傳統政策時，毫不發生困難。在一九一四年，國會全體，除五個議員外，都很愛國地擁護政府參加大戰的決議。那五位持異議的，屬於社會民主黨中自稱爲布爾扎維派的議員，(註)立被逮捕，流於西伯利亞。

(註)戰前俄國的「急進派」有以下數派：一爲立憲民主黨，或稱 Cadets，該黨的黨員即一般中等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商人，他們贊成採用英國式的責任政府；一爲社會革命黨，其構成分子大半爲農人，由中等階級的改革者領導着，宗旨在以土地移交農民，並主張用恐怖手段來實行農業的社會化與集合化；最後爲(馬克思派的)社會民主黨，它以工人爲主力，主張廢除私有財產，由大眾管理生產。

社會民主黨於一九〇三年在倫敦開會時，黨中人對於黨的紀律、組織及與非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合作與否的問題發生兩歧的意見。一

派人以列寧爲首領，贊成採取嚴格的紀律，集權的組織，並完全與中等階級分開，不受其幫助。其他一派則寧擇比較鬆弛的組織，且反對容納非無產階級的「同情者」。大會於是以此兩派的意見交付覆決，結果投票贊成列寧一派的見解的人居大多數。列寧一派人不久號爲布爾扎維黨 (Bolsheviks) 此字出自 bolshevstvo 意謂「大多數」；而其他一派則稱門塞維克黨 (Mensheviks) 此字來

自 menshinstvo 意謂「少數」。

儘管俄軍在戰爭的最初幾星期中略獲勝利，不久就很顯然，俄國若將戰事延長下去，就會遭受困難。俄國對於大戰無充分的準備，成功的障礙則甚大。國內的工廠很少，因之軍備時虞不給；缺乏充分的運輸設備；前方的將領都是些關其無能之輩，而皇后與文職貴族又常常干預軍事；政府各部幾皆腐化不堪；當時並有高級官吏實行叛國的謠傳。因之德軍不久就能够屢次大敗俄軍，這更使俄軍的士氣一蹶不振，並使俄國的工業組織大爲紊亂。在開戰後起初三年中，俄皇一共召集了一千五百萬人從軍——這個數目是不必要的，並且也沒有如許軍用品和糧食來維持它。因之有幾百萬農夫被迫離開田園，拋棄耕耘與收穫的生產事業而從事於破壞工作，而這幾百萬人必須用國帑來養活。因爲兵士的每日口糧在許多情形中超過各個農人在平時的消費量，所以糧食的需要額比平時多得多。此外，政府又得以巨款津貼兵士的家屬。

俄國的鐵路系統復不能擔任戰時的運輸。在一九一四年，帝國祇有五萬哩的鐵路軌道——僅及美國的五分之一，雖然面積大於美國三倍。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迅速地載運軍用品到前方，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關於戰士的可怖狀況及巨大的傷亡之數的謠言漸漸洩露於後方，同時國內飢饉與災禍的慘聞亦遍傳於戰壕。

戰時對於貨物的需求之殷，及各城市中所發生的許多罷工的勝利，在在使物價飛漲，一九一六年俄國政府的歲出視戰前各年度高出了四倍，雖然多數的額外支出係取償於協約國的借款，但稅收仍須加重，通貨膨脹的政策亦須實行，其結果物價更因之而激漲。同時，政府爲便利動員計，早已開始禁酒，這樣一來，大宗的酒類販賣稅就無形犧牲了。

儘管情形如此惡劣，當局仍毫不注意人民所提出的關於開明的政策與內閣責任的要求。官吏竭力設法挫折民衆的運動，即令此種運動的動機有助於戰事，亦所不顧。事實上，內務大臣普洛托坡夫（Protolopov）有一次竟拒絕某省議會的提議——使軍隊得到若干安樂的提議，他以爲『俄國人民所提出的任何方式的自動合作都不免會傾向革命』。當軸者同時露出他們對於下層階級的戒心，並保持一種不妥協的和反動的態度。尼古拉斯本人則畏縮逡巡，對於任何種方針狐疑不決，祇是以維持一切事物的現狀爲心滿意足。到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妖僧拉斯蒲丁被一個少年貴族狙殺，但這件事無補於時局。

俄國舊政體的敗亡的劫運，第一次的朕兆爲一九一七年二月彼得格勒（Petrograd）的工廠總罷工。這個罷工引起無產階級的無組織的，無計劃的，但很偉大的示威運動，這般人已因戰事的綿延，軍隊的敗績，生計的困窮及物價的昂貴而不能復耐了。該城的警備軍奉命驅散羣衆的時候，卻不肯對一般示威者放槍，事實上他們已和人民聯成一氣了。那時俄皇如能趕快召集京城外的軍隊來鎮壓暴徒和國會（國會也正在表示亂動的精神），或答應自由黨員所提出的改組內閣並建立責任政府的要求，他也許可以避免，或至少展延，危機的降臨。然而尼

古拉斯不能當機立斷。他既決意不作任何讓步，又不毅然採取神速的行動，祇是觀望形勢，無所事事，又安得不敗呢？

一九一七年的兩次革命

俄皇的優柔寡斷漸漸激使國會內外一般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傾向於革命的立場，並資過激派再好也沒有的宣傳材料。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之初，各大都會均有民衆的暴動，鄉村中的農民亦大起騷亂，同時國會中猛烈地攻擊政府犯有叛國之罪。最後，在是月十一日，俄皇嚴命國會議員一齊歸家，又命彼得格勒的工人停止罷工。這種愚笨的敕令祇有促成革命。

國會拒絕解散。它反而推選了一個委員會，從事領導反抗專制的革命。同時國會外的社會主義者和其他過激分子組織了「彼得格勒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會議）」，邀請全國的工廠與軍隊派代表來商議一切。國會的委員會與這個蘇維埃答應彼此合作（至少暫時合作），三月十四日，以頭腦較新的親王李窩甫（Львов）為首領的臨時政府就產生了。內閣閣員的大多數為立憲民主黨黨員。其中最急進的一位，就是社會革命黨黨員克倫斯基（Kerensky），他是蘇維埃的代言人及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副主席。

三月十五日，沙皇尼古拉斯承認新政府，遜位於其弟米卡益爾（Michael）大公。可是米卡益爾拒絕接受皇位，他要等人民根據普遍的、直接的和祕密的選舉權所選出的國會決定俄國將來的政體。尼古拉斯與其家屬於

是成爲囚徒，被幽於彼得格勒附近擦斯科業·謝羅 (Tzarisko Solo) 地方的皇宮，這樣，建立於一六一三年的羅曼諾夫 (The Romanovs) 皇朝遂壽終正寢。

臨時政府成立後立刻頒佈命令，撤消新聞檢查，釋放大批政治犯與宗教犯，承認工人加入工會與罷工的權利，並修改陸海軍的軍紀法，使合乎人情。大多數文官與軍官都答應在新政府下服務，因爲俄皇本人已承認新政府的地位。再者，各協約國步美國的後塵，立刻給與承認。事實上，協商國的外交家當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反而安心了，因爲他們早已風聞俄帝國政府因俄後的愆愆，已在計議單獨與德國媾和。

儘管有這種好的兆頭，李窩甫政府卻被注定爲短命的，因爲它的存在，全靠國會中的革命黨人與彼得格勒蘇維埃之間不相稱的聯合。國會之欲推倒俄皇，祇爲了一個理由，即因他未能盡力應付戰事，而工人一方面卻大半爲了要終止戰爭纔起來的。不特此也，蘇維埃要求徹底修改俄國的財產保有制度，這是國會中大多數溫和派所不能表同情的。最後，當臨時政府企圖以聳人聽聞的學說和主義來解決其困難問題的時候，蘇維埃迅速地完成了強有力的中央組織，分遣人員往全國各重要地點設立支部，到處散播煽惑的宣傳，並催促勞動者，陸軍與海軍派代表到中央蘇維埃。

彼得格勒蘇維埃於三月十四日頒發了一道著名的第一號命令，訓令陸軍與艦隊不要理睬任何與蘇維埃規章的臨時政府的軍令。陸海軍的兵士也很快地設立了地方革命委員會，管理一切補助的軍器。這些軍器之處置與使用權祇在各地地方委員會確定其不致危及革命之利益時，纔委託於軍官。軍隊中的紀律因此大受破壞，兵

士方以他們新近獲得的「責任」而揚揚自得，有些不能把握變遷的局面的意義的軍官，往往立刻被槍決。此外，兵士中又發生勢不兩立的鬪鬥，因為有些人情願照舊矢忠於其長官，另一羣人則不肯作戰，且自動開拔回國。

李富甫內閣之不能應付方興的難局既漸漸顯然，閣員中的溫和分子遂相繼辭職。到七月間，原先被任命的人祇剩三個，連克倫斯基也在內。事實上，克倫斯基已崛起為陸軍總長及政府首領，他用他的口才和巧妙的國會程序力求恢復國內的秩序，一面繼續進行對於中歐同盟國的抗戰。然而到這個時候，就是社會革命黨的政府也為民衆所不滿了，民衆所渴望的是和平的復臨及對於國家生產機關的直接管理。克倫斯基的切望展延國民議會的選舉，使人民減少了對於他的根本動機的信心。

在一九一七年的秋天，俄羅斯顯然瀕於另一個革命。兵士正在表演也許可稱為世界軍事史上最大的兵變的一幕悲劇。農民一覺得沙皇與地主勢在必倒的時候，就起而強奪土地，有時平和地過去，但常常經過慘酷的流血。城市中的許多工人，起初本為求得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時間而罷工。現在變為更激烈了。他們當中有些人甚至於要取得完全的工廠管理權，且不顧資本家的所有權而接辦生產機關。為使他們的理想更有力量起見，他們組織了地方蘇維埃，並自動編成武裝部隊，號為赤衛軍。那些隸屬於俄國的民族，尤其是烏克蘭人與芬蘭人，則乘此大混亂的時機進行獨立，同時德國與奧匈帝國的軍隊雲集於俄國的西疆。當着這種局勢，克倫斯基雖給與舊省議會（Земствос）較大的地方自治權，確立普選權，預許遠大的社會改革與經濟改革，仍不能使任何部分人民滿足。

一九一七年六月，因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提議，舉行了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到會的代表約計一千人，其中有社會革命黨人，門塞維克派人，及布爾扎維派人，後者僅居少數。大會以激烈的演說恣行攻擊帝國主義，並主張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大會最大的成就，則為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派定。這個機關有委員三百人，算是一種蘇維埃國會。其領導者為二十人的主席團，其中大半為社會革命黨人和門塞維克派人。

布爾扎維派人雖在大會中為他黨的人數所勝過，仍不斷地組織地方蘇維埃，並以極大的活動力激動人心來反對克倫斯基。他們藉德國的金錢與間諜之助，傳播他們的思想於戰壕，工廠與農村。他們到處喊着『和平土地麵包』的口號，並預許以自由給與國內的被壓迫民族。指揮這個運動的人就是『布爾扎維主義之父』列寧。他曾經靠德人的保護從瑞士潛回本國。德人所以幫助俄國的革命黨，並非出於對同情他們的理想不過爲了要加速地暗中損害俄國的國脈並結束東線的戰事而已。協約國之未能依照克倫斯基的提議重新闡明他們的戰爭宗旨，亦不利地反響到克倫斯基所處的地位。

布爾扎維黨的活動在七月間暫時受到挫折，那時克倫斯基已順利地撲滅了無政府黨的暴動，這個暴動雖經列寧極力反對，卻對於一切反政府派的活動發生不利的反作用。然而九月間科尼羅夫（Kornilov）所領導的推翻政府的運動（同樣歸於失敗），不但使布爾扎維黨能够恢復失地，且足以增大該黨的聲音。

科尼羅夫是一個有本領的軍略家，因爲他既有能力，又秉性仁慈，並曾從奧國的監獄中奮勇逃出，所以在軍隊中頗得士心。他做過克倫斯基政府的陸軍總司令，握有幾乎毫無限制的軍權。有一個時期，似乎他和克倫斯基

打得火熱，並且共同計劃建立一個強固的中和政府，以便制止內亂並繼續抵抗中歐同盟國。然而，當科尼羅夫始向彼得格勒進軍的時候，克倫斯基驚惶失措，他於是火急調到幾枝軍隊，親自帶了去會晤那位將軍。科尼羅夫的人聞知這個局勢，不肯跟他再向前進，政府因之兵不血刃就得救了。克倫斯基於憂慮不安之中，曾經召集赤衛軍來援助，又因為赤衛軍中的兵士大半為布爾扎維黨人，所以該黨的威望在人民的心目中大有增加。

最後，布爾扎維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黨員大會（到會者有陸海軍兵士與工人的代表）議決推倒現政府。十一月六日與七日，彼得格勒被該黨依預定計劃以武力奪得，政府中人皆遭逮捕，祇有克倫斯基漏網。該黨特行選定這個日期為發難之日，以便於事成後好舉行第二屆全俄蘇維埃大會，此會已定七日召集。所以，當大會開幕的時候，它的面前已經是「既成的事實」(fait accompli)了。會中既有過半數的布爾扎維黨黨員，故大會馬上自立為俄國的最高機關。

第二次革命的精神立刻傳佈開來，俄國各處的地方蘇維埃陸續奪得政權。當時（十一月）大會另行指定了一個受布爾扎維黨支配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一個行政機關，稱為人民委員會（The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者。這個人民內閣的主席就是列寧，同時托洛茨基為外交人民委員，萊科夫（Rykov）為內政人民委員，史丹林（Stalin）為工農視察人民委員。

人民委員會所當着手之政綱如下：（一）與中歐同盟國立刻媾和；（二）肅清各地的叛亂並打破舊帝國滅亡後即在進行的分離運動；（三）完全修改國家的經濟的，社會的與政治的組織，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制以統治

國家，至全國人民準備參加共產政府時為止；及（四）使無產階級的革命蔓延於全世界。同時，新政府必須照料自前線歸來的兵士，並供給食物與住所於各城市中的難民。

為保證新政府之善意起見，拖延已久的國民議會的選舉卒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行了，這個日期是克倫斯基所預定的。不料這第一次普遍的、直接的、和祕密的選舉之結果，大獲勝利者竟為社會革命黨，這使布爾扎維黨非常惱怒。社會革命黨在議會中得到四一二個席次，布爾扎維黨僅得一八三席，其他幾個黨派所得者更少。如果這個政府是有責任的一種，布爾扎維黨就決不肯將其權力讓與多數黨。然而他們無意於危及他們將來的政權，所以他們延緩議會的開會期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並於此際力求鞏固他們的力量及恫嚇敵黨。

儘管布爾扎維黨使用這種策略，議會於開會時仍選舉社會革命黨人為主席，並否決布爾扎維黨所提解除各階級人民（工人除外）的武裝的議案。布爾扎維黨的議員於是離開議場，次日，該黨以武力解散這個「反動的」議會，同時指斥社會革命黨「領導着中等階級與工人的革命為敵」。那些露出反布爾扎維黨傾向的地方議會亦遭解散，其領袖人物多被監禁或放逐。於是工人階級專政的制度，表面上要維持到全國民衆能够理解並自動接受共產主義的利益時為止者，就如此取曇花一現的民主政體而代之了。寫到這裏，我們且將兩個最著名的人民委員的一生經歷作一鳥瞰，這也許是有興味的事罷。

列寧與托洛茨基

佛拉德米·伊力奇·烏拉諾夫 (Vladimir Ilyich Ulyanov) 別稱列寧 (Lenin) 以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日生於喀山 (Kazan) 省之信比爾斯克 (Simbirsk) (今名列寧斯克 Leningk)。烏拉諾夫一門雖屬於貴族，但素以具有自由思想及過激的傾向著名。佛拉德米的哥哥亞歷山大 (Alexander) 即於一八八七年因犯共謀殺害俄皇的罪被處絞刑。另一個兄長和兩個姊姊常常受警察的監視。佛拉德米自己則於入學一個月內爲了參與學生的暴動被喀山大學開除。

若干年後，他得入聖彼得堡大學肄業，並於一八九一年獲法學士的學位。當時他全神貫注於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 (Das Kapital)，堅信祇有社會主義能够『引導俄羅斯人民走上自由之路』。他於是加入了一個過激黨，成爲黨中最活動的份子之一。這樣的大膽妄爲終使他從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〇年被流於西伯利亞。在放逐的當兒，他和一位有本領的女同志，克魯普斯喀耶 (Krupskaya) 結了婚 (一八九八年)，他以後一生的革命事業，得力於他共甘苦的內助者不少。

一九〇〇年，他往瑞士，此後除於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之際曾回國作短期的逗留外，一直到一九一七年都漂流在國外。在這十幾年中，他編輯過激派的報紙，周遊德、奧、匈、法、英諸國，每到一處，即與當地著名的改革家訂交。在一九〇三年，他成爲社會民主黨布爾扎維派的領袖，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他的長兄亞歷山大烈士的英靈始終是

他的嚮導和安慰。「列寧」一名本來是他的哥哥的別號，他就襲用了它。

列寧的容貌頗為寢陋：身材矮胖，頭頂光禿，滿面鬚鬚。他從來不曉得貧窮的實際苦痛，但他所過的生活很中庸簡單，工作勤勞且有秩序，常常運動，鍛煉體格。他對於本人的權力與能力，充滿着自信心，自知智力迥異常人，並具有鐵的意志力和不可撼動的決斷心。最不可及者，列寧這個人完全沒有自私自利的心，遇到關於政策的事件，卻毫不妥協，毫不遲疑。他頂恨無益的討論，而他估量對手時的沈着與巧妙使他成爲辯論中的勁敵。「他也許是唯一的言簡意賅的革命作家」。

這位布爾扎維派人的領袖是一個實在論者。雖然他看見這個世界現出本相，但他「決不逃到山林的幽處，遺世獨立」。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是罪惡的化身，世界革命爲最高的目標。要完成對於前者的破壞而達到後者的境界，一切手段都是正當的。列寧不是一個可愛的；他是一個可敬畏的首領。

一九一七年，德國人准許列寧乘了關閉得很密的車回到俄國，以便他從事顛覆臨時政府的宣傳。他精細地計劃着推倒中等階級的政體，並留心於蔓延各處的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這些運動自經幾次暴動後已入於建設的方面，此刻正在企圖鞏固由破壞所得的若干社會的與經濟的結果。列寧經過幾個月的活動後，決定開始行動的時機已到，十月間，他使他的黨徒悟到同樣的見解。十一月六日與七日，革命遂行爆發。

列寧的最能幹的助手之一就是萊夫·達維多維區·布琅泰因 (Lev Davydovich Bronstein)，別號爲雷翁·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 者。托洛茨基以一八七九年生於給爾孫省 (Khatson)，是一個刻苦耐勞而家

道小康的猶太農人之子。他祇受過八年的學校教育，但他酷好讀書，漸漸自己養成一個能文之士。他在童年所看到的人類不平等與不公平的事例深銘於他的靈敏的心中，當他還年輕的時候，就受到一般過激的思想家的影響。他於離校後一年即因參與組織南俄工人聯合會被捕。在一八九八年與一九一七年之間，他過了四年的鐵窗生活，被充軍於西伯利亞兩次，又在國外住了十二年。

他和列寧一樣，漫遊過中西歐，其間曾講學於比法德，並寫了許多文章和小冊子。當布爾扎維派與門塞維克派發生裂痕的時候，他有一個時期領導着一羣中間派人（托洛茨基派），直至三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後纔投到列寧的一方。大戰時，他被驅出法國和西班牙，流到美國，在紐約住了幾年，然後企圖回國。在途中，他被拘留於海利法克斯（Halifax）地方的集中營裏面達一月，但經克倫斯基緩頰後，即被釋放。

托洛茨基的丰采較列寧為動人。他的面貌的特徵即在隆準，高額，厚脣，黑眼睛，鬚曲如波的頭髮。他好誇耀，並喜人面諛，但不失為一個不屈不撓的工作者和卓絕的組織者。他信仰紀律與系統，打定強大的紅軍的基礎的人就是他。他又是一個多產的著作家，筆墨也很生動。一九二九年，他在自傳上寫道：『我的有意識的一生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完全為革命的奮鬥所佔據。假使我必須從頭再經過一遍，我當毫無猶預地取同一的途徑』。

外戰與內戰之終止

我們當記得，俄國與中歐同盟國之媾和是以簽訂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The Treaty of Brest-

Litovsk)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 來完成的。(註) 依據這件條約及兩件補充條約的條款，俄國當放棄五〇〇、〇〇〇方哩的土地及六六、〇〇〇、〇〇〇人民，並須賠償巨款。這種規定雖是很苛刻的，但欲求愈於此者，殊不可得，因為當時俄國所處的地位決不能繼續戰爭，而德國趾高氣揚，毫無慈悲之心。再者，條約的締結至少可以使布爾扎維黨能够集中精力於整頓內政。

(註) 見第三章。一九一七年，布爾扎維黨通告廢棄俄國所曾參與締結的祕密條約，並將其原文公佈，但俄國與中歐同盟國的談判祇在協約國拒絕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意見(即以民族自決及「不割地不賠款」的原則為基礎磋商和約)後纔開始。

內政中最急之務，即在應付正起於各處的許多反對革命的運動。三年以來(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布爾扎維黨完全從事於與貴族、教士、溫和的共和黨人、投機分子、帝俄時代的官吏及擁護地方權利者所領導的，反對黨作生死的決鬥。有一個時期，幾個反革命派，出於戰略上的動機，暗中受人犯的德軍所幫助。後來協約國也派遣兵士，贈送金錢與軍火給他們，以便用於反抗「赤黨」。

協約國之干涉俄國的內政，有幾個理由。他們希望恢復中等階級的政權來重建反抗德國的東戰線。他們要從德人或布爾扎維黨的手中保存積貯於穆耳曼斯克(Murmansk)和阿堪遮(Archangel)的軍用品，這是他們從前所交與俄軍使用的。他們又為布爾扎維黨於一九一八年一月所發表的取消俄國一切外債的宣言所激怒。所以，協約國的封鎖擴展到俄國；協約國與美國的陸軍分遣隊也開到了穆耳曼斯克，阿堪遮與海參崴；當土耳其退出戰爭的時候，法軍就轟擊並奪取敖得薩(Odessa)，同時英軍進攻巴庫(Baku)。(註1) 以前從奧——匈

軍隊中逃到俄國的幾萬捷克兵與斯拉夫兵此時亦成爲布爾扎維黨的敵人。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芬蘭及外高加索諸邦的民族主義派和反社會主義派乘此混亂的機會宣佈各該地的獨立，羅馬尼亞則襲入那個物產豐富的比薩拉比亞省 (Bessarabia)。(註一)

(註一) 日本則派了幾萬人開到西伯利亞的南部與東部，以爲等待甚久的奪取該地的機會終究到了。協約國中若干政治家所以贊成此舉干涉，大概因爲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缺乏同情。

(註二) 見第十九章。

外國軍隊凡至一處，即與當地反布爾扎維黨的土人隊伍共同設立反革命的政府或『白』政府。在穆耳曼斯克和阿堪遮的四周圍，有『北俄臨時政府』的組織。前帝俄黑海艦隊司令科爾察克 (Koltchak) 海軍大將藉協約軍與捷克兵士之助在鄂木斯克 (Omsk) 建立了『全俄政府』。在俄國南方，有鄧尼金 (Denikin) 將軍的政府，後來又有胡蘭吉 (Wrangel) 將軍在南烏克蘭與克利米亞 (Crimea) 所設立的政府。此外，朱丹尼區 (Judenich) 自立爲『俄羅斯西北政府』的首領，設大本營於波羅的區域，同時曼涅亥謨 (Mannerheim) 將軍取得芬蘭東部和卡累利阿 (Karelia) 的統治權。虎視眈眈於邊境，企圖從蘇維埃攫取土地與權力的人，則有波蘭將官哈勒 (Hallor) 及哥薩克兵大將裴脫盧拉 (Pelura)。

在起初看來，似乎布爾扎維黨人會被這許多敵人打倒。赤衛軍雖很精強，但寡不敵衆，況且在某一時期，列寧的黨徒祇據有彼得格勒、莫斯科及近畿數省。

然而有兩個要因使布爾扎維黨得利。第一，外國軍隊對於確爲有待俄人自己解決的事件的橫加干涉，引起了很多愛國者的不平，他們於是羣起幫助赤黨來驅逐外人。第二，許多農民雖不懂布爾扎維黨的經濟學說，且不喜歡該黨徵發穀類的政策，但他們更討厭白軍的活動。白軍每進展至一地，即開始白色的恐怖，並表示要恢復革命以前時代的地主與農夫之舊關係的決心。在這兩種惡事——徵發政策與地主特權主義之中，農民顯然寧擇前者，他們覺得，徵發政策畢竟是一時的，將來總會停止施行；但地主特權主義，如經恢復，即可成爲永久的毒害。因之在布爾扎維黨拚命掙扎的最初幾年中，俄羅斯民衆在各方面盡其膽量阻撓反革命黨的進行。

當赤白衝突達於高峯的時候，布爾扎維黨如將廢皇及其家屬繼續幽禁於擦斯科業·謝羅，似乎是很危險的，因爲該城也許會因而成爲反動派的集合地。因此他們把羅曼諾夫一家囚徒移到內地，最後安置於業卡忒林堡（Ekaterinburg）的烏拉爾（Ural）鎮。政府本想將來公開審判廢皇，以托洛茨基爲檢察官，但當科爾察克所統率的白軍於一九一八年夏天進攻到業卡忒林堡鄰境的時候，當地的蘇維埃官吏大起恐慌，他們乃於七月十七日下令將廢皇尼古拉斯與廢后亞歷山達拉及其一子四女一齊槍決。這件不幸的事被赤色政府的反對黨舉爲空前的殘暴的例子，但我們評判此事時，必須記着，凡可與俄國的革命較量範圍的其他革命，極少是未經處死舊君而能安然告成的。

光陰一月一月地過去，布爾扎維黨漸漸造成了兩種強有力的武器，用以抵制國內外的反對黨。該黨柄政後不久，爲撲滅反革命黨起見，設立了一個『抵抗反革命投機與怠工之非常委員會』，這個機關從其俄文每字的

第一字母簡稱爲「Чика」(契卡)。托洛茨基深信「恐怖政策爲工人階級的意志與力量的表現，它在歷史上是正當的手段」，該機關的首領德壽與斯基(Dzerzhinsky)似乎很贊成這句格言。自社會黨於一九一八年八月謀刺列寧的事件發生後，布爾扎維黨就開始了真正的「大恐怖」。

「契卡」是一個權力很大的、祕密的、革命的裁判所，它可以隨意要求、拘捕、並執行死刑，嗣後祇須將其活動情形造冊報告人民委員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至於這個機關所處死的人數，沒有可靠的統計，但被殺者至少必有幾萬人——也許幾十萬人。無論如何，反對黨的背脊骨被折斷了，小資產階級與知識階級的勢力也幾乎消滅了，而無產階級與農民依然爲支配的階級。

那些反動將領與外國軍隊則由紅軍來對付，紅軍是托洛茨基的組織天才的結晶品。在一九一九年，托洛茨基已經編成了十萬精銳的軍隊，大部分由帝俄時代的愛國者軍官所統率。布爾扎維黨的軍隊既漸有力量，協約國就慢慢不熱心於繼續他們的武裝干涉了。不特此也，白軍的復仇的與失面子的行動使若干西方國家的外交家覺得討厭，他們後來對於恢復帝政的運動，止於供給軍用品和少數軍官而已。在一九二〇年之夏，英、美、意三國開始解除對俄的封鎖。

紅軍力求於一九二〇年之終恢復國內的和平。它的第一次大勝利係發生於對抗朱丹尼區的軍事，到一九一九年十月，朱丹尼區被逐出彼得格勒的鄰境，退至愛沙尼亞。愛沙尼亞馬上把他趕走，到一九二〇年二月，它和俄國在多爾巴得(Dorpat)(即塔圖Tartu)簽訂了條約。同月，紅軍擄獲科爾察克，立予槍決，他的鄂木斯克政府

亦歸消滅。先是科爾察克得到一枝捷克人的生力軍的援助，實際上已支配着西伯利亞鐵路及海參崴與伏爾加河（Volga River）之間的許多大城市，但他不能深入歐俄，且以此喪生。自一九二〇年七月至十月，俄國和立陶宛、拉特維亞、芬蘭及波蘭陸續簽訂了和約。

對波蘭人（他們想擴展他們的邊境到一七七二年的界線）的戰事特別困難，因為波軍一部分由法國的軍官統率着，其軍需品亦多半由法國供給。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他們進占基輔城（Kiev），但赤軍此時已經集中，並將敵人逐退到華沙的城門口。再經過幾個月的交鋒後，雙方在里加（Riga）訂立了和約（十月十二日），並劃定了折衷的疆界。當斯之際，鄧尼金將軍亦在南俄敗績。他因為要繼續抗戰，乃於他治下的民間實行徵兵制，甚至於強迫赤軍俘虜在他的旗幟下作戰。到一九二〇年春天，他辭去總司令之職，讓與胡蘭吉將軍擔任，自己則亡命國外。胡蘭吉在克利米亞頗能負隅頑抗，一直守到十一月，接着也逃出俄國。經過六年不斷的戰事後，俄羅斯纔重睹和平。

然而這個一九二〇年的『俄羅斯』祇含有從前帝國疆域的一部分，雖說是一個大部分。波蘭、芬蘭、拉特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外高加索、比薩拉比亞及西伯利亞的東部都獨立了，或在外國的占領之下了。所餘的俄羅斯祇是幾個自治的共和國與區域的聯合體，這個聯合體自一九一八年的春季以來，即稱爲『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 S. F. S. R.）。那四個沿波羅的海的小邦，波蘭及比薩拉比亞似乎永遠喪失了；但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時期內，其他的區域全收復了。

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一年之間，布爾扎維黨的同情者陸續在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以及外高加索的亞塞爾拜然 (Azerbaijan)、亞美尼亞 (Armenia) 與喬其亞 (Georgia) 諸邦奪得政權。後三邦受了俄國的慫恿，乃聯合成立『外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隸於布爾扎維黨的各邦（此刻共有四個）的代表在莫斯科簽訂了合併的條約。此約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發生效力，這個新聯合國遂定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U. S. S. R.)。(註)

(註)當西伯利亞在協約軍占領之下的時候，位於貝加爾湖之東的那部分已成立為「遠東共和國」。然而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即最後一部分日本軍撤退後一個月，該地的國民議會就議決馬上合併於蘇俄。

聯合國的各邦至少在理論上仍享有很多自治權，並保留『自由脫離聯合國的權利』。新國的正式國名刪去了『俄羅斯』三字，因為希望非俄羅斯人所居的其他國家以後也可以加入蘇聯。在一九二四年，兩個中亞細亞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烏士比基斯坦 (Uzbekistan) 與土耳其曼尼斯坦 (Turkmenistan)，果然加入了聯合國的第七邦，塔德其基斯坦 (Tadjikistan)，則於一九二九年獲准加入。儘管說這七個共和國彼此平等，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居主宰的地位。這個情形也是必然的結果，因為蘇聯的十分之九的面積及十分之七的人口係包括於這個構成分子的範圍之內。

蘇聯七邦及蘇聯本身的憲法，都是依照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做造的，後者為全俄蘇維埃第五次大會於一九一八年所採用，並於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三〇年之間加以擴大的。

蘇聯的政治組織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的基本理論就是共產主義，(註)它的許多思想可追溯到馬克思與昂格爾(Engels)在一八四八年所發表的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由布爾扎維黨人看來，共產主義是一種哲學，也是一種方法。就哲學上講，它的宗旨在廢除私有財產並將一切生產與分配的機關歸諸公有，以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它的方法，為在工人的有組織的獨裁制之下的社會革命，第一步為國家的，第二步為國際的。此種原則就是歷屆蘇維埃大會所據以採用或修正俄國的根本法的動因。

(註)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布爾扎維黨採用了「共產黨」的正式名稱，到一九二三年，又改稱「全蘇聯共產黨」(C. P. S. U.)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於是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所頒佈的『工人與被掠奪者之權利宣言』後，宣布俄羅斯為工人與農人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其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完全操諸工人、農人、哥薩克兵及紅軍代表的蘇維埃。一切土地、森林、礦產、牲畜、工廠、商店、銀行、及生產、交通與運輸的機關均為工農國家的財產。為撲滅所謂社會的『寄生蟲』起見，勞動被規定為國民的義務。憲法中的特別條款向工人保證宗教意見與無神觀念的自由，及享受自由與普遍教育的權利。禁止對於少數民族的壓迫，凡寄居於俄國，奉公守法的外國工人應有本國工人的同樣特權與權利。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權力存於全俄蘇維埃大會，大會休會期間，則存於全俄中央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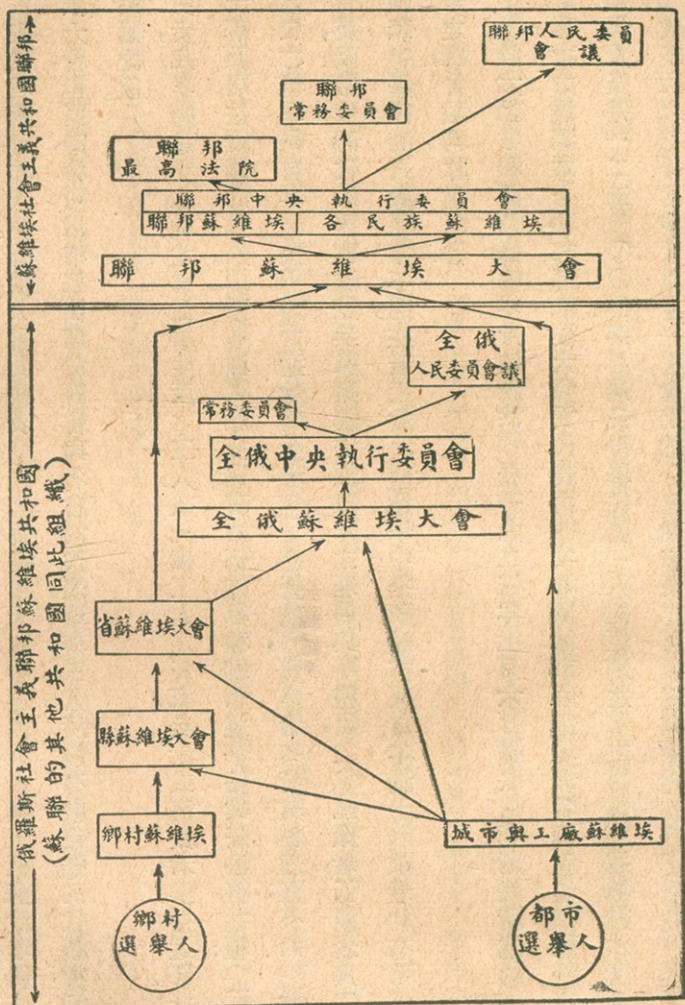
行委員會。全俄大會由各城市蘇維埃的代表，根據於每二五、〇〇〇投票人舉一代表之原則所選出，及各省蘇維埃的代表，根據於全體民衆中每一二五、〇〇〇人舉一代表之原則所選出，共同組織而成。因為所產生的大會過於龐大（共有代表一千人以上），於辦事上不能運用如意，所以大會派定了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以爲「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之最高立法，行政與監督機關」。

這個執行委員會約有委員四百人，負有「指揮工農政府」之責，具有頒佈法令與決議案，統一並調整全國的立法與行政，及派定一種號爲人民委員會會議的內閣等等權力。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重要性的增加與全俄大會的勢力的衰落適成正比例。全俄大會起初常常開會，接着每年祇開一次，到現在則變爲兩年一回，開會時照例批准執行委員會所制定的一切。

又因爲中央執行委員會也嫌人數太多，不能充分發揮工作的效能，所以它於一年中祇舉行會議幾次，將事務管理權及對於人民委員的監督權留給約四十人的常務委員會。「人民委員會會議」(Совѣтъком)在常務委員會的嚴密監視之下實行統治國家的實際工作。每個人民委員有一副委員襄助辦事，並對人民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人民委員會會議的一切法令必須呈送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待批准或廢止。全體人民委員包括重工業與輕工業、勞工、財政、工農視察、中央統計行政、教育、衛生及社會公益各委員。

地方的權力則操諸地方蘇維埃之手中，但受中央政府的嚴密監督。各城市由根據於各該地方全人口中每一千人舉一代表之原則所選出的都市蘇維埃統治。代表的選舉以行業或職業而非以地理上的分區爲基礎，各

蘇維埃政治組織圖



種職業中的人民皆分別投票，各不相同，如鐵匠為一羣，織工另為一羣，餘類推。關於操家政的主婦及無所屬的工人，則有特種的分區法以濟其窮。在鄉村與小鎮中，農人、家庭工人、教師、及醫生齊聚一處選舉代表，計每一百人選

出一人。通常的選舉方法爲舉手。

在城市鄉村蘇維埃之上的蘇維埃的代表選舉用間接選舉法。鄉村蘇維埃派代表於縣蘇維埃大會，縣蘇維埃繼之派代表於省蘇維埃大會。全俄大會的代表則從省蘇維埃大會中選出。城市與工廠蘇維埃得直接選舉其代表於全俄大會，但同時復可以指派出席於縣會與省會的代表。城市工人所以有較直接的代議權，則因他們爲共產黨的心髓之故。

全國男女，凡年齡達十八歲，並爲從事生產之工人，或此種工人之管家，兵士或海員者，俱得選舉。此項定則同樣適用於土著及居住俄國的外人。以下各種人，除掉偶有的例外，都被剝奪選舉權與任公務之權：(一)爲獲利而雇用工人者；(二)恃非得自其直接勞力之進款爲生者；(三)私營商人，貿易者與商業經理人；(四)僧侶與教士；(五)舊時官吏，及帝俄時代的警察隊，憲兵隊與祕密偵探隊之雇員與事務員；(六)瘋癲者，低能者與罪犯。根據此項規定被剝奪選舉權的人數歷年不同。在最近幾次的選舉中，全國城市人口年滿十八歲者約有百分之七，鄉村中約有百分之四，曾被剝奪選舉權。

蘇聯中其餘六個共和國及蘇聯本身的憲法（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採取）和剛纔所述的一個憲法相同。蘇聯的最高權力機關爲全聯邦蘇維埃大會，其代表由各共和國城市蘇維埃與省蘇維埃根據於每二五、〇〇〇都市選舉人及每一二五、〇〇〇鄉村居民得舉代表一人之原則選舉之。因爲照這種辦法所產生的大會約有兩千個代表，所以它每兩年祇開會一次，會期約一星期，以便認可「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ЦИК)與聯

邦人民委員會的工作。全聯邦大會與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輪流在各共和國的首都舉行。再者，執行委員會有七個主席，每個共和國出一人。在一九三二年，擔任首席主席者為出身農夫的加里寧（Kalinin）。

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全聯邦大會休會期間，具有無上的立法權與行政權，它是由兩個團體，即聯邦蘇維埃與各民族蘇維埃組成的。聯邦蘇維埃為全聯邦大會所選出，有四百多個會員，各依人口比例代表七個共和國。各民族蘇維埃有會員一百四十人，由各該共和國之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但須經全聯邦大會認可。此種民族蘇維埃之設立不僅正式承認蘇聯包括着許多不同的民族，其意並在保全這些民族間的文化與語言的差異。（註）

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每年集會三次，其兩機關各自開會和表決。在休會期間，委員會的權力委託於二十七人的常務委員會，其中九個由聯邦蘇維埃派定，九個由各民族蘇維埃派定，還有九個由兩個蘇維埃的聯席會議所選舉。此項常務委員會監督聯邦人民委員會的工作。後者的委員亦由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但共產黨有斷然操縱委員人選的勢力。

（註）全聯邦政府的命令與宣言係以聯邦的六種主要文字公佈。

聯邦人民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織之：主席一人，副主席數人，最高經濟會議主席一人，及外交、陸海軍、國內外貿易、運輸、郵電、工農視察、農業、勞工、財政和國家設計與統計的人民委員各一人。上述的人民委員職位中有幾個具有聯邦全境的管轄權，各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中並無與之對合者。其他的人民委員則與各共和國的人民委員分有同等的權限。一九三二年的聯邦人民委員會主席為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隸屬於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司法機關則有聯邦最高法院。該法院的職權如下：（一）給與各共和國的最高法院「關於聯邦一般法律的問題的指導解釋」；（二）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抗議各共和國最高法院所下的與聯邦法律相牴觸或違反他邦利益的判決；（三）判決各共和國之間的法律衝突；及（四）審問被控犯有關於其職務之罪的高級官吏的案件。

俄國的政治制度有四種最顯著的特色：

第一，雖然蘇聯是一個聯邦的國家，中央政府（明細言之，即設有常務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之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卻有非常廣大的權力。它可以制定關於任何事件（自戰爭與和平到衛生與公共健康）的法律。各共和國雖有許多會議和官吏，但祇可自由制定關於地方事件的法律。

第二，因為布爾扎維黨認為各個人對於政治問題的態度皆視其經濟地位與職業而定，所以代議制以職業的而非地理的基礎為憑藉。他們的根本觀念頗與盛行於法西斯蒂的意大利的相同，所不同者在意國，資本與勞動同樣得到承認而已。

第三，選舉法是非常間接的。蘇聯的農民與聯邦人民委員會會議相隔六層，都市工人則僅隔四層。因之，根據蘇俄的辦法，許多非共產黨員的代表在連續的選舉中漸漸被淘汰，最高的當局很少受人民的拘束。最後，在布爾扎維黨的政制中，權力是不分開的。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連同其附屬機關，擁有最高的立法、行政與司法權。

共產黨

蘇維埃政治組織的基礎石及其權力的來源就是全聯邦共產黨。沒有後者的指導，「蘇維埃即不能決定一切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該黨在一九三二年的黨籍名冊載有二、五〇〇、〇〇〇黨員與預備黨員。黨員的百分之七十爲大俄羅斯人，每七人中有一婦女。在一九三〇年，差不多十分之七的黨員是工人，其餘則爲農人、雇員、公務員與知識份子。

除正式的共產黨外，還有三個後進的共產團體，其入籍者共達八、〇〇〇、〇〇〇以上青年與兒童（一九三二年）。這三個組織包括「十月團」（The Ochiabrists）（註）爲八歲與十歲之間的小孩的團體；「先鋒團」（The Pioneers）爲十歲至十六歲的男童與女童的團體；及其產主義青年團（The Komsomol）爲十六歲至二十三歲的男女青年的團體。現在全聯邦共產黨的新黨員大半來自青年團的卒業者，但非每個卒業者都可入黨。就是工人階級的青年在加入前，也須受六個月的訓練，取得至少兩個有相當地位的黨員的簽名保證，並經地方黨部議決承認。無產階級的出身足爲入黨的特別資格，而有中等階級之背景者，往往難邀容納。

（註）該團之號爲十月團，所以紀念布爾扎維黨的革命，依照俄國的舊曆，那次革命係發生於一九一七年十月。

有七八千已登記的共產黨員屬於號稱「老布爾扎維黨員」的一羣，這些人都是在帝俄時代很活動的革命份子。他們大都受過教育，且有才智，所以能够獨占黨中和政府中大多數重要位置。他們對於後輩黨徒加以嚴

格的紀律和教訓，毫不寬假。『各候補黨員的心中，都深印着一個觀念，以為必須為黨的福利而完全抑制一切私人的感情。』凡共產黨員必須完全受上司的指揮，必須絕對服從命令，必須毫無問題地以身赴事，不論何時何地，必須專用其閒暇於傳佈共產主義的福音，並且必須時時準備以生命保護革命。

黨中的監察委員會每年清除黨員約百分之二。開除黨籍的理由有下列各種：酗酒，不道德，缺乏宣傳主義的熱心，脫漏黨捐，不付債務，做禮拜，或與中等階級締交。凡圖利用在黨中的地位以增進個人的境遇者，一被發覺，即受除名的處分。這種人被通稱為 *Shkurniki*，或祇顧外皮的人。列寧則喻之為紅蘿蔔，因為他們的表面是「紅」的，骨子裏是「白」的。自然，不是一切違背黨規的行為都應受開除的處分。有過失的黨員往往被申斥或降級。

在一九三二年前，每個共產黨員的薪水每月不得超過一—五元；是年則大有增加。然而許多黨員的實在收入比較很大。官吏都可領取特別旅行費，有時且享有住所和汽車。凡能表明有著作能力的人常常因其文藝宣傳的工作受到相當的報酬，即分有出售其著作作品所得的利潤。黨員還有其他好處。如有資格擔任政府和黨中的重要職位及在政府因糧食不足而頒發取糧證時得受優先的待遇。共產黨員的子女亦有受大學教育的優先權。我們一看共產黨員入黨後所負的義務之繁重，也許可以放心大膽的說，俄國一定還有很多在政治上雖無所依歸，但是表同情於布爾扎維黨主義的人。

共產黨的組織，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所採取的憲法中有詳細的規定。這個像金字塔的黨的結構的下層有四萬個地方「細胞」。這些細胞選舉代表出席每兩年舉行一回的全黨大會，大會因過於龐大，不適於辦事，故祇

核准它附屬的許多委員會的工作和決議案。(註)這些委員會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後一機關有委員二百人，每三月舉行會議一次，負有鞏固黨的統一及維持黨員的紀律與忠誠的任務。

(註)除地方支部及大會外，共產黨的階級組織還包括有各郡、省市區的委員會。但沒有代表聯邦中七個共和國的分黨。

中央委員會——共產黨的實際指揮機關——由七十來個委員及同數的交替者組成。它雖然時常開會，它的職權其實是由兩個小局和一個秘書處執行的。一個是組織局(Orgbureau)由十二人組成，負有規定入黨條件，升遷與降黜，及監督宣傳工作的責任。它隸屬於另一個局——政治局(Politbureau)，此局有委員九人(一九三二年)，有權決定黨與政府的一般政策。秘書處則負責於『日常組織與執行的工作』。因這三個機關的全體職員是密切連接的，所以黨中的權力非常集中。列寧一直到死(一九二四年)，是政治局的主席。

共產黨的首腦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史丹林於一九三二年擔任此職，他同時又是政治局、組織局和秘書處的委員。凡遇決定黨的政策時，他的話是最重要的意見。因為黨是『政府的舵』，所以他是蘇聯的實際獨裁者。在過渡時期中，俄國採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一面準備着將來實行徹底的共產主義。為擁護這種制度起見，共產黨藉助於各種憲法上的和憲法外的方法。它是俄國可容許的唯一有組織的政黨。凡與該黨無關係而欲任官職者必須安守非黨員的本分。因為可得到的黨內候補者的人數通常有限，所以許多鄉村蘇維埃大半由非共產黨員所組成。但因為遴選高級官吏的間接方法，一定會逐步淘汰最高政府機關中的非黨員代表，所以聯邦常務委員會與聯邦人民委員會議的委員幾全部為清一色的共產黨員。自然，嚴酷的檢查制度，共產黨員的宣傳，

公開的表決，及敵派人被剝奪選舉權的情形，都大有助於城市中的共產黨候補者。再者，都市中的共產黨營壘在各共和國大會和聯邦大會中比鄉村區域有較大的代議權，這在前面已經指出。況且政府裏的高級官職大多數經該黨為黨內的領袖保留着，外人不能染指。這樣一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許多委員同時也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其中有些人且為常務委員與人民委員。

人民對於共產黨的政策批評，在所不禁，這恰和一般外國人對於蘇聯的觀察相反。凡是與共產黨的政策一致的積極意見都受歡迎，但這些意見必須從黨內，而非從有組織的反對派發出。政府的檢查制度非常嚴酷，決不容反對黨有機會作反布爾扎維黨宣傳的言論或文字。鎮壓異己的職務由「政治保衛局」執行，這個機關依其每字的第一字母簡稱 O. G. P. D. 它其實是一九二二年所裁撤的「契卡」(Чка)的繼承者。政治保衛局的主席以顧問的資格出席聯邦人民委員會。

純粹共產主義的試行（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

布爾扎維黨在俄國政治組織中所遂行的改革已經是一往無前，它最初在經濟範圍內所更新的事情更為革命的，蘇維埃政府於柄政後不久，即遵照黨的訓誡，即下令將土地、天然富源，及生產與分配機關一齊收歸國有。準備打斷資本家對於勞動民衆的非法剝削，它的直接目的就在准許農人依其需要使用土地，並將工廠、礦山、及運輸的種種設備交與工人管理。凡是工業與農業的產物都須移交國家，以便視需要分配於人民。譬如，農人的收

穫之溢出其需求額者，當用以養活工業的無產階級，而工人的製造品當分配於農人。國家設有最高經濟會議，負責供給原料與燃料於工廠，以食物分配與勞動者，並使農人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製造品。

當這些計劃正在作成定式的時候，政府為適當地養活工人起見，覺得有規定每日口糧及頒發領取食物證之必要。關於給口糧的辦法，將全國人民依其工作之輕重與效用分為四類。第一類包括工作繁重的手工人，第四類則為社會之「寄生份子」，其工作無甚裨益於社會。因為這些被貶入最低一類的可憐蟲所得的口糧僅及第一類的人的定量四分之一，所以他們多有飢餓至死者。國家全靠對於農人的徵發取得糧食，並且在若干情形中，祇准農人保有僅足養活本身的一部分及為次年的收成下種。

政府為緩和各大城市中於一九一八年後所發生的關於供給住所的嚴重情形起見，曾授權地方當局沒收一切分租的小間房屋與大住宅，並使工人與其家屬移居其內。珍珠寶玉及其他貴重品超過規定的最低額者，悉數充公，多餘的衣服與家具亦然。私人的買賣被視為反革命的活動，對外的貿易成為國家的獨占事業，同時一切國內外的債務全被一筆勾銷。以交易品代替貨幣的貿易則經獎勵。

希臘正教會自然被剝奪了權力和財產，私立學校也遭裁撤。婚禮成為社會的儀式，結婚與離婚變成了輕而易舉之事，國家且擔負照料被棄的私生子的責任。婦女在社會上與經濟上與男子立於平等的地位，又因為家庭生活被認為資本制度的柱石之一，家庭的關係也有解散的趨勢。

政府原來已計劃擬定一個將一切收歸國有的程序表，並先沒收大的托辣斯，讓較小的商業暫時照舊方法

經營下去。實際上，收歸國有的手續，至少在其最初的階段，是極端任意的，帶有一種懲罰的而非經濟的手段。性質。工人大都急於驅逐他們從前的老闆和經理，一面在他們所選出的委員會的監督之下接辦工廠。差不多在每件例子中，工資都增加了，工作時間亦減少了，但因為工人中很少受過管理的教育或訓練，所以工作上殊少紀律和效能。

使事情更糟者，鐵路系統——在大戰的末了幾個月中已經紊亂不堪——此刻卻有完全崩潰的危險了。據托洛茨基的統計，在一九一九年之秋，全國的火車頭有百分之六十是「出了毛病的」，政府的工程師也憂鬱地預言道，再過一年，鐵路的「流行症」如不致於「死亡」，那纔是奇跡呢。因之要運輸從農人方面所徵發的穀類或殘廢的工廠所產的有限製造品，幾為不可能之事。更因政府採取通貨膨脹的政策，物價飛漲一發不可收拾。政府繼續發行紙幣的動機，大概在破壞幣制並強迫人民接受基於物品之交換的經濟政策，同時也在補償政費。

有一個時期，似乎就是最激烈的改革也可以順行無阻。祇要白黨的反革命運動和協約國的武裝干涉存在一天，工人與農人總認這許多改革，為迫於軍事的危急所不得不暫時施行的「戰時共產主義」之各方面。然而，一到和平重臨的時候，全部的辦法就漸漸表明為難於實行，它非但不能增加民衆的福利，且足致混亂。

對於共產黨的制度反對最激烈者就是農民。即在最初，農民雖非常恐怕地主回來，對於政府所派來徵收其剩餘糧食的使者仍不大與以助力。當危險已屬過去的時候，他們滿心想實現一種新發見的繁榮，因為他們誤解地主特權主義的廢除，即等於租稅的終止和取得額外土地的權利。到一九二〇年，事實上他們已占有歐俄的可耕

地百分之九十六。他們決無時間，也毫無意思來諦聽關於土地國有或都市無產階級應分有農產物的學說。

農民既拿出穀類，當然要求以金錢或製造品爲價。不幸這些東西都不能盡量得到。市面上流通的硬幣非常之少，農民也很乖，決不肯接受無價值的紙幣。製造品因進口貨幾乎停止而大感缺乏，工廠亦常患原料不足，設備敗壞和管理不善，而運輸上的種種設備差不多完全破壞了不復存在。農民於絕對失望之中開始屯積他們的糧食，當政府徵發吏降臨時，總託詞貧窮。

政府於試行徵糧政策之中，曾於一九一八年將每村的貧農組成委員會，其任務即在排斥富有的農人並強迫他們交出盈餘的糧食。這種手段祇有釀成鄉村內部的爭鬪，使國家多一種困難，而不足以增加城市中穀類供給額的來源。再者，戰爭與蹂躪，及反革命派有一個時期控制着俄國南部的事實，在在使穀類更加不足。此刻政府絕望地把工人武裝起來，編成「糧食軍」，並叫他們帶着機關鎗，來福鎗和刺刀到鄉村裏去威逼農民拿出他們所屯積的糧食。爲公平起見，每區應根據當時的出產統計交出一定部分，但那般搜索糧食的人往往不顧所定之量，百般誅求，有時竟使農民無餘糧以贍養其家口。

現在輪到農人絕望的時候了。他們於自衛之中決定使用他們所知的唯一有力的武器——消極抵抗。既然他們生存所必需以外的生存，都得爲別人所劫掠以去，那麼他們就儘量減少生產使祇能維持自己生存而止。眞像爲運命所注定的，偏有幾個要因來幫助農人減少生產。第一，那時無肥料輸入；第二，國內耕作機器的製造完全停頓；第三，在一九二〇與一九二一兩年中，俄國大旱。

因之一九二一年的穀類收成僅及一九一三年的五分之一。饑饉也發生了——俄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災荒。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蒙着糧食缺乏的影響，餓死的達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城市和鄉村中的情形是一樣可怕的。若非外國（尤其是美國）大發惻隱之心，慷慨解囊賑濟，也許還得死上幾百萬人。

那時工業的狀況幾乎達到最壞點。最高經濟會議完全不能執行它的職務，儘管政府頒佈命令延長工作時間，重新採用零件工作，並懸賞獎勵超過規定的最低額的生產，一九二〇年的工業生產總額仍祇有一九一三年產額的百分之十三。在大戰前的最後一年，所開掘的金屬礦苗有一九二〇年的五十倍之多，煤油的產額則有兩倍，生棉幾及三倍，鋼鐵約二十五倍。

『打倒蘇維埃政府』的呼聲漸漸成爲一九二〇年中工農的會議席上常有的和猛烈的叫喊了，坦波夫省（Tambov）竟有軍隊的叛變。在一九二一年三月曾一度爲布爾扎維主義的發祥地的喀琅斯塔得（Kronstadt）的水兵也叛變了，雖然變兵的大部分是具有農民背景的新入伍者，但這次叛亂使蘇維埃政府悟到政策的改變是刻不容緩的。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它決定實行戰略上的退卻。

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一九二八年）

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的第十屆全黨大會，共產黨員議決採取『新經濟政策』（Нов）他們感覺到：他們的熱誠已使他們走得太遠，他們未充分重視農業的俄國所給與工人的專政制度的障礙而盲目前進，農民之關心於

共產學說遠不如他們關心田地與收益的熱切，爲了保存已得到的政治利益，而作若干經濟上的讓步那也是值得的。這種方針自然難免於退卻，但退卻是一種戰略；它未必是潰敗。共產黨仍舊可以保留政權、運輸制度、對外貿易、銀行事業、及大規模的工業，同時不妨給與人民關於其他經濟方面如地方買賣與漸次提高的工資等級的小讓步。

列寧很想說服人民，共產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一樣能够保障國家的經濟健康。爲了這個緣故他提議共產黨須改變它的戰略，「化襲擊爲圍攻」。他解釋道，「我們不能保留我們所已取得的一切地位，但在他方面講，祇是因爲……我們獲得了這許多地位，所以我們有這許多可以放棄，並能够退卻得很遠，甚至於還可繼續退卻，而不致喪失重要的和基本的東西」。社會主義當加擁護，但自茲以往，它應爲一種實地應用的社會主義——「就時勢之急需所許可的範圍儘量應用的社會主義」。實際上，一種國家資本主義替代了共產主義。

新經濟政策的要點如下：（一）廢止強迫的糧食徵發政策，而代以對於一切農產物所課的賦稅，此稅初以現品繳納，但在一九二四年後，則以金錢；凡超過賦稅之數的產額可在公開市場自由出售之。（二）私人經營的零售商業，在若干限制下在所不禁，但國家設立許多國營的零售商店，並提倡消費合作社與之競爭。（三）雇用工人不到二十人之小工廠與作場皆解除國有的性質，並可由資本家收回。（四）幣制及錯綜的國立銀行制度皆經恢復，在一九二四年，以金爲本位的「瑟奉奈滋」（Chervonetz）蘇聯的貨幣名，等於革命前的十個金盧布）的表面價格被穩定爲五·一五元。（五）爲取得流通的資本起見，其分利益的開礦、製造與運輸的特許權及大規模的農

業與工程計劃都經政府與外國資本家商訂合同出讓，此種合同擔保受讓人的資本不歸國有，並給與國家購買各該資本家的商號的製造品之選擇權。(六)恢復分等級的工資制，給口糧的方法亦經修改；可在政府商店購買的日用品數量的數量仍有限制，但在公開市場添購貨物之舉成爲合法的和可能的了。(七)創辦國營的托辣斯以管理大工業中的生產與分配。(八)廢止強迫工人加入工會的規定。(註)(九)擬定一切工業在有效的、經濟的和國家支配的組織中將來互相調和的計劃。

(註)俄國的工會有二十三個，聯合爲全俄工會中央會議，共有會員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以上。這些工會原來被認爲國家的機關，行使若干政府的職權。然而自一九二二年後，它們的任務即在與地方的和國家的經濟機關訂集合的契約，以保護工人的利益與幸福。勞工的紛爭大都由仲裁委員會解決。工會的進款(來自會費)約有百分之十，用於發展工人中的文化與教育事業。

有一個時期，似乎新經濟政策會醫好俄國的經濟大病，這是共產黨所引爲欣慰的事。農人種穀的土地增加得很快，到一九二六年，所達的數字幾等於一九一三年的。大多數農人，雖然尙未完全同意於共黨所持土地實屬於國家而非他們所有的觀念，似乎也以納稅及出售其盈餘糧食於市場爲滿足了。在一九二五年，政府甚至於讓步到准許短期租借土地與雇用有限人數的農役的程度。因之有些冒險進取的農人租借鄰家的田地並雇用額外的勞動者。其結果，農民又分爲三個階級：貧窮者，小康者，和富裕者。到一九二八年，當局認知這種情形，乃重新訂定稅則，以便完全豁免農民中最窮的三五%的租稅，薄賦中等的五三%，並重課其餘一二%的富農。

國家殊不欲聽任這般富農養成保有大量田地的強盛階級。政府有一個時期也很寬容他們，這是因爲需要

他們的企業來增加穀類的生產。但他們終須明白，他們活動的日子將要完了，而政府自始就計算了他們的末路。布爾扎維黨早已打定了建立大規模的國家農場與集合農場的計劃，作爲抵制富農的手段，同時又爲增加穀產的方法。共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英畝的田地被勘定爲建立一百五十所國家農場的面積，並盡力取得新式的機器與有志的耕作工人。但在一九二八年前，這一方面的進步是很少的。（註）

（註）共產黨爲防止民間非法蒸溜劣質的家釀飲料起見，乃於一九二五年取消總禁酒的法令，並恢復政府的伏得卡酒（一種猛烈的白蘭地酒）專賣權。依據一九二九年的法律，禁止於假日販賣酒類。

在工業的範圍內，政府順利地繼續壟斷製造品。有幾百個國家托辣斯或企業組合業經成立，並享有很大的自治權。每個企業組會被置於經理委員會的指揮之下，這些經理爲國家的受託人，對最高經濟會議負責。工資的定率由托辣斯與工會直接磋商解決之。贏利的一半歸諸政府，自十分之一至七分之一之數用於謀工人的幸福，其餘則撥充擴展事業費與公積金。在一九二六年，國家托辣斯的製造品約占蘇聯工業總產額百分之七十七，同時合作社占百分之五，外國的特許權所有者占百分之三，私人企業占百分之十五。到這一年，工業的出產額也幾達戰前的水準，雖然數量之多是犧牲了品質而得到的。

在採用新經濟政策後起初幾年中，私家的買賣非常興盛。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的會計年度中，零售商業的五分之三是由私家商人經營的。然而利用這個機會謀利的人漸失人心，他們馬上被稱爲「新經濟政策人」（Nepmen）。政府盡了各種力量來抵制他們，特別利用消費合作社作爲制勝他們的工具。無論何人都可加入合

作社，惟教士與富農除外，到一九二七年之春，全國約有二萬八千個消費合作社，其社員共達一千四百萬人。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的會計年度中，這些合作社差不多經營了蘇聯的零售商業之半，同時私家商人支配着三分之一，國家商店占其餘六分之一。國家很希望將它自己的商店的營業早日讓與合作社。

布爾扎維黨向外國資本家所提出的特許權讓與條款非常有吸引力，因之有一百多家公司（多為美國的）與蘇俄訂立了合同。然而利用這些特許權時，往往發生困難，到後來有很多合同被作廢或放棄。

雖然新經濟政策大有助於醫療早年共產黨的種種試驗所致的創傷，並漸漸將生產的數字恢復到戰前的水準，但穀類與製造品的價格的懸殊終使人民備嘗艱苦。國家固准許人民依世界的正規市價售賣穀類，但製造品只能按國家托辣斯任意所定的價目購得。所以在一九二八年，穀價祇有一九一三年的價格之半時，製造品的價格卻三倍或四倍之。政府認這種情形為打擊富農的最妙方法，富農遂因之大受損失。

當新經濟政策正在施行的時候，幾個政府所設的特別局開始搜集關於俄國經濟界各方面的統計資料。如此積聚的材料將用以擬定增加生產和加速工業化之進行的五年計劃。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這個「五年計劃」（Pятиletka）開始了，其施行則於一九二九年五月經全俄蘇維埃大會追認。在討論這個計劃的詳細節目之前，我們當略述共產黨的領袖間所發生的嚴重鬭爭。

黨內的政見與衝突（一九二二——一九三二年）

一直到一九二二年的春季，列寧是蘇維埃聯邦的獨裁者，他占着共產黨政治局主席的位置。他以他的極大的威望與勢力，不但能够造成重要的政府政策，且能防止黨內其次領袖間表面上的不和。列寧在革命時期與革命後的時期內過度的辛勞，漸漸影響了他的健康。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他的身體猝發癱瘓，暫時失去右臂與右腿的功用。病體復元後，他又委身於工作，特別是從事著作，但他不久就覺得有將自己的行政職務付託於友人與助手之必要了，——這些友人和助手就是曾在法國研究法律的卡曼涅夫（Kamenov），他最早的熱心門徒之一的萊科夫（Rykov），及其他幾個忠實黨羽。

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他的健康受第二次的打擊。這一次，他移居莫斯科附近的高爾基（Gorky）村莊，過着苦痛的生活有好幾個月，但因希望他的神異的體格終會戰勝病魔，故毫不沮喪。結局的降臨是出乎意料的。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晚間，他忽然神志昏迷，不到一小時就溘然長逝了。由共產黨大眾看來，他的陵墓（在莫斯科）成爲神龕；由黨內領袖（雖然他們因陡喪導師而悲哀）看來，他的逝世預示着政權的爭奪。（註）

（註）列寧死後不久，彼得格勒就改名列寧格勒（Leningrad）。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俄國的首都即爲莫斯科。

候補爲黨中與政府中最高領袖的人物裏面最傑出的爲托洛茨基與史丹林兩人。托洛茨基是顯著的煽動家，紅軍的總司令，黨中大多數重要機關的著名委員，所以也是在列寧後最爲俄國以外的世界所知的布爾扎維黨人。然而他在黨內有不少的敵人。有些共產黨員對於他的盛氣凌人的勢頭和虛榮心實在不敢領教。其他的人則因他苛於攻擊於他無用的人而討厭他。他又急於開始世界革命而不顧俄國國內的困難情形，並蔑視農民，認

他們太落伍，無助於共產主義之建立，這更使另外一批人對他敵視。布爾扎維黨的『舊赤衛軍』的老兵宿將，則因他直至革命成功的一年還在反對列寧而耿耿於懷，到現在尚未饒恕他。再者，他和列寧在相識之初彼此常用以嘲罵對方的尖酸刻薄的表性形容詞，此刻亦被他的敵人利用來攻擊他，難怪他在一九二四年的抱負是不幸的。

反對托洛茨基的主力，為該黨中央委員會的三個委員：史丹林、卡曼涅夫與齊諾維埃夫（Zinoviev）。這個三人同盟的主角就是史丹林，他是喬其亞（Georgia）地方的農人，真名為約瑟·維塞里阿諾維區，德壽該虛維利（Joseph Visserionovich Dzhugashvili），以一八七九年生於高加索的哥里鎮（Gori），是一個鞋匠的兒子。約瑟的父母為俄皇亞歷山大第三的敕令（此令規定貧兒可為教士）所動，早就決意送他們的兒子進神學校肄業。然而這個粗魯的少年殊無意於成為教士，不久就表明他對於馬克思的親熱遠過於讀聖經。他馬上被神學校開除，接着就投入社會民主黨。

史丹林秉性殘酷、橫施、大膽，並且沈默寡言，入黨後，即以熟練於執行危險的使命見稱，在一般潛伏國內或亡命國外的過激領袖中間，也很有名氣。在他所取的一切別號中，似乎沒有一個能像『史丹林』一名那樣適合他。『史丹林』（Stalin）的意思就是『鋼』（Steel）。在一九〇三年，他是最先遵從列寧指導的布爾扎維黨員之一，此後他始終為這個導師的忠實信徒。『在史丹林的心目中，祇有一個馬克思，他心目中的先知便是列寧』。

儘管他非常狡猾，時時提防，他仍被捕六次，並於一九〇二年與一九一三年之間屢遭放逐。他因體格剛強並